

萧克和张爱萍
在新年茶话会上



炎黄
春秋

从京沪密谋到川南起义



千古英雄郑成功



21世纪的“女玄奘”



歌星苏小明的斑斓世界



军犬和它的主人们

1992年3月 总第...

文坛女将

张洁

王安忆

程乃珊

王小鹰



张洁



王小鹰



王安忆

程乃珊



在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

○萧克

同志们：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新年茶话会。首先祝大家新年好！今天是辞旧迎新的会，也是我们全体顾问、理事的第二次集会。机会难得，简略地回顾一下我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同时也讲一讲四件今年应做的大事。

我会是1990年8月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注册的。自此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召开成立大会，向社会各界亮旗帜。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影响是好的。第二件事是编辑出版了《炎黄春秋》杂志，迄今为止，发行三期逾20万册，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第三件事是在河南郑州举行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奠基仪式。第四件事是召开了“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座谈会，为学术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此外，我们还参加了随州神农文化节、西安的古文化节、河南安阳的殷商古文化节和周易国际学术讨论会，参与筹办“闽台文化讨论会”，与湖北、天津、河南、福建等省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及正在筹备成立研究会的上海、广东、深圳、辽宁、内蒙古、青海、湖南等处建立了联系，其中业经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团，均已成为我会团体会员，加强了与国际友人和海外炎黄子孙的联络工作，同海外知名人士李约瑟、韩素音、李政道、潘毓刚、朱葆缙、周颖南等建立了联系，增进了友谊。

以上工作，我们是在国家没有给编制和经费的情况下，靠大家的努力，靠奉献精神才得以完成的。在这里，我谨向这些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关心与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顾问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讲一讲今年的四件主要事情。

第一件：协助陕西等有关单位，重修黄帝陵。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重修黄帝陵不仅是一项文物工程建设，更主要是在于联络海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海峡两岸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瑞环同志几次同我们提到这件事，我理解也是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致力振兴中华的大工程角度去考虑的。我相信，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义举，必将得到全球炎黄子孙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协办此事，是能够发挥其特殊作用的。

第二件：筹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筹措科研基金。《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部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概括和总结的巨型著作。初步计划在100卷2500万字左右。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而有相应分量的巨著。这部大书，如能按计划、按要求编成，不仅是对中国国情即构成今日中国人民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的基础，而且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好教材。这件工作是去年提出的三件事之一，去年8月学术委员会就框架结构等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尚未进入正常运作，今年应该有所作为。

第三件：开展中华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与竞赛等活动。有着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正确认识这份遗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全面、科学、具体认识的基础之上，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更好。做好这项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宣传。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是我们的责任，大家都应成为宣传家。宣传是为普及，普及就要面向大众，面向青年。因此，我们要与有关方面联合，做好这个工作。

第四件：深入开展学术活动，筹办“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的国际讨论会。学术研究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从我会学术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讨论会，到今年将在福建召开的闽台文化讨论会以及随州、新都等处的学术研讨会，我们都在摸索经验。明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典范，是很值得研究与纪念的。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争取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开好这个会议。

做好上述工作，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中心。中国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紧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我们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联络与团结炎黄子孙，共同维护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大业。我相信，有这么多热心的顾问支持，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作骨干，有这么多理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作用，再加上领导和群众的关心与爱护，我们这个团体一定能够做出几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情的。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我用两句古话作结束。我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争取更大成绩。

补正:

本刊1992年第1期(总第4期)所刊《汪东兴日记——随毛主席重返井冈山》系《中共党史资料》供稿,特此补正。

本刊自1992年起交郑州市邮局向全国发行。目前,全国各地邮局正在收订下半年刊物,预订者请从速订,莫失良机。请记住本刊的邮发号:36-138。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绳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锲
张国瑞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征	温济泽
戴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炉

总经理:徐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杜卫东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

邮码:100037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本刊特稿

在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萧克 1

教育 科学 青年 楚图南 4

英杰谱

毛泽东的老师与岳父——杨昌济
..... 李锐 5

教毛泽东古文的“袁大胡子” 田松发 9

春秋笔

我所知道的康生

..... 师哲 10

从京沪密谋
到川南起义

..... 李伟 20

文坛轶话二则 吴泰昌 17

访谈录

文坛女杰心路探迹

——访女作家谌容、王安忆、张洁、张抗抗

..... 刘慧英 26

赤子心



还是
冯玉祥将军的性格

..... 魏志军 31

古今谈

“关羽文化”启示录 陈辽 36

孔夫子悠然走向世界

..... 姜国柱 37

《贞观政要》在日本 ... 周君铨 96

九州景

西镇南胥——吴山 竟明 18

琅玕怀古 李后 19

古镜台



千古英雄郑成功

..... 毛佩琦 40

推翻秦王朝的

决定一战 ... 丹妮 46

同心结

漫画家的非漫画之路 陈斌 53

“台湾小姐”

凌蕙蕙的人生变奏 张士敏 50

台独之路行不通 郝桂林 48

人海浪

一对姐妹花 两棵浮萍草

——严凤英和她的妹妹 ... 林青 57

20世纪的女“玄奘” ... 孙云晓 61

音乐家施光南的
恋情与家事

..... 傅溪鹏 66



神州光

苏巴什落日 肖复兴 72

时代风

首航太平洋 杨懿林 88



歌星苏小明
的斑斓世界

..... 陈大鹤 75

小歌手和她的“园丁”

..... 李影 金剑 81

军犬和它的主人们

..... 高洪波 83

五星级饭店的女经理

..... 韩秀琪 91

争鸣录

中共党史争鸣撮英

..... 麦阳 74

封二 惠安女(摄影作品)/乔天富

封三 文坛女杰(摄影作品)

教育

我生于上个世纪最末一年，因而和我们伟大的民族一起经历了变化最深刻的历史时期。现在历史已走到了 21 世纪的门口，我借《炎黄春秋》的篇幅谈几点想法。

教育。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优良的教育传统的。“尊师重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都是先哲留下的精神财富。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教育至少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适应于社会生产和一般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常说的为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民族的素质服务。另一个层次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造就千百万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教育。显然后者应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对人的文化素质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如果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也会是有限的。正如在文盲的群落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必然会受到制约一样。新中国建立后的 40 年来，应该看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扫除文盲到高等教育都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看到，失误和挫折也是明显的。10 年浩劫，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从教育的观点看，可能是当时的领导人想以“社会主义教育”取代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应该说是有偏颇的。而近 10 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了，物质生产发展了，但不论是从提高人的素质的一般意义的教育和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教育，都没有放在足够高的位置上，这种局面应该引起重视了。如果再不重视教育，将会影响四化建设的速度和质与量的变化。

但更重要的是对于青年和儿童教育的关心，如我们提倡扫盲，也重视最近的将来要普遍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但目前一些地区的学生和家长，由于经济负担及弃学从商风气严重，新校建立显得迟缓，在校学生亦不断流失。特别在边远地区和山区，问题特别严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要落在实处，更要在政策和措施上有实效地体现出来。

科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科学有过辉煌的一页，在历史的进程中，对祖国的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近代确实是落后了。承认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正视落后。现在把科学和技术提高到生产力的第一位上，这是正确的。我在此想说的是两层意思，第一，要重视科学，重视其在社会物质生产、社会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第二，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更要根据科学规律、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并联系实际。在这方面过去的失误和教训是深刻的。例如 1958 年的“大跃进”，恐怕不是科学家不努力，而是领导决策方面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和科学方法，而凭主观意志的空想决定。这种深刻教训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青年。青年人是我们民族和祖国的未来，老年人应该尽到关心和爱护，并教育指导青年一代的义务。应看到这是历史的责任。对于青年人我希望他们勤奋，多思，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不断探索，不断努力，不断前进，明智而勇敢地不辜负历史和民族的未来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科学

青年

毛泽东的老师与岳父

杨昌济

○李锐

毛泽东的老师 and 岳父杨昌济是个怎样的人？他何以为人、为师？他的品格和世界观对毛泽东产生过哪些影响？……本文为读者提供了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人们将从中进一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一师学生，都集合在他周围。

学古人读书持之以恒， 为变法理想借古鉴今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平江

外祖父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生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杨昌济“8岁失恃，14岁失怙”，自幼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并在以后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科举人)未中后，即弃科举。1895年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

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他在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远渡重洋 10年留学生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他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

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

1909年他去英国深造,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 厄北淀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其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对英国大到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之法律,小到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习惯,也都加以调查,作为借鉴。1912年他在厄北淀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院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

留学期间,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1911年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72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他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让他出任湖南教育司长。他不热衷仕途,决不肯做官,却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

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他力辞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董之任,全身心致力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城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说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处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辨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

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贯通。《达化斋日记》多处称道王船山,例如说:“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识。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作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方法,毛对后两种则不以为然,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认为“动”之本义:“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

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特色之一,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戊戌岁曾在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在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

在谭嗣同那里,杨昌济不只是接受了他的维新主张和“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还改变了自己对佛学的看法。《达化斋日记》里从谭嗣同的《仁学》中摘引了两大段谈论佛学的文章,接着说:“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以上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1914年6月19日)由此杨昌济对佛学也产生了若干兴趣,似乎也接触了一些佛教典籍。这种影响甚至也传递到了毛泽东的身上,1920年6月7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作过直接的研究,但《仁学》中间谈到的某些东西似留下了痕迹。例如,《仁学》中说的:“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转引自《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18日),后来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之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眼耳鼻舌身五个字,至少“身”字,就是从那里借来的。

推崇曾国藩

在杨昌济心目中最大的偶像应该说是曾国藩。这一位湖南老乡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人物。他所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是清王朝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他因此得到“汉奸刽子手”的称号。如果不是只看这一个方面,那么,他的办事精神以及

治学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在道德方面也是个律己很严的人,因而在旧时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尊敬。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崇,可说是一种时代潮流,他无论治学乃至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为自己的楷模。这些都对他的学生发生深刻的影响。《达化斋日记》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很多。例如,1899年8月18日:“日内又萌停看《通鉴》(指《资治通鉴》)专看《文编》(指《皇朝经世文编》)之念,此大不可也。昔曾文正自定课程,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此可师也。”1915年3月4日:“今日从周印昆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谗谤,亦非余之习惯”……

杨昌济不只是下了一番工夫研读曾国藩的日记,在他自己写的日记中,人们也依稀可见模仿曾国藩的态度,常常可以遇到自我反省的地方。例如,“日内忽忽不乐,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曰小人长戚戚,传曰无忧而戚戚必肆焉,不可不戒也。”(1899年8月20日)又如,“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忽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同月24日)又如,“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1914年7月18日)又如,“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1914年9月12日)……真是处处可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之徒的形象。正如他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也列入了杨昌济修身课的讲授范围,在他为学生拟定的修身问题中,就有:“曾涤生

自课卫生三事,能言之与?”“试言曾涤生教弟之事”“曾涤生以求阙名斋,何意?”等。曾国藩的书斋叫“求阙斋”,“阙”就是“缺”,他追求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所不足,有缺陷。这种态度,杨昌济也是赞赏的。

毛泽东是杨昌济极看重的学生,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先生对学生的好感,而且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915年4月5日)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确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曾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忧虑时局,关注国外新思潮

杨昌济极为关心时事。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日本逼袁世凯接受21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月27日)对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21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5月10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为国事而讲演,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励学生。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影响了他的学生。

杨昌济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

外各种各样的新意见在教学中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1914年9月25日的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翌日,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断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意见显然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者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观其意,教者若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杨昌济传授而又为毛泽东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课程,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

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斟酌古今,权衡中外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

《告学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就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

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对于学者自处之法,杨昌济则认为:“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上就已出现过老师的这种观点。“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杨文中关于“贵我”的以下一段话,《讲堂录》上也有过类似的记录:“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唯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

行主义。”关于“通今”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时势既变,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古人所立之法必不能尽合于今人,故不可盲从古人”。“士不通今,终解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世界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然后文章阐发贵在实践中道理:“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然是可谓之自觉”。“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盲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老师这种“贵我”、“通今”的教导,“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学说,被他最看重的学生毛泽东,在一生中实践了,并在言行中全面发挥和发展了。综观毛泽东一生,尤其晚年,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不能不说同杨昌济当年的熏陶是大有关系的。

文中写到:“实行之中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勇,黎民可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之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教毛泽东古文的“袁大胡子”

○田松发

老师所贵之坚忍，所贵之勇敢，进行大改革、大整顿，翻天覆地所必须的大坚忍精神、大勇敢精神，不正是在他的学生身上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吗？不是经过30年的坚苦卓绝英勇奋斗，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吗？遗憾的是，也正是这种精神，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了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悲剧。

杨昌济到北京后，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新潮春风。可是，过于劳累的一代经师、人师，却一病不起，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对于所敬仰的老师去世，毛泽东很悲哀。当一些教育界名流和杨昌济的生前好友联名发起募捐，为遗族生活集赞，毛泽东也列为发起人。比起当过总长次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等人来，当时毛泽东在列名者当中大约是最不知名的一个，他也顾不得这些，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以尽学生的心意。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0年冬天，毛泽东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大家都知道新民学会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系，能够留下这样的影响，杨昌济可以永垂不朽了。

（本文为李锐著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的一篇。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袁阳）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在一师读书的经历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大胡子”就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国文教师——袁吉六先生。

袁吉六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位举人，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和好古文。早年设馆教学时名望很高，造就了不少人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了不少贡献。1912年，袁吉六先生举家迁居新化县。不久，出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曾为毛泽东授课五年多时间，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袁吉六是一师精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注重古文教学，以学识渊博，讲解精辟而闻名。授课时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因对学生作文扣分太紧而引起学生反感。毛泽东却对他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结果倍受袁的器重，经常得袁教益。后来周谷城先生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有神气，但毕竟以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他知难而退了，毛主席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这证明毛主席能看出教师之长……”。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竞相效仿。毛泽东由于受这种“新文体”的影响，喜欢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称他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并对他说：“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又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接受教诲，逐渐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写古文，深得袁吉六的赞赏，说毛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常批给学生传阅。又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卧室进行个别指导，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及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他从不轻易借人的各种善本书。直到1949年，袁的儿子袁愈樾在翻阅父亲的存书时，还发现书中央有毛泽东借书时的借条。成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深感袁师的教益之重要。他曾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1915年，一师发生了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提出了要赶走张干。张干为此要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知道后，极力表示反对，多次出面为毛泽东等人担保。他曾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正是在袁吉六、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师的再三反对下，张干才被迫收回成命。

解放后，毛泽东得知袁吉六先生早已去世，深表怀念，亲笔为其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当毛主席得知袁的妻子戴常贞老人生活困难时，又写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长沙市民政局予以抚恤，使其得以安度晚年。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人，席间追忆袁吉六老师，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毕，毛泽东又请章世钊带人民币400元，赠给戴常贞老人作为营养费。

后来袁愈樾在袁吉六墓碑两侧刻石为联曰：“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

生前，他奸诈狡猾窃取了高位，死后又骗取了那么多的花圈与挽联。然而，历史最终撕去了虚伪者和阴谋家的假面。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我从延安时期开始，由于工作关系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就从延安说起，把他的老底抖搂出来。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时间读点书也是难得的，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6本《干部必读》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氛。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很不相同。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主席的窑洞啾啾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是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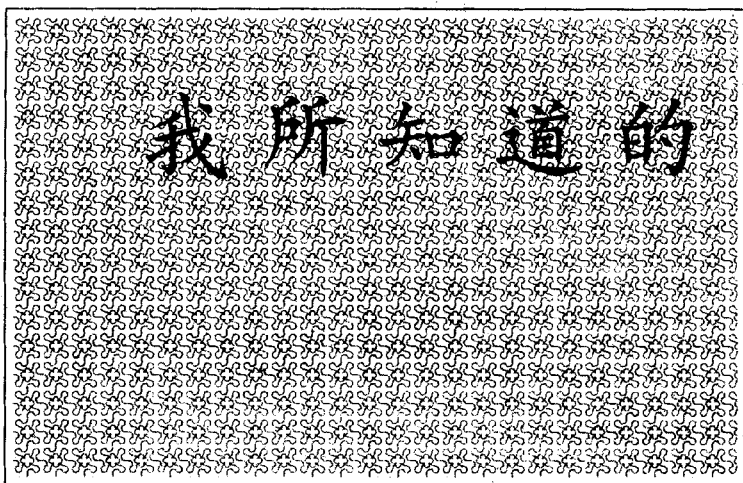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转入审干，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的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

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政策、方针、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是康生并不甘心罢休。1942年五六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及言论。对此，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这种批评显

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0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后来得到甄别平反）。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



我所知道的

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文章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和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即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任弼时写了一封信，又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的。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才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什么人都去，国民党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是“特务”，而张克勤则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以假枪毙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地下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

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康生处于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在于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一份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一边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等等。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审查。两天以后奉命一夜抓了200多人。

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脸色苍白，茫然失神。

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被逼迫成为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待”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绥德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康生指责我，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我应召到延安。这时，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是被认定为“特务分子”的。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也有成干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9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却未改善，逼供变成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

康生

◎ 师 哲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即“戴案”。关于此案，我在《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一文中已有介绍，这里不赘。该文载《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即开始了审查干部，并逐渐扩展开去。

1943年4月，传闻敌人可能进攻边区，康生便借机要边区保安处抓人。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

接着，康生叫假特务张克勤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假典型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侦探故事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康生说：“在所有的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国民党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人们对大后方的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人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一个解答”。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不敢说陕西全党是“红旗党”，但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

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这样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而他自已却另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是戴笠派来的(即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的(均无真正的特务活动,只有组织上的关系,并迅速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其余都是道道地地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些,不过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

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是谁也不清楚)身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做不了的。”

康生在审干运动中所推行的政策和一整套错误做法,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真正是后患无穷!这全是康生的汗马“功劳”!

康生和中央

康生作为掌握敌情的社会部部长,对敌情作了“特务如麻”的错误估计(姑且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犯了主观主义),开始时,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利用了破获的“戴案”,似乎对这种估计也作了印证。所以康生的估计和他决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受了蒙蔽。例如,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不但为毛泽东所认可,而且从王实味案出发,毛泽东还作过整风要解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

党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不少奸细分子,其方法自然是巧妙的,其数量也是惊人的,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

证明”。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实事求是甄别工作,也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

中央的文件中有受康生的干扰而把敌情夸大的一面,也有如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正确地进行审干工作的一面。但康生对中央文件取其所需,一味搞他自己那一套。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对康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44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的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另一方面我们把毛主席的谈话也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1944年4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几个单位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而对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实际负责的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

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他翻案的实际行动，还更大规模、更严重地施展了害人的阴谋和惯伎。

康生的钻营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干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思，并把对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生活工作了15年之后，于1940年3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先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摸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办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柬，但未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声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工作，就更急于同我拉上关系。

1941年，机会来了。毛主席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近旁。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解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搞好关系、站得住

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后来我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很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加之他听说我可能要回共产国际，而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就想利用我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5年间与我接触频繁。尽管他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有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1898年。1917年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叔平，1924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云，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即是康生。他出生于山东胶县的地主家庭。民国初年，土匪蜂起，他们全家迁到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字画文物。康生也确有才气，很小学会刻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帖，也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最特别。他在得意忘形时，曾以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儿多、办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裁剪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他，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在枣园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声音也

不高，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这就给周围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克农面前不知又说了些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对我很不满意，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了进来。他用赶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论定”。

康生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谜。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忽然有一天，在杨家岭，他特意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来加入了国民党，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后期，曾把他列入战犯名单。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笔者注）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尚健在。解放后，我曾写信问过他有关康生入党的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所料（此信我尚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至海参崴的途中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据他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根本不知康生何时入党。

康生的入党是个谜，康生何时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谜，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也就无人重视了。而康生同王明勾结之后，很快代替了顾顺章（此人工人出身，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候补委

员,分管敌斗争,领导特科,后叛变——笔者注),掌握了党的机密和保卫机关——特科。直到“文革”,当年幸存下来的同志,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长,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况,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康生负责的特科曾经秘密处决过党员,都是以“混入党内的特务”的罪名处决的,许多党员都认为被处决者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敌情的特科所为,只好表示相信,还得承认自己“嗅觉不灵”。

康生长期占据着保卫部门,并利用这个岗位陷害了无数好同志。陈云同志说得对:“康生是鬼不是人”!

康生与王明

1929—19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1931年初,党中央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是令人莫明其妙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于要把王明塞进中共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内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则是整天在密室里阅读报刊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嗅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的工作;而王明和米夫也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统统交给康生去干。康生果然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的大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刻,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简直是天大的奇迹!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后康生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

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

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匆匆去了苏联。康生夫妇仍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才在王明支持下也去了苏联,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同王明在一起,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行径。1934—1938年间,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的时期,也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了。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捕下狱的,幸而未受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从苏联监狱获释。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

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极力提拔他,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为了把王明拉进了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迫不及待地策划了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

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不惜自己退到二线,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费尽心机,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代表中共成了国际执委会的书记之一。于是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有限;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和人其事越来越多。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小鬼”,意思

是“人小鬼大”,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但他常用一些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只是结果常常使自己狼狈不堪。

在这种窘迫情况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帮了他们大忙的康生。使其成了王明离不开的副手,被不断委以重任。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作了“副报告”,在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密切了,曾不止一次地联名向党内外下发文件,东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冯仲云)就多次收到过“王康指示”。“文革”中,康生得知冯仲云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从冯仲云那里骗出来一份,予以销赃灭迹;但后来又从林某那里听到冯仲云并未全部交出,手里还存两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给冯仲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冯仲云很快就死于狱中。

1936年,苏联肃反时,在国际机关的党员大会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党阴谋家,王明当场站出来揭发,批判米夫。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王明的“人小鬼大”、“机灵”程度可见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说王明“这一转变,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其实康生的机灵劲比王明有过之无不及。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据后来曹轶欧对我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行列,康生脑子里立刻转起了念头,自己将如何转弯和改弦更张。不过,他初到延安还是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刻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视、排挤、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康生的“鬼”迹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远远不够。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代表。会议期间，康生忽然出现，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使他无法活动、不堪忍受，以致后来被逼病了，神经失常了。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无动于衷。这—是他的谎话太离奇，不近情理；二是不少同志对国际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知咋回事。而康生所选择的正是这种对象，他要给人们一个“康生反对王明”的印象，让人们替他去做宣传。我当时对他这一通谎言的意图虽不甚了解，但对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很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再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支支吾吾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但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得不回答了，但他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干会议情况如实地向他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当时在延安，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任全国政协委员。写此文之际，他还健在），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10年。康生1937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娘，1938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政

务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已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五个春秋。我问她：“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又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曹轶欧极力阻拦，不让释放。一直到1946年延安甄别工作结束时，她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1928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1937年回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仍把他当作自己的老熟人，天真地认为自然应该捐弃前嫌，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于是他来到延安，找到康生。从此，他便陷入了罗网。康生先是赠他一首侮辱性的诗，诗曰：“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然而匡亚明要到别处去工作，他却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身边，勉强给了一个政治秘书的头衔，却不让他做实际工作，更不允许接触重要文件。匡亚明曾向我吐露过他的苦恼。我也曾问过康生，他那首赠诗的含义，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亚明所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了。

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是要求借路解放区，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被押到延安后，康生命保安处关押起来，不许他们前行。直到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后来，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

安处处决了这批人。处决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个枯井里。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后，发现了这些尸体，也有人告诉了这些尸体为何许人。胡军便将尸体拉出来陈列示众，大肆张扬了一阵。对此事，彭德怀非常不满，大发脾气，因为此事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很坏。接着，中央的周恩来、陆定一，西北局的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对此都作了批评和指责。保安处处长周兴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受到批评。而真正下命令的人康生却装聋作哑，似乎全无责任。

“文革”中，康生操纵一部分红卫兵，揪斗当时在北京养病的山西省省长王世英，不拿出任何证据，只凭“王世英是坏人”，便被残酷地活活打死。而置王世英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王世英对康生在上海时的劣迹和罪恶行径太了解了，才借机杀人灭口。

康生与江青

江青钻到毛主席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在延安时，康生和江青分别同我闲聊中，吐露过一些真情实况，后来目睹种种怪现象，促使我把许多零散印象连贯起来。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改为蓝苹，出生于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家道中下。蓝苹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扬，父母不许她上学，裹脚待嫁。蓝苹自幼聪慧，长相端正窈窕，在城内东街南头上小学时，每天必经当地大户张家门前。这就是康生的家。

康生是诸城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送着打这里经过的蓝苹。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蓝苹虽然年龄还小，但身材修长，发育较早，从外表看，也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蓝苹14岁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便领着她学艺卖艺，她本人也因为走南闯北而高兴。当她知道上海是个繁华世界时，便决计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蓝苹不约而同到了上海。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很快与女同学曹轶欧打得火热，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曹轶欧和康生既是同

乡，又同属贵族阶层，他们一拍即合。曹轶欧正年轻气盛，因为到处碰壁，曾给鲁迅写信陈诉自己的郁郁心情。然而她居然能驾驭康生不许他寻花问柳，甚至不许他与女同学接近。所以康生虽然知道蓝苹在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蓝苹凭自己的美貌和小聪明，在上海艺人行列中十分活跃，也参加了一些党组织的活动。当时她尚有自知之明，不过分追求自己的身价。只是由于放任不羁，声誉不高洁，只是个四流明星。

活跃的蓝苹很快成了国民党特务关注和控制的对象。康生直到临死之前，才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在上海时被特务机关突击逮捕过，曾逼其叛变自首，答应为他们服务后才释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蓝苹经西安到了延安。在西安与她同行的人，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便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是“文革”后人所共知的。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康生知道蓝苹已到延安，在鲁艺学习，很快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苹以及同蓝苹一起从西安来的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亲自管理。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枣园的警卫森严，已改名江青的蓝苹却可以自由出入去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康生和曹轶欧便迫不及待地吧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接触时间不长，毛泽东便匆匆与江青结婚。

“七大”之后，江青在康生、曹轶欧相助下，从中央党校弄到一纸证明，为她在党校学习时补做了个“鉴定”。其中说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数月，有进步；经过审查，无问题。可安排工作等等。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她给我看过。我让她自己

把“鉴定”保存起来，并把她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但未安排工作，让她好好照顾主席。对这个安排，江青显然是不满意的。

江青不甘仅仅是个夫人的身份，一有机会便显示自己。毛主席对江青并不那么了解。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很微妙，国共之间是战是和都在猜测，江青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形势，暗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要回原籍，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的胞姐带一封家信。这位同志看了这封信后，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信中充满了对我们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后来还是向组织作了汇报。可是这些事毛主席一直不知道。

康生到北京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中央机构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了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了中央委员会，在开会时，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五位书记，有时还请彭德怀、张闻天或其他有关同志列席。而康生一直没能参加这样的会议。（七大后，为了工作的方便，书记处五位书记都住进了枣园，张闻天和彭德怀也住进枣园，只有康生仍留杨家岭，但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传达”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

胡宗南进攻延安，康生既怕死，对战争又一窍不通，赶忙先撤到瓦窑堡并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拼凑了一个班子，并且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跟他“学习”。1947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路过郝家坡，在那里留宿一夜。次日清晨，我临行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

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有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康生在晋绥参加完土改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分局担任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候。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了一场闹剧——

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一条腿，接着曹轶欧也“精神失常”，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主席，心里更明白，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来台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时留在山东，他们来到了北京。当时我恰好到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一个上屋。我回来后，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并叫我不去看他们。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要我替他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报告。因为已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有看法的，不太想去反映。但我还是想帮助他，便向刘少奇同志谈了，少奇同志表示可以考虑给他工作做。

一两个月后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碰巧见到了负责为康生医病的主治大夫苏联专家，我们顺便聊了几句。

问：康生到底是什么病？病情严

重程度如何？能医好吗？

答：这要看对谁说，又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那就不能算病号，而应当让他出去做工作；但对负责干部、领导人来说，那就应该当做病号看待。你不要奇怪，我们那里也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问：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给他吃药？

答：看吃什么药。我们给他吃的是开胃、小补品、健脑、安神的药片，使他睡好、休息好、精神振作、心情愉快，这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么康生又是怎样养他的“病”呢？他除了访问朋友之外，大部分时间则用于搜集古董玩艺、笔墨纸砚、陈字画等物。常请到他那里作客的有陈伯达、田家英和我，还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向我们展示一二，夸耀自己的爱好特长、欣赏能力和鉴别水平。一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没落士大夫气。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康生紧张地揣摸大会的动向；曹轶欧为了弄到一张列席证而疯狂活动。八大召开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主席台的后面。此次大会给饶漱石的问题定了性，康生立即捕捉到这个机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病因正是饶漱石迫害所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也是华东局的常委，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笔者注）。要我替他写信转给毛主席。我明知他撒谎，怎敢给毛主席传递这样的信？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饶漱石也倒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没有给他转。后来得知，他通过其他途径还是转给毛主席了。此外，他还对人散布说：“凌云（延安时社会部的干部，离休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康生在山东时，他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是特务”、“沙涛（幼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也是社会部的干部，在山东时给康生当机要秘书）监视”他。后来，在“文革”期间，凌云和沙涛二人都遭到康生的迫害，关进秦城监狱。

八大以后，康生急于要出院工作，但实在很难给他找个适当的岗位。最后决定暂时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陆定

周恩来与第一次文代会

○吴泰昌

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这是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的重要一页。

我从参加大会的阿英同志日记中看到，周恩来同志为大会做了大量工作。大会筹备期间，他曾多次找文艺界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两次几乎通宵达旦。5月13日日记：“今晚约谈话。八时，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胡愈之、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10时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次新闻纸问题，又次上海文化工作。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三时半。”显然，这是周恩来为了开好大会安排的一次重要的了解情况会。从参加的成员看，包括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刚从港澳、海外归来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谈了近五小时，内容相当广泛，中心自然是文代会问题。所谓“上海文化工作”，是有关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事。“新闻纸问题”，是指今后出版书刊用纸的问题。另一次是在大会正式揭幕前几天。6月24、25两天日记记载，文代会党组曾长时间讨论了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6月26日，周恩来听取了党组的汇报，这天日记载：“晚九时，与周扬同志等去中南海，向周副主席汇报，至晨四时许完。”汇报近七小时，可见谈得是何等

详尽，他听得是何等仔细，指示又是何等具体。

从日记中得知，在会议前后他还亲自过问处理了文化界一些重大的政策性事情。例如，郑振铎同志和阿英同志曾谈起，当时一些珍贵的文物无人管理，有散失和被盜、被损坏的危险，希望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管理这方面的事，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后，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5月27日日记：“与振铎同志谈散失文物事，拟成立组织整顿之。请报计划，再找周副主席研究。”5月31日日记载郑振铎来找阿英，阿英立即“写信给周副主席”。6月3日日记：“晚饭后，得周副主席电话，云十一时来访。候周副主席至夜四时，未见来。”6月4日日记说明周副主席昨夜临时有事未来。6月7日日记：“周副主席约下午五时谈话。到中南海，与副主席洽谈了文物管理组织等问题，至七时，与颖超同志、李琳同志回北京饭店。晚访振铎同志。”周恩来从党的统战政策出发，对文艺界一些名人的安排，也作了重要指示。例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会后是回上海还是调北京，周副主席都亲自指示。7月30日日记：“齐燕铭同志来电话，谈梅先生问题，周副主席要其留下。”

这几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可以看出周恩来对革命文艺事业异常关切和付出的心血。

一带着康生出去视察工作，总是把康生推到前面，陆定一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和谦让，康生却把这利用来抬高自己。

到了1958年初，八届二中全会时，康生已经很神气了，虽然尚无正式工作，但他已经以“中央首长”自居，端着大人物特有的派头出没于各种场合。

1963年，八届四中全会上，康生

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又从小说联系到习仲勋，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给死魂灵高岗加上“里通外国”的罪状，既“里通外国”，就需有个“通道”，这“通道”就是师哲和卢镜如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更进而搞出个“西北集团”，

（下转30页）

西镇南胥

吴山

○竞明

陕西、山西、浙江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吴山，在古代享有盛名。陕西的吴山在陇县和宝鸡交界处，古称西镇，又叫吴岳，为我国“五镇”之一，与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齐名。山之东有吴岳庙建筑群，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五九六年），历代屡毁屡建，现存殿宇多为明代重建。庙内有宋、明、清代巨型碑碣，明代吴山全景图碑刻和一些古代名人的题词碑石，被称作“小碑林”。山有十七峰，以镇西峰、会仙峰、灵应峰等最为著名，还有餐霞洞、真人洞、元鹤巢及凤凰石等胜景。

山西省南部的安邑县，有一座跨越夏县、平陆县界的吴山，是中条山的支脉，又名虞坂、吴坂。这里有一段伯乐巧遇骐驎的故事。春秋秦穆公时，善相马的伯乐（又名孙阳）路过吴山，驾监车之骐驎正伏在监车之下，见伯乐即长鸣不止。伯乐怜骐驎而泣，于是骐驎更为俯而喷、仰而鸣，声闻于天。古书写道：“使骐驎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

杭州西湖东南方的吴山，春秋时为吴国南界，由此得名。因吴国大夫伍子胥以忠谏死，浮尸江中，吴人立祠于山上，又称胥山。山上有茗香楼、极目楼等建筑，登楼眺望，左西湖右钱塘江，杭州全景历历在目。明代有名的书画家徐文长（徐渭）曾经题联：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灯火，尽收此处楼台。

吴山的古老樟树，为其他地方所罕见，茗香楼前的宋樟，已有七百多年高龄。女侠秋瑾曾吟诗赞道：“老树扶疏夕阳红，石台高声近天风。茫茫灏气连江海，一半青山在越中。”1986年，吴山之胜景被命名为“新西湖十景”之一，由近代画家费新我左笔书写“吴山天风”四字，制成大牌竖立在通向吴山的各个路

口。“天风”二字即取自秋瑾的诗作。

吴山东南端为紫阳山，山石嵯峨，山下有瑞石古洞，洞侧感花岩上刻有宋代苏东坡《宝成院赏牡丹诗》。米芾手书的“第一山”三字，迄今犹存。紫阳山西端的石壁，有“吴山第一峰”五个大字，相传为南宋朱熹之手迹。峰上有始建于隋唐时的仓圣庙，祭祀传说中的黄帝时文字创造者仓颉。庙联对仗工整，气势非凡：

上溯羲皇画八卦时，文字权舆，秦而篆，汉而隶，使后来缣素流传，不外六书体例；

高踞吴山第一峰顶，川原环抱，江为襟，湖为带，看从此筭华大启，振兴两浙人才。

联内“羲皇”是传说中的古皇帝，在他统治时，开始画八卦。“权舆”即开始。“缣素”即书画可用的白绢。“六书”指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

吴山上的伍子胥庙，初建于汉代。两千多年前，春秋吴国大夫伍子胥为报楚平王残杀父兄之仇，掘墓鞭尸，后因忠谏被吴王夫差赐死，自尽前悲愤表示：“……抉吾眼县（原文是县字。见《史记》七）吴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后吴国果亡。《史记》对伍子胥的坎坷遭遇列传记述，赞之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烈大夫”。伍子胥庙有古人题联多副，有两副是：

缅英姿于第一泉边，仇复君亲，赐剑尚留遗恨在；

隆清香以二千年后，神依吴越，灵旗犹拥暗湖来。

* * *
生全孝，死全忠，拼此身报答君亲，忍辱含冤，志士仁人今感泣；

朝在潮，夕在汐，凭浩气流行江海，御灾捍患，吴山越水古英灵。

琅 玕 怀 古

小时候就听说，我们家乡诸城东南一百多里的海边，有个琅玕台。长大后，读了一点历史，对琅玕台知道得更多了一些。

据史书记载，琅玕台最早为越王勾践所建。《吴越春秋》中说：“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玕，立观台以望东海。”《括地志》也说，“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琅玕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玕故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琅玕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南登琅玕，大乐之，留三月。下诏徙黔首三万户琅玕台下”，重修琅玕台；并“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一年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第二次到琅玕。过了九年，他最后一次出巡时，第三次登琅玕台。不久，他便在这次巡游的途中病死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为了“威服海内”、“臣畜天下”，也学他的老子，由李斯随从，东行郡县，“尽刻始皇所立刻石”，“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到了西汉，汉武帝刘彻也曾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和大治三年（公元前94年）两次巡狩至此，并登琅玕台。此外，白居易、苏东坡等历代著名文人也先后到过琅玕台。

多年来，我一直想去看看琅玕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最近才有机会实现这一夙愿。

我们首先来到离胶南市二十三公里的夏河城。夏河城便是原来的琅玕城。周代为齐国的琅玕邑。春秋后期，越王勾践“徙都琅玕”，就是将越国都城从会稽（今浙江绍兴）迁到这里。秦置三十六郡，这里是琅玕郡郡治所在地。秦始皇每次登琅玕台，都在此停留。特别是第一次，竟乐而忘返，逗留达三月之久。历史上琅玕

曾是一座相当繁华的城市，琅玕港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港口之一。到东汉以后，逐渐衰落下来。明代永乐年间曾重修此城，因当地人多死于战乱，明成祖朱棣让有功将官兵卒退役留居此地。现在，夏河城是青岛所辖胶南市的琅玕镇。全镇人口37,000人，想必大部分是秦始皇迁来的三万户“黔首”和明代退役将士的后裔。原来琅玕古城的面貌已不可见，只是在镇西北尚有两处故城城墙的遗址。

我们到夏河那天，正巧逢集，街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在这里稍事休息后，就前往东南六公里的琅玕台。这是一座海拔1800多公尺的小山，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顶。琅玕台东、南、西三面环海，东面海滨有一片很长的金沙滩，是个极好的天然海水浴场。南面海上有一小岛，叫斋堂岛，两面还有一岛，叫沐官岛。相传秦始皇最后一次到琅玕时，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在派遣徐福出海的同时，曾和随行官员在岛上斋戒、沐浴，以示虔诚。“斋堂”、“沐官”两岛因此而得名。

琅玕台上的历代建筑，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原来作为台基的几层夯土。秦始皇的《琅玕刻石》也早已没有踪影，存下来的只有秦二世石刻诏书的残碑，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这是目前仅存的两块李斯所书秦代残碑之一（另一块是泰山刻石残碑）。胶南市和诸城市博物馆存有这块残碑的复制品。

我们站在琅玕台上，望着茫茫的大海，不禁发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慨叹。最后，每人捡了几块砖瓦碎片，权当“秦砖汉瓦”，踏上归程。

○李 后

从京沪密谋 到川南起义

○李 伟

43年前,淮海战场上正两军激战时,南京、上海两地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地下组织策划着一起倒蒋大暴动。可惜事败未成,几位同志血洒黄浦江畔。暴动的主要发起者民革负责人王葆真,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保住了暴动的秘密,使暴动余波以胜利的姿态,在祖国的西南画上了句号。

南京除夕夜

最后的晚餐

1948年12月31日,阳历的除夕夜,在南京城里,有三个悲欢不同的场景。第一场景是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下午4时,蒋介石官邸举行除夕晚宴。尽管蒋政权已奄奄一息,此时此刻,还是应该有几分欢乐的气氛,然而,蒋介石却愁眉不展。一件件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

11月底,“第一夫人”宋美龄带着总统蒋介石的使命亲赴美国,乞求援助,岂料吃了闭门羹。杜鲁门与马歇尔作了相同的答复:“贵国现在局势恶化,任何军事援助都于事无补。”接到宋美龄的密电,蒋介石忧愤交加,连骂:“美国人背信弃义!”

气还未消,又一件事使他“痛彻肺腑!”

12月24日,新任总统秘书长吴忠信拿来白崇禧一份“亥敬”电(“亥”代表12月,“敬”为24日)。

“健生(白崇禧的字)来了一份电,请总统过目。”吴忠信战战兢兢地说。

蒋接过来打开一看,内容是:

“……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损失殆尽,倘无喘息休整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意念及此,

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危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平诚意转告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蒋介石看完电报冷笑了一声,随手把电报扔在一边,自言自语说:“真是内外夹攻。”

就在这时,张群又匆匆进来:“报告总统,程潜发表通电。”

“他说什么?”

“他……”张群噤嘴不言,数分钟后说:“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哼!”蒋介石强忍怒火,笑道:“他们两人倒是走在一起了。”沉默了一会,他咬牙切齿说:“我偏不下野,看他们怎样。”

歇了半晌,张群又说:“河南的张轸也发来电报,语辞咄咄逼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怒火:“这个狗头军师(指白崇禧)串通湘鄂豫三省,要我好看。好!看他们有多大作为。”

主人不快,客人哪有笑脸。前来赴宴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中常委除张群外,还有陈立夫、谷正纲等40余人。这些人个个表情阴郁,忧心忡忡,似在赴最后的晚餐。

蒋介石阴沉着脸出来了:“大家

就座!”

全场寂静无声。杯盘盏碟之声响过,蒋介石用低得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明天(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这篇文告出自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之手,原来的“一支笔”陈布雷已经自杀。

张群读:“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刚读完,蒋介石侧过脸问李宗仁:“德邻,你的意见怎样?”

“我与总统的意见是一致的。”李宗仁回答。

就在这时,眼看行将成为孤臣孽子的谷正纲,突然边哭边嚷:“总统,您不能走啊!您要继续领导我们……”

蒋介石心中一动,但仍板着脸。

“我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这将対士气民心发生不良影响。”谷正纲说。

大厅在骚动,将相官僚在窃窃私语。

“现在是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张道藩尖着喉咙在喊。

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住了，气呼呼地说：“我并不要离开！是你们党员要我离开！我的下野，不是由于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全场静了下来，有人愤懑，有人惶惑，也有人在冷笑。

李宗仁一声不响，冷眼看着这好戏。然而，蒋介石却不放过他，侧过脸对他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说到这里，他“嘿”了一声，冷冷地说，“告诉健生，他那些通电可到此为止了，动摇人心……”

李宗仁当然知道这话的分量，他勉强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请多多赐教！”

后来蒋介石的交代是：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节重庆，余汉谋执掌广州，陈诚当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他还把中央银行的所有黄金、白银、美钞全部运往台湾……一切就绪，他才下野。这是后话。

那天总统的除夕晚餐就在悲悲切切中散场。

郭公馆的晚宴

南京四条巷郭汝瑰公馆。

郭公馆习惯过旧历年三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阳历年的除夕晚餐。

公馆的所有人（司厨、司厨、勤务兵等等）都放假一天。郭夫人这天却不清闲。她一早就去科巷菜场，亲自置办菜肴，今晚她要设家宴招待一位远方的客人。

整个上午，郭汝瑰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要清理一下纷乱如麻的思绪。最近一段日子里，他发现有几个危险的征兆。蒋介石似乎察觉了他。11月，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开始，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后，蒋介石把徐州的杜聿明召来，商量解救黄维。11月28日上午，会议在国防部的地图室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斐、侯腾、杜聿明、郭汝瑰和第三厅

二处处长赖成梁。

会议开始，郭汝瑰报告了作战计划。他建议三点：一、部署在蚌埠的防守；二、黄维应站稳脚跟硬拼；三、徐州的杜聿明军应全师南下。

郭汝瑰的话刚落音，杜聿明就说：“徐州各兵团沿铁路正面进攻，进展甚微。共军有10道预备阵地，正面进攻是不可能了，徒然增加伤亡。”

“那依你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蒋介石板着脸问。

“学生的意见，最好把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危。”杜聿明道。

“这一带河汉纵横，大兵团如何运动？”有人问。

杜聿明笑而不答。会场上也不再有人讲话。

顾祝同轻声对蒋介石说：“光亭（即杜聿明）要和总统单独谈。”

蒋介石和杜聿明进入书室，没多久，就出来了。旋即散会。

郭汝瑰心想：顾祝同、何应钦是知道杜聿明要谈些什么的，是避着我。杜对我有怀疑。这是个危险的征兆！

不久，杜聿明也和黄维同一命运，在徐州撤退后，于永城陈官庄地区陷入解放军的重围。

12月8日，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从陈官庄乘小型飞机到南京，请示杜聿明的部队怎样行动。

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你回去告诉光亭，可以击溃当面的敌人再南下！”

郭汝瑰心想，既然在座，话是非说不可的。他想了一下说：“如果杜部能有力量击破当面的敌人，早就不会被包围了。这时一定要突围，如果一旦通信系统失灵，势必全军瓦解。”

“难道就让光亭的20万军全军覆灭？”蒋介石很不高兴地问。

“这当然不能！不过，要救这20万大军，依我之见，唯一的办法是集中兵力从蚌埠方面出击，这也许可以死中求生，否则必然全局皆输。”他侃侃而谈。

这更恼了蒋介石，他又问：“还有什么意见？”

“别的意见没有了。”郭汝瑰回答。

“那么，你去吧！”

郭汝瑰不由心中一惊，怎么研究作战不让我这作战厅长参加？！这又是一个危险的征兆。于是，他下了决心要离开这作战厅长的岗位。

郭汝瑰的预感，日后证明并非是神经过敏，而是事实。怀疑他的是杜聿明。

杜聿明曾对顾祝同、何应钦说：“郭汝瑰这人不可靠，恐怕他和共产党有联系！”

杜聿明在未陷入陈官庄重围前，曾后悔在11月28日那次会上，没有向蒋介石说明他怀疑郭汝瑰是潜伏的共产党的看法。而老头子听了郭汝瑰的摆布，要他向共军攻击，终于陷入全军覆灭的境地。

34年后，杜、郭两人经历了解放后的不同遭遇，1982年，再次相聚。

“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郭汝瑰问。

“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杜聿明回答。

“是谁？”

“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这个谜，郭汝瑰终于没有得到解答。当时，郭汝瑰有所预感后，匆匆跑到上海去找负责联系的共产党人任廉儒，请党对他今后的行止作出决定。任廉儒约他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见面。

上海“凯歌归”餐厅，特务头子李岳阳所开设。踏进餐厅，红男绿女，济济一堂。正中的音乐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喜洋洋”、“步步高”等中国民乐。

他忐忑不安地不时看着门外。“怎么，还没有来？莫非……”

他虽然是穿着便衣，但看着那些穿军装佩金板子（肩章）的人出出进进，如同坐了针毡，万一碰上一个熟人怎么办。还好，等了一刻钟，任廉儒来了。一眼就看到坐在桌旁的他。

略略寒暄后，郭汝瑰以嗔怪的口吻说：“你怎么选这地方，这是特务开的餐厅。”

“我怎么不知道，正因为是大特务开的，小特务就不来，相对来说就安全些，也不会惹人疑心。”

“究竟有什么事？你这样冒险到

上海来？”

郭汝瑰说：“我在南京耽擱不得，即使没有察觉，他们已开始怀疑我。”

“你讲清楚些！”

郭汝瑰把两个危险的征兆讲了一遍。

“还有，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徐蚌战役也是朝夕间的事，国民党一败涂地……我知道蒋介石这人，常把失败迁怒于别人，何况他已开始对我不信任。万一情况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要求立即让我回到解放区去！”

郭汝瑰一口气说出了他的要求。

“事关重大，这我不能作主，待我向组织汇报后，再答复你吧。”

分手时，任廉儒告诉他，大约一周后到南京。这正是阳历年的除夕。

掌灯时分，任廉儒如约来到了郭公馆。郭汝瑰把他带进楼上的密室。

“今天是1948年除夕，学兰亲手操办了几样家乡菜，我们可以欢叙欢叙。”

“除夕对我倒没有什么，不过，夫人的手艺定要领略领略。”

这时方学兰送上两杯茶。她笑着说：“哪有什么手艺哟，胡乱弄弄呗，吃了不对劲，就包涵些。”

晚宴就设在密室里。席上只有宾主二人。方学兰不时到厨房去操办菜肴。

饮完一杯酒，郭汝瑰急切地问：“我的意见，组织研究了吗？”

“哈哈，你都不让我尝尝嫂夫人亲手做的佳肴。”他又说，“好吧。我说汝瑰同志，党组织非常赞同你的愿望。但经过再三研究，组织认为解放区不乏文艺和军事人才，你去发挥不了很大作用。现在渡江在即，估计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直下，一鼓荡平。预计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你如果能掌握一支部队，带到西南，到时候设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这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

郭汝瑰摇摇头：“我怎么没有想到，还是组织考虑得远。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他又说：“不过，蒋介石已对我不信任，他是否还会让我带部队！”

“困难当然是有的，你可运用一切关系嘛，组织也会帮助你。”任廉儒

安慰他。

丰盛的菜肴一道道上来。他们开怀畅饮。

院落静悄悄

南京糯米巷河北同乡会馆。

一盏昏黄黯淡的门灯，院落静悄悄，杳无人声。这里全无节日的气氛。

第三进一间幽静的房间里亮着灯。4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着。桌上无酒无肴，只摆着一大盘花生。各人面前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来，我们以茶代酒，欢迎远道来的客人。”他，高大的个子，一口东北话，是民革南京临工委的负责人孟士衡。另一个中等个，脸色苍白，说话近似山东口音：“都是自己同志嘛！哪是什么客人，用不着客气。”

“这位是江淮军区派来的代表王虎臣同志。”孟士衡把他介绍给大家。

另外两个人都站了起来和王虎臣握手，同时说：“王同志，我们欢迎您。”

这两人是：民革南京临工委的副主任胡勤业，与首都警察厅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海亭。4个人在这里集会，酝酿与商讨一项惊天动地的计划。

王虎臣喝了一口茶，轻轻地咳了一声，说：“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蒋军47万人被歼。济南于9月24日解放，王耀武被俘。徐州战场，杜聿明40万军队已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将是最近的事。现在平津战役也已打响，胜利预期不远。”

在座的人，听了这些喜讯兴奋异常。

“看来江南解放也快了吧？”胡勤业问道。

“是的。现在我华东野战军已饮马长江，我江淮军区的前哨已到六合，浦口也有我军行踪，南京已兵临城下，解放为期不远了。”

“这样看来，我们也要加快行动了。”孟士衡说。

“是啊！上级派我来就是要听听你们的计划，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王虎臣道。

胡勤业推一推刘海亭，说：“海亭

兄，把你的想法说一说。”

刘海亭挪了一下座位。靠近王虎臣，不急不忙地说：“兄弟目前担任着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由我指挥调遣的军警、宪兵有8个团的兵力。那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与我是生死之交，西区、南郊、北郊各警察局局长也都是我的同学……”

“在敌人的心脏里有这样一支兵力，这可了不起。”王虎臣以敬佩的眼神看着他。

“我们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国民党中央那些重要人物的住宅，如李宗仁、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都在我的辖区内。他们的住宅警卫都是我派遣的，我经常在那里出入。我们一旦起义，就可以像当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一样，把李宗仁等扣留起来，迫使他们接受和平条件。”

“妙，妙！如果成功，这将要震动全国。”王虎臣更为高兴。

“我们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京沪暴动计划，让孟主委来说。”刘海亭眼睛盯着孟士衡。

“好，我来说。海亭兄把这计划全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是京沪两地配合起来干。内容大致是：1. 以南京的燕子矶为据点，迎接解放军渡江；如果解放军没有船只，可以由江南派去；2. 控制南京中区、北区、西区、南郊、北郊五个警察局和保警总队、民众自卫总队等地方武装力量，并由我们的成员马广运，他是中区警察局局长，派出武装控制明故宫机场，防止国民党的那些头头逃跑；3. 起义发动后，就派军警占领三个据点，即清凉山、挹江门和鸡鸣寺，居高临下，控制全局；4. 南京方面枪声一响，上海也立即发动，首先控制北站的铁路交通，同时干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

“上海有这个可能吗？”王虎臣表示怀疑。

“有可能。上海警政界有不少人是我的同学。如北站警察分局副局长吴励，还有我的知友崔恒敏，他担任上海驻卫警察总队代理总队长，手下有8000多人，分布在全市机关、码头、工厂、仓库……这个计划就是和他商订的。”刘海亭插话回答。

“王同志，我们要说的都已经说

了。请你对我们的计划评估一下，看是否可行？”孟士衡谦虚地征求他的意见。

王虎臣虽然是江淮军区的代表，但组织事前并没有告诉他有什么计划要他评估，这样庞大复杂的行动计划他也没有经历过。于是，他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南京的情况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我回去向组织汇报，等党研究决定。”

“这也好。我们也要向民革请示。”孟士衡说。

京沪密谋事情败露，上海暴动遇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不少共产党员和民革志士血洒刑场。然而，斗争没有停止，参加京沪密谋的郭汝瑰将军及所属部队又在西南一线，策划了新的行动……

暴动余波在西南写上句号

党派来了联络员

……王葆真与上海地下民革的策反对象刘昌义、张轸已先后起义，现在只剩下远在四川的郭汝瑰了。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由上海回到重庆。

如鲸鱼入海，郭汝瑰回到四川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刚筹建的72军，如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两个月后就弄足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陈诚系的罗广文拨给他一个师，这样他就有了满满的3个师9个团。其中有3个团还都是老兵。

这时(5月)地下党的联系人任廉儒也从香港带着电台密码、呼号来到重庆，郭汝瑰可以就近得到党的指示。

按西南军政长官行署的命令，72军在招足兵员后，移驻到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正合郭汝瑰的心意。宜昌偏处川西南一角，便于发动起义。

在和罗广文的周旋中，郭汝瑰深得罗的信任。罗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建议，成立叙(府)泸(泸州)警备司令部，并推荐郭汝瑰兼任叙泸

警备司令。这时张群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矛盾很深，张群千方百计要削弱他的权力。罗广文的建议立刻被张群接受，叙泸警备司令部成立。郭汝瑰任72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这样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

对郭汝瑰的起义，党非常重视。又派出任英儒、赵力钧、展云剑三人，经历重重险阻，于8月间到了重庆，与任廉儒接上关系。

任英儒是任廉儒的弟弟，赵和展是二野联络部的。他们到泸州后，任廉儒就立即带着赵力钧又赶到宜宾去见郭汝瑰。因郭在那里视察部队。

郭汝瑰决定派赵力钧到72军重庆办事处去当办事员。

用什么名义进去呢？人家会不会怀疑？任廉儒提出他的意见：“让他持一封要人的八行书(即介绍信)，而你非安排不可。”

“你这一说提醒了我。你们去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他的名义写一封信来，请给亲戚赵力钧安排一个小工作，我一回泸州就让他来见我，我就派他去重庆办事处。这是妥当的。”郭汝瑰不急不忙说了一套办法。

“顾祝修何许人？”赵力钧问。

“他嘛，总参谋长顾祝同的弟弟，这样的面子，我这个军长不会不给。安排你谁会怀疑。”

几天后，郭汝瑰回到泸州，赵力钧果然拿着顾祝修的介绍信来了。

郭汝瑰装着并不相识，看了信笑笑说：“你是来谋小差事的，既是顾先生力荐，我怎么安排呢。”

他把军需主任叫来，说：“这位赵先生是顾总长的弟弟介绍来的，你就把他安排在重庆办事处当办事员。他做事不做事听他的便，照发他薪水便了。”

赵力钧就此有了公开的身份，在重庆住下来进行着他的活动。

历史悲剧的最后一幕

1949年10月13日，国民党的残军撤离广州，“政府”迁到重庆。10月15日在重庆正式办公。

郭汝瑰从任廉儒那里得到消息：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的大军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郭汝瑰判断，

二野的部队将从湘西武陵山入川，先攻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将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72军必须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入成都地区与国民党的主力作战，自己利用这一形势率部队起义。

就在这时——10月下旬蒋介石偕他的儿子蒋经国飞到重庆，亲自主持作战会议。会议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郭汝瑰和44军军长陈春霖一同到重庆与会。

陈春霖说：“我们开会得小心，丢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只剩这西南一角，老头子一肚子气惹了他可要倒霉。”

“你说的是，反正我们少说话就是了。”郭汝瑰说。

郭、陈两人走进会议室，会场里坐得满满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重庆的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三处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刘文辉、邓锡侯等一千人物。会议室墙壁上挂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一张餐桌。

蒋介石强作冷静说：“目前党国正经历着艰危，希诸位协力同心，精诚报国，同时要坚定必胜信念。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只要我们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待国际局势变化，我们就可反败为胜。今天请大家就是研究如何固守西南，共军从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说到这里，蒋介石面向刘文辉、邓锡侯说：“请大家畅所欲言，共献良策。”

静场片刻后，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按他的分析，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理由是由此路交通方便，易于展开。他说：“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设防于川北剑阁一带，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沈策说完后，会上没有人吭声。郭汝瑰原准备讲话，加上又接陈诚的指示，要陈系部队紧靠胡宗南，他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这时陈诚系统的罗广文起立发言，他赞同沈策的意见，并主张72军不动，以免后方空虚。这正中郭汝瑰的下怀。

沈策、罗广文定了调子，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蒋介石表示察纳雅言，又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你们

两位有否高见？”这两人当然识相，都表示没有意见。蒋介石遂即作了把主力放在川西北的部署，这个圈子一兜就是几千里，这是兵家大忌。郭汝瑰心中暗暗发笑。

郭汝瑰回泸州没有几天，忽然接到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电话：“请即来重庆，委员长召见。”

是祸是福，郭汝瑰联想起不久前的几件事，他更感到凶多吉少。

不久前，陈诚的亲信赵志尧（预算局局长）来找他，说：“辞公（即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去安全些。”

这显然是人质！他当即以妻小到台无以为生为由顶回去。赵志尧以陈诚自会照管作辩解。他还是用种种措辞顶住。赵志尧才无可奈何走了。临走时，郭汝瑰要他传话：“请辞公放心，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罗广文向郭汝瑰透露了一个消息：“据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新闻局长邓文仪（字雪冰）要陈国儒严加监视你。”罗广文要他多加小心。

这同样是不祥之兆！虽然他借罗广文、陈国儒都在场的机会，吵了一顿。他嚷起来：“邓雪冰凭啥子说我靠不住？！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我说邓雪冰才靠不住。”罗、陈两人自然安慰他，但难保陈国儒不暗中监视。

现在蒋介石又来召见，不去又不行。他只好舍命去闯了。

车到重庆，郭汝瑰才知道召见的并非他一人，还有44军军长陈春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重庆，林园，当年国府主席林森所住之地。小有花木之胜。蒋介石在这里接见郭汝瑰与陈春霖。

蒋介石问郭汝瑰：“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打仗有没有希望？”

“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是有希望的。不说别的部队，就是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3个团正在紧张训练，另3个团都是医院里收来的老兵。新拨来的傅秉勋师成立得很早。因此，我认为这个仗是有把握打的”

“唔，唔，这好。”蒋介石说。

11月初，解放军二野攻进贵州。这时蒋介石才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

11月14日蒋介石父子又匆匆从台湾飞到重庆，急忙调兵遣将。

蒋介石要胡宗南放弃关中，全力保四川。又命令驻守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返回重庆，到乌江去布防。脚跟还没有站住，防线就被突破。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在这种情况下，同在上海起义的刘昌义一样，蒋介石给郭汝瑰加官进爵。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任22兵团司令。除指挥72军外，还有21军（军长王克俊驻乐山）、44军（军长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另外有3个独立师（都驻内江）。要他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这当然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凄惶离大陆

任廉儒到了泸州。

在军部的密室里，郭汝瑰和他研究通信联络问题。

“老任，你还是编一本密码吧，便于联络。”郭汝瑰说。

“由你编，编好后送一本给我。”任廉儒回答。

“我编，容易泄密，不如你编了送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秘存——陈诚。这样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敢问的。至于你来电只要写‘泸密，郭军长亲译’，这也无从泄密。”

对起义的地点，他俩又作了研究。

“现在重庆危急，你最好自告奋勇去守重庆。就在重庆起义。不然重庆的工厂与重要设施都会被破坏。”任廉儒说。

郭汝瑰笑笑：“你这意见当然好。不过，你不了解，我的部队是新组建的，意见不统一，也不听招呼，再加上混进许多特务，控制很严密，到重庆起义困难太大，就在宜宾起义也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郭汝瑰的意见说服了任廉儒。任廉儒表示同意。

两人又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才告分手。

不久后，郭汝瑰属下的新34师，奉蒋介石的命令，从内江转移到泸州。这个师的师长柏恒是郭汝瑰的同

乡（铜梁县），两人交谊甚深，郭一直把他看作是有血性的直道热肠的人。郭汝瑰要起义的意图，柏恒也知道。所以一到泸州，便动手清除了部队中的特务隐患，为起义扫清障碍。

……

就在郭汝瑰的起义计划在密锣紧鼓进行时，重庆已岌岌可危。11月29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混乱。蒋经国后来曾追忆这段情况：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升空之时，从江口渡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另一支解放军由李家沱渡江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这是11月30日。

重庆既丢，成都门户洞开，无险可守。12月7日，行政院再迁台北。

10日，成都也濒临绝境。住在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父子，听侍卫人员汇报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父子俩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后离开军校。下午2时，凤凰山机场一架飞机升空，蒋氏父子凄凄惶惶最后离开大陆。

历经险阻 起义告成

12月3日清晨，泸州，72军军部。

“你是郭军长吗？”

郭汝瑰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我是。你是哪里？”

“我们是第10军，军长杜义德。”

郭汝瑰猛然醒悟，这名字好陌生，莫非是解放军。他立即问：“你是解放军？”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

义!”那边回答。

“好！我按计划行事。”郭汝瑰回答。

放下电话，郭汝瑰后悔了。怎样的计划，对方是否知道？他拿起话筒问电话局，要他们再接过去。电话局回说不知是哪里打来的，无法接通。

郭汝瑰决定派人去和解放军联系。他想到了新来的高级参谋徐孔嘉。

徐孔嘉曾是共产党员，1927年郭汝瑰和他在涪州结识，不过已有多年未通音信。前不久郭汝瑰向任廉儒要军事干部，徐孔嘉突然来了。郭以为是党派来的，但问他与党是否有联系，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便留他任了高级参谋。

“孔嘉兄，有一件事情请你办一下。”

“什么事？您说。”郭汝瑰说得已经清楚了。这时去找解放军当然是联系起义，不过不能这样说。

“请你去找解放军。”

“去做什么？”

“去联络联络。”郭汝瑰看他明知故问就这样回答。

“联络我就不去了。”徐孔嘉这样回答。

郭汝瑰默然，心里却另外有了主意。郭汝瑰下令所有部队向宜宾撤退。4天后，部队到达目的地。次日上午郭汝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唇枪舌箭。最后，郭汝瑰终于力排众议，说动大家决定起义。

水到渠成，郭汝瑰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给解放军的信，交给徐孔嘉严肃地说：“这个任务你再不能推辞吧。信上我已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和董必武同志有联系，现在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军长，你可能误会了。上次你只是要我和解放军联络联络，如果说是起义，我怎会不去呢。”徐孔嘉很高兴地回答，很快就领命出发了。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

在川南宜宾起义。

郭汝瑰的72军起义通电在报纸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像多米诺骨牌，川军邓锡侯、刘文辉相继起义。如汤沃雪，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了。

京沪暴动案的余波在西南一隅写上了句号。38年后，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这句话说出了郭汝瑰真诚的心声！

（责任编辑：张蕾）

（节选《泪洒江南雨》）

——江苏文艺出版社

郭汝瑰起义侧记

○梁佐华

郭汝瑰参加过大革命，抗战期间与董必武有过联系。他在国民党军政部主任任职时，曾将绝密文件交任廉儒转给党。我们知道他早已心向共产党，待机起义。

这样重大工作为什么我能参加呢？因为我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任廉儒和郭汝瑰是四川同乡，又是好朋友。任的堂兄任锦时，在郭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有这些关系，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在香港成立。党委王葆真以军事特派员身份，来上海成立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王任主任委员。我和任廉儒参加了民革上海临时会，是五个常务委员之一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和组织组副组长，在王葆真

身边负责军反的实际工作。

1948年11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提出作战计划报告。蒋介石听了说：“就这么办！”次日，蒋亲笔写信给黄百韬：此次徐州会战，实乃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的关键。务希弟严督所部，切实训导，期在必胜。10天后，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黄本人也自杀身死。

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

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件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划，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兵力配备情况等详细记载。

王葆真等被捕后，1949年3月3日上海各报纷纷报导，地下党和地下民革成员都分别采取相应措施，我也把王葆真交我的枕头内的民革文件，连同我手头原有的民革成员名单，一并销毁。王葆真被捕后，受过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坚贞不屈，绝口不供出郭汝瑰，保障了郭的安全。王葆真被判死刑，但因他是辛亥老人，国民党元老为他请情，民革中央李济深主席亲笔写信给南京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经多方营救，得免于死。

7月1日，我由沪到南京。在二野司令部，柴军武处长、李潢科长、张光西参谋与我具体研究有关七十二军问题。决定由二野司令部派干部两人，扮成商人秘密入川，指挥郭汝瑰的起义工作。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在川南宜宾起义成功，使国民党固守西南、负隅顽抗的作战计划完全破产。

○刘慧英

文坛女杰心路探迹

——访女作家谌容、王安忆、张洁、张抗抗



谌容：女性的平凡和魅力所在

谌容，当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四川巫山，十五岁开始工作，曾当过书店店员、电台编辑、教师等。一九七五年起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人到中年》、《永远是春天》、《太子村的秘密》等几十部中、长、短篇小说，其中《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懒得离婚》等直接反映和涉及了当代生活中的妇女和婚姻问题。本文为谌容最近接受采访时的对谈。

刘：从你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你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许多女作家一样是从着眼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但你又有自己的特点，你在作品中很少流露出性别意识，在揭示女人的痛苦的同时，也很严厉地鞭笞了她们的劣处，有时甚至完全站在男性立场上，比如在《错，错，错》中。你能否谈谈其中的缘由？

谌：这些年涌现的女作家的作品，就其大多数来说并非是女权主义的，涉及的社会问题相当多，这是由

中国的现状决定的。这与我们这批人的处境有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学、工作、下放及历次运动和政治风浪，男人经历的我们都经历了。就我个人来说，从参加工作至今，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个非常脆弱的女性，别人对待我们是非常“平等的”，在同样的遭际下无非是女性较细致和纤柔。就中国大陆女作家创作所选择的题材和反映的生活面而言是相当广泛的，这是由我们那些不能说是很愉快的经历所决定的。我在写作时很少考虑到自己的性别，每个人的经历和阅历不同，因而所写出的作品也就不一样，中国女作家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创作环境中写作，她们的作品在外国人看来是特别“坚强的”。

刘：在目前中国的具体境遇中，妇女的压力很大，有一部分人愿意重新回到家庭中去，某些学者和作家也认为，妇女解放要走出家庭，但是更应该是一种权力解放，妇女有权选择

走出家庭，也有权利选择留在家里，对此你持什么看法？你是否主张“回家说？”

谌：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儒家传统教育，因此我在对待许多问题时，包括道德、伦理、家庭等都是传统式的。在女作家中我的家庭生活大概可算平稳的，没什么色彩。我觉得社会生活中的人应该有能力，起码是生活能力。我不主张将妇女赶回家庭，但我自己觉得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能力应该比男人强。社会分工不一样，许多事情女人愿意做，而且能做好，对男人来说则不然。

刘：你认为女性在做一个人的同时，是否应该保持一些女性的特性和特殊能力？

谌：是的。我曾对那些持有女权主义观点的人说，女人象男人，就认为自己与男人平等了，那么实际上，在你们心目中还是以男人为标准。我认为，女性是以她的特殊魅力生存于世的，我在这点上不能同意女权主义的观点。在家务事上男人一般地说来干得不如女人，比如，做完饭后的厨房卫生，这是顺手就可以做的，是一种运筹，但这种思维的细致男人总也比不上女人。所以，我总觉得，女人干点家务活并不是什么受压迫和歧视。首先，你得会生活。现在有些妇女以什么都不会为菜，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会做全桌的菜、会做衣服、会料理家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能力和乐趣，表明我在这方面不是无能。当然，如果妇女在家庭中象奴隶一样地做家务那就谈不上能力和乐趣了。另外，女人在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角色演不好那女人也一定不平衡、不和谐。别人可能会认为我这种观点太传统，但我坚持这一点。

刘：那么，你认为就目前中国妇女的处境而言，存在哪些男女不平等现象？

谌：在我国，真正的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并不表现在家务劳动方面，而是封建意识对女性的歧视。在农村，这种现象比较表面化，而在城市中则较隐蔽，比如，工作单位不欢迎女大学生，生孩子希望要男孩。对较出名的成功的女性格外的“垂青”和吹捧，其实也是对女性的一种轻视，是一种“物以稀为贵”的观念。这种隐蔽着的封建观念是需要女人去抗争的。

刘：我在看你的小说《懒得离婚》时，曾经非常想知道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感受写这篇小说的。在这篇小说中你广泛地展示了各种家庭不幸，你是仅仅将这些端出来给人看，抑或是觉得人生和爱情有一个终极目标存在——心心相印而又不断发展的健康之爱呢？爱与家庭的比重如何？是有了爱才建立家庭，还是因为家庭的存在而去维护“爱”呢？

谌：我曾在妇联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执委工作。当时在讨论婚姻问题及“第三者插足”时，我曾说过，如果一个家庭非常和谐、坚固，“第三者”就不可能插足，另外，“第三者”一般来说也是女性，如果说维护妇女权益，那么也包括她们。妇联仅仅停留在不让离异上，我不认为这是道德的。我在《懒得离婚》里极力想说明一些问题，但至今仍认为尚未说清。妇女自身有许多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强调男女平等，提倡女性做“铁姑娘”，尤其是目前三、四十岁的现代人“文革”时都曾当过“红卫兵”或“红小兵”，这使许多女性缺乏女性魅力。长期以来，女性注意修饰、保养，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历次运动将不少女性培养成歇斯底里症患者。不少港台人士对我说，他们觉得大陆女性特别厉害，缺乏女人味。过去不少人认为，只要理想一致，有共同语言就会有感情，就可组成一对和谐夫妇或一个和谐家庭，我看不见得。有共同语言可以是同志或朋友，但不一定是夫妻，除此之外还有性生活问题。这在我的小说里从未提及。

刘：对，你的作品似乎从来没有涉及这一方面，这是什么原因？

谌：性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全世界都知道夫妻是怎么回事，它是

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并不反对写性，但中国有它独特的国情，写作时应该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中国文学中对性的描写在世界上可能最早，我认为古典文学中在这方面有许多很好的作品，比如昆曲《游园惊梦》，目前许多写性的作品都未能达到或超越这样的水平，当然我自己也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来写关于性方面的作品，所以我一直没有写。

刘：你是如何教育和培养子女的呢？

谌：目前我的大儿子写相声，小儿子演电影（即喜剧演员梁天一晓注），有报刊采访他们时曾问，他们是否受什么家庭熏陶，他们想了以后竟回答不出来。确实从小我就没怎么管他们，不象有些家长硬要孩子学这学那。但家里有书，他们从小就看书。我一直希望他们能自己奋斗。

刘：现在孩子们都自己单独过吗？



王安忆：于自然中发展

王安忆，当代著名女作家。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海上繁华梦》等，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69届初中生》以及《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逐鹿中街》、《岗上的世纪》等中篇小说。

刘：自一九八六年以来你从“三

谌：是的。女儿还在上大学，住校。每月给她一百元生活费，吃饭之外的花费就必须她自己挣。我向他们灌输从小就要独立生活的观念，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背景上，不论父母的境遇如何他们都应自立生存。我曾答应我的那个演电影的儿子，在他成名之后为他写一部电影剧本，今年上半年我给他写了一个剧本《喜剧明星》，八月份交了稿，现在他们已进入后期制作，春节就可上映。我的几个孩子都没有让我费太多的劲，长大后就自立了，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

刘：新时期涌现出来的绝大部分作家至今都在勤奋笔耕，你也一直如此，你是否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

谌：中国的作家背负的使命感特别重大，不论是什么观点的作家似乎都是如此。而且一旦发表了作品似乎就停不下来了。我在停顿了两年后，今年开始的第一部作品是《人到老年》，后来是《花开花落》。

恋”（即《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开始关注女性命运和性爱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写出一批以探寻民族生存为主的作品（例《小鲍庄》等）以后向人的生存的更深层次的开拓？你本人对自己的创作是怎样看的？

王：一个正写作的作家很难有耐心和兴趣去总结分析自己的写作历程，何况这历程还不算长，即使将来有可能去回顾，所作结论也不会太

准确,正应了古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一点我心里是明晰的,那就是我的写作是因循了我的自然的成长,这成长包括年龄、经历和经验。

刘:对,作为一个作家,你以你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确立了形象。虽然,随着你的创作的不断发展你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一时期的你,在读者心里是难以抹去的。

王:在此我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晚熟的人,但我想这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弥补了过来,从“雯雯”(《雨,沙,沙,沙》)开始至今,我认为我的成熟是飞跃性的。到了《小鲍庄》和“三恋”我已进入了成年阶段,世界在我眼睛里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但这时期的问题是,做一个历经沧桑的成年人的美感又太过于吸引我了,我无意中迫使自己更苍老更深透,这其实已超出了我的真实经验,现在我想是回头——回到自己真实位置上的时候了。总之一句话,要因循自然。

刘:1988年前后你曾多次在文章和谈话中呼吁应该还女性以更自然的地位——让愿意回到家庭中去的妇女当家庭妇女,希望中国的女孩子更温柔、更解人意,……总之,但愿女性能向传统型价值尺度靠近。但是,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你的文学创作中却将这种愿望化为乌有,譬如《逐鹿中街》里的陈传青,她有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不算太差的文化教养,为了能更好地享受做女人的一切,她病退在家全心全意地当家庭主妇,然而不久就发现丈夫不忠,为保全家庭的完整她不遗余力地跟踪丈夫、揭穿丈夫,其结果为,虽然丈夫并未真能另有新欢,家庭也未破裂,而她与丈夫之间则仅仅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家庭外壳。你的这部小说似乎是要告诉人们,尤其是女人,维系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并不是家庭这种形式,同时,女人的生活一旦只剩下丈夫和家庭便会变得如此百无聊赖。在此你的女性价值观似乎出现了分裂:一方面你希望女性能更女性化和传统化,另一方面你又觉得女人如果仅仅为了男人或家庭而生活的可悲,甚至是此路不通。你能否就此谈谈你的最新感受和想法?

王:关于妇女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与它相对的是男性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两个位置是互相决定的。当我说妇女要回到家庭中去的时候,是因为我希望男子汉回来,而当我说想妇女到了家庭中之后,却又看见女人生命力衰竭,因而失去与男性抗衡的力量。摆平这两者的关系是我有时会思索不休的问题。《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其实是一个具有男性意识的女人,她亲手缔造了一幅男女关系的幸福图画,可是她毕竟想象力受局限,她在她自己规定的位置上却感到了这角色的难度。而她的丈夫古子铭却是在女性通常所居的从属位置上,听凭她的调遣,却被她培养成一个男性角色。所以,即使象陈传青这样富有创造力的人,她所再造的世界也不免落入旧的窠臼。

刘:我读过一篇你谈家事的散文,觉得它是你写得最好的散文,因为它既平易又真切而含义很丰富。你的文学创作是否主要来源于你对这种平易而又真切的生活的体验及醒

悟?

王:我想,人的经验有两种,一是身体的,一是心理的,而经验的丰富绝对是文学的必要条件。生活平易,并不等于说心理过程平易,但这两种经验都面临着虚伪的危险,我的意思是,无论是外在的经验,还是内在的经验,都必须是真的,这几乎是比丰富更重要的定义。我的原则是,分辨真伪,坚持从真实的经验出发。

刘:在新时期十年中你几乎是不停歇地写作,至今依然如故,打算就此写一辈子吗?设想以后是否有可能不做专业作家或根本地改变职业?设想过充当其他角色的可能吗?

王:写作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想它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将我的人生经验当作养料去消耗,它还构成了我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但有一天,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渐渐衰竭,到那时,我依然要做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比如翻译作品、研究文学艺术理论、写一些历史故事,不过,我想这大概是将来的事了。



张洁:女人,并非特殊

张洁,当代著名女作家。1978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以《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等爱情及女性题材的作品引起文坛和读者的关注,以后她又改变了创作风格和取材领域,《他有什么病》及其近作《上火》则是她后期的代表作品。张洁始终关心和注意女性的自立和自强,这篇对话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她的众

多感受和独到见解。

刘:作为一个女作家你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中是否有一种女人的特殊感受和意识?

张:在我念大学和当干部时,女人干的活与男人一样,二百斤重的包男同学扛一个我也得扛一个,我从来没有女人那种特别的感觉——需要照顾,我永远比男人干得多,包括我

在家庭中的负担——从一开始我在家里就既是女孩又是男孩，后来结婚又离婚，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直至今现在我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在经济上和情感上我都是自立的。

刘：所以你在作品中的感慨就特别多：女人并不比男人弱。

张：绝对不比男人弱。我从小就是一个集男人和女人的义务（只有义务并没权利）于一身的人，所以我没那么多女人的特殊感受：呀，我的丈夫为什么没给我买礼物呀，为什么没有疼我呵等等。当然偶尔也想过——只是作为一个女人，并非是作家而这样想——作为一个女人从来也未体味过做女人的滋味，这可能也是一种缺陷，这也是无可挽回的，这是我天生的命运。

即使是写女人，我也不是从女作家这个角度去反映女人，我只是将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所以我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而常常会觉得妇女自身存在的缺陷很多，必须将自己弄好了，才能要求别人尊重你，自己如不争气——愿意当花瓶，那则无可救药。我很看不起这样的女人，我特别讨厌女人发“嗲”，也许这能引起许多男人的喜爱，我认为这是女人把自己当作“性”，就象我在《方舟》里讲的。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所以我常说女人首先要健全自己。

刘：目前对“女性文学”尚未有明确而严格的界定，你对此怎么看？

张：什么是“女性文学”？是因为那些作品写了女人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作家是女人，抑或是因为作品中透出一种女人的矫情呢？近几年有些人写作品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销售“女人的矫情”，有些人很自觉地在哪儿卖弄，知道有人“吃”这个，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将自己当作“性”。她们不会客观地去对待妇女问题。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总是将女性文学看作是一种女人写的、销售女人矫情的东西。而作为作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感情都应是关注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相当模糊，或者说没必要特别提出“女性文学”。

刘：在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家——专门致力于女权文学或女

性文学的创作，西方各个作家的情况也不同，如多丽丝·莱辛写了许多有关女人的作品，而一旦将她划入女性文学或女权主义者，她竟不接受。

张：这是个人信仰问题。为某些人说了心里话，并不说明我就是某些人。我的《方舟》也许比较深刻，因而认定我是女权主义，其实不尽然。我为许多人说过心里话，况且我在为女人诉苦的同时也说了女人许多缺陷。妇女的解放绝不仅仅是同工同酬、政治地位平等——选举几个女部长什么的，这全是官样文章，最关键的是社会意识。

刘：在目前，中国还远没有这种普遍社会意识的觉醒。

张：根本谈不上！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平等，这是最浅层次上的有关男女平等的概念，更高更深的层次则是社会意识的发展，这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自身的意识变化。我们应该正视大多数妇女的现状，她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西方文学中其实也很难摆脱一些陈旧的社会意识，象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简·爱》，其实很悲惨，很入俗套，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爱上了一个富人，靠了这种爱情她获得了幸福，这不能算是女权主义的吧？客观上与女权主义南辕北辙。

刘：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男作家笔下出现了许多女性形象，对那些形象你有何看法和评价？

张：我注意过一些男作家的作品，他们一写到男人与女人关系（或恋爱，或性爱）时，总是写女人怎样引诱男人，他们在潜意识里仍然存在着封建的东西，缺少作家的科学态度，在思想上沿袭了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男女之情是不光明的，下流的，所以自然是女人先堕落。原先我想写一篇文章来谈谈这个问题，后来作罢了。我曾看了四篇男作家写恋爱的故事的作品，写到男女之间的关

系，都是女人做出种种媚态先勾引男人，我觉得可悲而可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尚且如此，那就更不要说在一般人心目中女人的地位问题了。

刘：中国这种状况许多女人意识到了，而男人则全然不觉。

张：这不能怪男人，这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关，我始终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实际上是相当封建落后的，再加上经济基础的问题，阻碍和抑制着先进的思想意识的发展。

刘：不知当今哪位女作家说过“世上没有男人”这样的话，这似乎是女性对传统依附心理的一种绝然否定，你认为中国男人确实不够强胜吗？

张：“世上没有男人”这句话也许我曾说过。反正我没见过象样的男人，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有，但我尚未见过。不一定是比自己强的，起码是与自己打平手的，我都没见到过，我自认为比男人强，不论是在事业和生活上。这并不是狂妄，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

刘：你是否有对男子汉模式的设想和假定？

张：没有，因为从来就没有见过。

刘：我觉得在《祖母绿》之前，你似乎有意构造男子汉形象，在作品中把男人都写得比较强大。

张：那是基于我们的社会现象，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有这样的男人就算不错的了。即使是很好的男人也有他伪善之处，但也许女人也是这么回事，人类都是不完善的，作品中总有理想主义的东西。

刘：你自己是否意识到在你较早期的作品中存在着某种程式化？

张：我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不好，我认为我早期的小说简直一塌糊涂，糟糕得很。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没写好，但在慢慢摸索着写，努力写得更好。

蓦然回首——张抗抗琐记

我知道张抗抗的名字时才十五岁——看了长篇小说《分界线》以后。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能够读小说是一种幸福，而《分界线》给处于文化

饥饿状态中的青年一代提供的养份自然是举足轻重的。那时，张抗抗在一个十五岁女孩子的心目中是富有阳刚之气的老成者。



一九七九年当张抗抗以《爱的权利》再次出现在结束严寒、春归大地的文坛时，我蓦然发现她原来并非老成者，更非“硬汉”角色，而是一个满怀柔情和爱心，却又毫不示弱的女性作家。

以后又读她的《夏》、《去远方》、《淡淡的晨雾》、《北极光》……改革开放的时代孕育和造就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家，而他们的文学特色又养育了一代人的精神和气质，新一代的成长受这代作家的启迪和启蒙是无须隐讳的。

真正认识抗抗，与她面对面地坐着交谈却是在1988年的夏天。距离《分界线》的年代，我们都已走了很漫长的路。我已不再是仰慕老成持重的女学生，抗抗也早已告别她的农工生活。1979年她经过在省艺校的两年学习生活后成了省作协的一名专业作家，1983年她结束了长达11年的单身生活终于有了可意的丈夫以及一个温暖的家。

我去过张洁、谌容、宗璞、王安忆……不少女作家的家，与世人的成见相反，这些女作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者，也不是只知写作而不闻柴米油盐的“女强人”，恰恰相反，她们与大多数中国普通知识妇女并无二致，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仍需操心家务及处理日常琐事；她们象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穿着漂亮的衣服、装饰和美化家庭环境、做可口的菜肴，乃至逛街购物……。抗抗的家很有特色，虽然大量的书籍、杂志及两个人工作所需的写字台、电脑桌侵占了大块空间，室内布置却极为精巧和温馨。每次去她家，望着窗台上的草木花卉、书橱中精巧别致的小摆设以及整个窗明几净的环境我总感受到一种自然与素雅的艺术气息。

抗抗在第一次婚姻中曾有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已完全自立了。儿子从小就在杭州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抗抗虽然尽母责不多，可心里一直牵挂着儿子，20多年来无论境遇怎样，她总要安排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看望孩子，或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当她重新结婚后，夫妇俩还曾与孩子一起外出度假。孩子喜欢流行歌曲，她为他买他喜欢的磁带并经常给他寄有关流行音乐的剪报。她曾多次向我说起离异家庭的父母如何对子女尽责，使孩子获得健康的人格与心态。为此她写了中篇小说《七彩圆盘》，她的儿子很喜欢这部作品，说妈妈对他的理解使他深受感动。孩子与他的继父相处得也很和谐，抗抗的丈夫对孩子很有耐心，孩子也很喜欢他，并主动写信告诉妈妈说，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叫他爸爸了……。

抗抗说，成家以后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保养，而且生活也要比原来丰富得多。她的丈夫原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后来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政治理论，所以音乐与美术欣赏，包括居室布置、环境艺术就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业余爱好”。抗抗每次出访，最喜欢带回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她家墙上有一幅由若干深红色枫叶镶拼而成的大枫叶，那是抗抗从加拿大带回的枫叶，由夫妇俩共同制作的。

抗抗还向我谈起她与生活的联系。目前，她来往和接触最多的并不是文学界的作家和编辑，而是各行各业各具特色的普通人。这些人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与她逐渐成为朋友并互相理解，有时她帮他（她）们操心和解决各种生活琐事，更多的时候则静静倾听他（她）们的诉说，她认为这本身构成了生活的“原生态”而不会落

入带有功利目的的“体验生活”。她说，在生活的自然流向中品尝体验人、人生和社会比写作更为重要，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作家，生活中也许忘掉自己是作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被海外读者称为“新锐作家”的张抗抗已年逾四十，说起写作和生活她有万般感慨，归结为一点就是，时光过得太快，而需要做的事则太多太多。抗抗忆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单身生活时说，那时的生活似乎要简单得多，除了吃饭之外其它的时间都可用来写作和读书，时间的效率特别高。而现在的抗抗虽是沉静之人，却有了各种无法完全摆脱的应酬和打扰，约稿，复信，周而复始，不得穷尽。加之她多年前就患有颈椎骨质增生，不能长时间伏案，平均每天只能有半天时间用于写作，半天时间用于学习。尽管有朋友劝她要多写点，尽管目前仍有不少约稿，尽管她早已孕育了四、五个中长篇的选题，抗抗仍很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段时间静心读点历史、心理学、哲学方面的书，以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自己，为下一阶段的写作和生活准备养份。为此，她推迟了去美国当访问学者的时间。

抗抗曾说过，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和一个好的女人都需要付出时间。作为一个现代人这两个世界她都希望拥有，而生活的魅力及乐趣也就在于这种“立体声”的音响效果之中。

（责任编辑：张蕾）

（上接17页）于是西北干部中许多人遭殃。到了“文革”，这雪球就越滚越大了。康生就在八届四中全会上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文革”中更红得发紫，进而升任中央副主席。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直到他死去，始终没有停止过谋害同志的勾当！

“文革”后，由于醒悟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康生的肮脏骨灰从八宝山烈士陵园被抛了出去，接着又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之一，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缺席）审判，真是死有余辜！

〔责任编辑：方实〕



身在异邦 最渴望执有中国护照
志在统一 尽全力促进同胞团聚

还是冯玉祥将军的性格

——访冯玉祥之子冯洪志先生

○魏志军

北京饭店中楼3层3065号客房门的左侧，镶着一块铜牌，上刻几行用中文和英文的说明文字，“冯玉祥将军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下榻此房间。”

66年后的今天，冯将军的儿子、美国泰山工业公司总裁、74岁的冯洪志先生也住进了这座楼。他是受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邀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和“九·一八”事件60周年纪念活动的。

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传奇式的爱国将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生追求民主进步，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止，被人们尊称为“泰山将军”。

如今，这位“泰山将军”的后代，多年侨居在大洋彼岸的海外游子冯洪志先生，仍继承先父的遗志，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繁荣富强而奔波、而呼号。

给我一张中国护照

冯洪志于1917年出生在北京，12岁和姐姐冯弗伐到苏联留学，后转至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41年，中德断交，冯洪志回国后在著名爱国人士胡子昂为总经理的中国兴业公司任机械工程师。1945年初，抗战胜利在即，胡子昂先生深谋远虑，感到国家获得新生后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就选派冯洪志赴美学习工业，这

年他才28岁。

身在异邦的冯洪志，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成为在高科技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曾参与过美国核电站、核潜艇设备的设计工作，为高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因此成为高级工程师，担任了世界著名泵生产专业公司——沃尔辛顿公司的副总裁。

事业有成就，家庭也是幸福的。冯洪志到美国后不久，就与当地一位爱国侨领的女儿赵美玲结了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现在都已四十出头了，分别住在旧金山和洛杉矶。

有不少人劝他，你有事业、有家庭，社会上又有名望，干脆加入美国籍算了。他听了只是摇头不语，问急了就



是两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的父亲是冯玉祥！”

是的，父亲生前给儿子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忘不了，抗战时期追随父亲在四川参加的那场献金救国运动。一年多的时间，冯将军跑遍20多个县，动员民众献金23000多两（这笔捐款的一半交给了周恩来，用以援助八路军抗日）。

冯将军每到一地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救国家。”冯将军高昂热烈的爱国热情，深深激励着老百姓，也深深感染着儿子。当父亲身着布衣，脚穿布鞋游说千里的时候，他紧紧跟在父亲身边，他挥动着拳头跟随父亲高喊“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从那时起，他就已悟出“祖国”这两个字的分量，这也是他多年不改国籍的原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传到了大洋彼岸。冯洪志闻听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他十分振奋，也渴望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可当时，美国当局对新生政权抱敌对态度，千方百计阻止科技人员回国，冯洪志曾多次设法从加拿大转经苏联回国，都没有成功，他想念在祖国的亲人，但却无法联系。

星转斗移，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强大，在国际舞台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0年代初，中美结束了20多年的敌对状态，在双方首都互设联络处。

1973年春天的一天，冯洪志兴致

勃勃回到家里对夫人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黄镇主任派人找我，要和我见面呢！”这一消息在冯洪志家里引起一阵欢欣。

冯洪志身着藏青色中山服，驱车来到黄镇主任的办公地。早已迎候在客厅里的黄镇主任紧紧握住冯洪志的手说：“冯先生，我托人到处打听你的下落，这回可算找到你了！”

“我也一直在等你的呀，等得我好苦哇”。

黄镇说：“你是我到这里见到的第一个没有加入美国籍的中国侨民。这么多年了，不容易呀，你真象你的父亲一样有一副硬骨头。”

黄镇主任的几句话，像一股热流暖遍全身，身在异国20多载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刚到美国时，被人称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根本被人看不起，冯洪志在国内是工程师，而到了国外只能当个实习工。

冯洪志牢记父亲临行时的嘱托，“一要立志，即是要有志气作一个刚强有为的学生，不为自己活着，为人类活着。二要努力求学，有了本事方能不求人，没有本事者不能存立于人前。”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先后就读于纽约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研究院。进入沃尔辛顿公司他从一绘图员作起，最后以精湛的技术、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深入实际的领导才能为美国人所折服，赢得了许多美国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也使这里的美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人。

因此，当黄镇主任称赞他是硬骨

头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用不着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海外华侨的腰板就更直了。”

黄镇看着他坚毅的神情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是中国政府在这里的代表，行使保护侨民的职权，你有什么要求可尽管提。”

冯洪志略一思索，诚恳地说：“洪志别无所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将来能获得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好的，这件事一定会办到。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姐姐、弟弟、妹妹们在国内工作、生活得都好，他们都很想念你。失散几十年，急切想知道你的消息，我临行前，你二姐弗伐特意找到我，让我打听你的下落，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你早日回国和他们团聚，也希望你能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获得姐妹们的消息使冯洪志格外高兴。冯洪志姊妹10个，他排行老四。现在世的还有二姐冯弗伐（全国政协委员）、妹妹冯理达（北京海军医院副院长）、弟弟冯洪达（中国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由于历史的隔绝，相互间已近30载无音讯。

黄主任的一番话说得这位坚强的老人热泪盈眶，“我也很想念他们呀，我一定争取早日回国看看，谢谢黄大使给我带来亲人的消息。”

这次会见是冯洪志人生路上的又一次转折。这一夜他失眠了，他辗转反侧想了许许多多。父亲一生为国为民，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现在对朋友的后代这么关心倍至，费尽周折在异邦找到了自己，并寄希望自己为国家做些事情，这正是为国效力的好机会，冯洪志踌躇满志，恨不能一下子飞回祖国。

这一年秋天，归心似箭的冯洪志先生悄悄随一个赴华旅游团踏上了归国的旅途。波音747的翅膀掠过太平洋，飞临中国上空的时候，冯洪志将脸紧紧贴着机窗向下观看，俯瞰阔别多年故乡，禁不住老泪纵横。“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在北京他见到了久别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在政界、军界担任着高级职务，

为共和国的繁荣和强大做着自己的贡献，又都儿孙满堂，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看到这些，冯洪志又高兴又羡慕。心中不由闪出叶落归根的念头。

邓小平说：在国外也是为“四化”

1982年9月，冯洪志先生被官方邀请回国，参加“纪念杰出爱国将领冯玉祥诞生100周年”的活动。

这天，冯洪志刚刚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饭店，工作人员告诉他，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冯洪志听了非常高兴。邓小平同志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与父亲共过事，当今，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总设计师，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能见到他是很荣幸的。

9月14日下午，几辆轿车把冯弗伐、冯洪志、冯理达、冯颖达、冯洪达以及外甥女谷维贞等接到了人民大会堂。

早已等在会客厅里的邓小平同志微笑着和他们挨个握了手。大家落座后，小平同志环视了在座的众人后对身边的冯洪志问道：“老大弗能怎么没有来？”

冯洪志说：“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

小平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弗能是我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她和蒋经国是我们班里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小平同志谈起和大姐同学的一段话，立时使冯洪志姐妹感到了一种亲切感，似乎面前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不仅仅是十亿人口的国家领导人，而是位亲密无间的兄长和朋友。

小平同志接着说：“焕章（冯玉祥先生的字）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这天，小平同志格外高兴，谈兴也很浓，他给冯洪志姐妹们讲了一段“礼送出境”的故事。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

祥接受共产党建议，从苏联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邀请了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北伐时国民军著名的五原誓师，进军河南、克洛阳、下郑州，刘伯坚夫妇、邓小平同志一直随军工作，与冯将军交往甚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下令清洗军中共产党人。冯玉祥将军非但未听蒋的命令，却令当时担任副官的苏进（曾任我炮兵副司令员、现已离休）拿出仅有的四百块大洋送刘伯坚夫妇和邓小平做路费，让他们迅速转移了。

小平同志的故事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由此更体现了冯玉祥将军和共产党人的深厚的情谊，也体现了冯玉祥将军光明磊落的为人。

小平同志问了众姐妹的生活情况，最后问冯洪志有什么要求。冯洪志说：“常言道，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我年纪也大了，想回国来定居，也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尽一点心力。”

小平同志听了却摇了摇头：“我倒觉得你不要急着回来，你在国外那么多年，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多，关系

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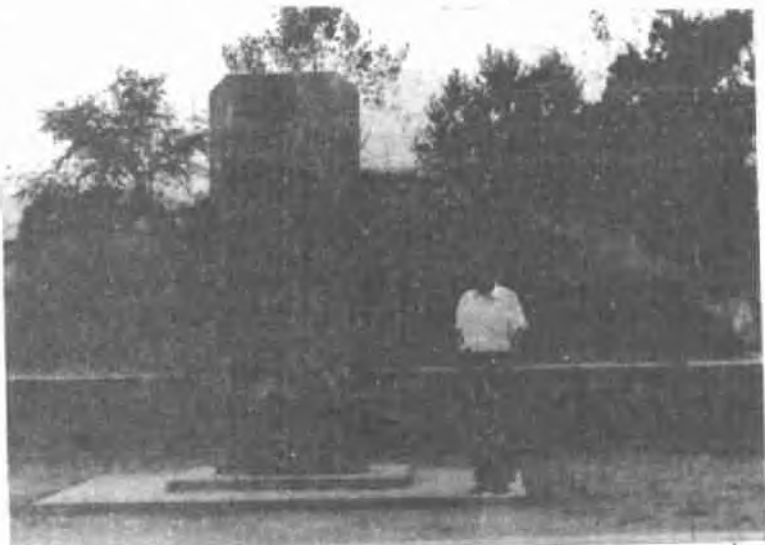
“好，我一定照你老人家的话去做。”

小平同志还高兴地同大家照了相。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亲属的消息和照片。

这之后，李先念主席、王震副主席、姚依林副总理，以及吴学谦、张爱萍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会见他，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曾和先父有过交往。

1986年初，冯洪志到上海商谈一项技术引进项目，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听说了，特意在锦江饭店宴请他和外甥女谷维贞。江泽民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使人毫无拘束感。那天恰好是冯洪志的70岁生日，江泽民知道了，特意让饭店制作了一个生日蛋糕给冯洪志祝寿。江泽民同志是学工业的，英语说得也不错，和冯洪志很谈得来，两人还不时用英语对话。

党和国家对冯洪志的信任和热情欢迎温暖着这个海外游子的心。他



多，对国外的事情熟悉，可以起在国内起不到的作用，在国外同样可以为促进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尽力

决心努力工作，尽自己最大能力报效祖国。



给蒋经国写信劝统一

从中国返回美国，冯洪志仿佛挑回了两座山，他感觉到了祖国赋予他的重任。他开始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和宋希康等人联合发起组织了“和平统一促进会。”二是创立了泰山工业公司。冯洪志亲任总裁。冯洪志和蒋介石一家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冯玉祥曾和蒋介石拜过把兄弟。至今冯洪志还存有上学时蒋介石给他的亲笔题字。在德国留学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孔祥熙之子孔令杰，戴季陶之子戴安国等人。蒋纬国和孔令杰是学军事的，他们关系都很好，一到周末便在一起打球、游泳、郊游等。

蒋经国任总统后，冯洪志便考虑以这种特殊关系做做两岸统一的工作。

1982年10月，冯洪志给蒋经国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除寄给蒋经国本人外，全文又刊载在美国《华侨日报》上。

1987年，冯洪志又特意取道奉化，来到蒋经国故乡溪口，在他祖父、父亲居住的地方，他小时候读书、钓鱼的地方以及蒋经国生母毛氏墓前照相留念，并在毛氏墓前捧了三杯

土。他在上海特意请人制做了一个精制的锦盒，把那三杯黄土、一册照片放进盒内，然后又给蒋经国写了一封推心置腹的信：

经国仁兄大鉴：

……窃闻兄弟门墙，外御其侮，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以有识之士，一时决绝，必顾全大局，握手言和。

……大陆鼎以后，台岛隔绝，迄今30余年，坐使炎黄子孙分疆而治，形同敌国，上负列祖列宗开创之基业，下负亿万同胞引颈之期望。我辈侨居海外，喜祖国振兴，一洗百余年来之积耻，又叹金瓯残缺，尚未完成统一之大业，日夜傍徨，如坐针毡。更有无数家庭，骨肉分离，音信断绝，两地相思，梦魂缠绕，倒悬之苦，难以言宣。

……吾兄明智，倘能顺应人心，当机立断，毅然与大陆当局对话，亲手实现和平统一，则不仅两岸同胞拍手称快，妻离子散者得以团聚，侨居海外者增添光辉，即以台湾党政诸公而论，亦可弥隐患于未来，保殊荣于当世，何乐而不为哉！

吾兄素以孝亲著称，曾于世叔灵前跪迎宾客亲友。李政道教授之母，在台病故，曾蒙特准归葬大陆，可见推己及人，崇扬孝道，至堪钦佩。我辈先人后代，如廖承志及先兄洪国等，

均已物故，吾兄及弟亦年逾古稀，遥念世叔灵柩，现仍权厝台湾，慈亲奄奄未安，为人子者，于心何忍！窃以为吾兄亟应在有生之年，遵循世叔生前夙愿，早日恭奉灵柩，归葬紫金山麓。否则将遗恨终身，上无以报抚育之恩，下无以对后代之孙。

附寄太夫人墓前掘土及在溪口、南京所摄照片一册。 并颂

健安

愚弟 冯洪志拜手

能打动人心灵的常常是亲朋好友的肺腑之言。盛有三杯黄土、一封长信和一册照片的锦盒辗转送到了台北“总统府”。蒋经国捧起黄土，在母亲照片的脸颊上吻了一吻，深沉地说：“母亲，儿子对不起您呀。”继而又一张张翻看着照片，那不是自己在溪口住过的小洋房么，还依然如旧。这不是母亲的陵墓么？共产党已将它修葺一新。当他看到那张在母亲被日寇炸死后自己亲笔书写的“以血还血”的石碑照片时，凝神贮立，陷入良久的沉思。

过去，只要和蒋经国谈起两岸探亲问题，他一概不理，冯洪志在1987年8月寄出这信后，死水中溅起微波，9月17日在纽约发行的《北美日报》上，以头条刊出一则消息，蒋经国专门成立五人工作小组，就开放大陆探亲问题进行研究。同年9月25日，台北“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可以开放大陆探亲。同年11月2日，台湾同胞获得了赴大陆探亲的许可。

在世界风云变幻中，两岸关系的解冻，要靠海峡两岸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这里也倾注着冯洪志先生一番心血呀！

一身功夫有了用武之地

“在国外也能为‘四化’尽力。”冯洪志先生牢记着小平同志这句话，并将其化为行动。自黄镇大使在美国找到他至今，他已近30次往返于祖国和大洋彼岸，等于绕地球飞了30圈。坐飞机飞长途真不是滋味，从美国到中国单程要二十多小时，只能坐着，这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真够难熬的，每次下飞机双腿都是肿的，要安睡两天才能恢复过来。有人说他是

自找苦吃，老人倔强地说：为国家的强大，我吃点儿苦算什么？

冯洪志先生是材料力学专家，在国外人熟关系广，凭着这两件宝，他积极为国内进行技术引进工作。1988年，冯先生考察了上海的污水处理工程。感到问题很多，经他穿针引线 and 国外达成了一项污水处理设备的技术转让合同。他已在国内跑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对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如何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受到各省的欢迎。

有道是旁观者清。冯洪志先生在做引进技术工作中也看到国内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弊病，譬如谈一宗买卖，出国谈判的事却不让专家去，而党政干部乘机去国外逛；为了一项技术，国内厂家竞相降价，却让外国人占便宜。这些作法无疑会给技术引进工作带来困难。

冯洪志先生以经济学家的目光关注着国内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他为国内开放的步伐和取得的成就而欣慰，但也对一些人过分崇洋、盲目引进的作法颇有看法。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穷国，钱要花在刀刃上，不能只顾眼前，什么都从外国买，汽车、冰箱、香烟，全用外汇太可惜。引进是洋为中用，要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变成更先进的。我们不能走台湾的路子，台湾的经济命脉有八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这是不好的。什么都一个度，过度依赖外国经济，就会受别人的摆弄和控制。我们开放改革的路子是好的，但越是开放越要有志气，不能让别人卡我们的脖子，过去我们吃的亏已不少了，应该吸取教训，我们国家应该把现代化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

他在为国内做技术引进工作中虽常常遇到困难，但仍执着地、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在有生之年更多地报效祖国是这位爱国老人的追求目的。

还是“泰山将军”的性格

泰山，中华五岳之首，峥嵘险峻，

气势磅礴。冯玉祥将军生前曾两度上泰山隐居，他最喜欢这座山，因此有了一个“泰山将军”的别称。

冯将军的性格也确似这座山，挺拔倔强，正气凛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活道路上，一生执著要作一名人民公仆。对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曾和蒋介石结为盟兄，但当蒋介石反人民的独裁本性暴露后，他毅然和他决裂。蒋介石逼他出国考察，并派特务盯梢，面对威胁，冯将军毫不惧怕，仍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

周恩来曾评价冯玉祥：“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

冯洪志颇似其父，性情耿直，刚正不阿，认准了的事非干不行，看不公的事仗义直言。

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逝世，冯洪志听到消息就想去吊唁，并安慰嫂子蒋方良和几个侄子。顺便还可以会会老朋友，做点两岸统一的工作。

他来到台湾驻美办事机构，掏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说：“我要到台湾吊唁蒋经国先生。”办事人员接过护照一看又还给了他：“不行，凭此证件不能进台湾。”“那么什么证件才能进？”“拿美国证件可以进。”冯洪志听了十分气愤，“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要用外国人的证件才能进？我就是要用这个护照，就是要作第一个持这种中国护照进台湾的人！”办事人员见老人发了怒，忙说：“冯先生您就用绿卡吧，否则要向台湾请示才行。”冯洪志铁青着脸说：“我宁肯不去，也不使外国证件进自己的国土！”这掷地有声的言词惊得台湾办事人员目瞪口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倔犟的老头儿。

冯洪志每年回国，都有许多省市的领导邀请他去参观、考察或坐客。凡他遇到看不惯的事总忍不住要放几炮。

有一次，陕西一位省长邀他去瞻仰轩辕黄帝陵。归途上，这位省领导同志问道：“冯先生，您此次黄帝陵祭祖有何感想？”

冯先生说：“感想是有，但不好

说，说出来也不中听。”

“咳，自家人何必客气！说吧，没关系，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哈哈。”

“那好！我就说说。”他清了清嗓子说：“省长大人，黄陵需要修理了，政府花上百万的钱修蒋氏坟，为什么不花点儿钱修修老祖宗的坟？再说，今天祭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但我坐的是外国车，听的是外国歌曲，老祖宗要是地下有知，可要翻身喽！”……

1991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座谈会在北京芦沟桥召开，去了不少领导同志和社会知名人士，有一位首长在谈话中说：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位首长讲完话刚坐下，冯洪志突然站起来说：“同志，我对你这句话有意见。”“什么意见呀？”“你所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我有意见，如果说是彻底胜利，那么被日本人占去的土地就得全部收回，可现在琉球群岛还在日本人手里，钓鱼岛的事情还没解决，怎么能说是‘彻底’？”

冯玉祥将军生前在生活上的俭朴也是出了名的，在泰山时总是一身布装、布鞋，他不抽烟，不喝酒，他说：“我的口号是：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他在给儿女亲笔信中要求他们“要平民化，不可有一点官宦人家子女的样子，要节俭，即是不妄用钱。”冯洪志牢记着父亲的榜样和嘱托，在国外40多年，生活上仍象父亲一样俭朴，在国内外的许多重大场合，参加国宴、晚会或领导人会见，他常常身着中山装或中式棉袄。他吃饭也从不讲究，能填饱肚子就行。有一次在一座高级宾馆吃饭，他竟点的是炸酱面和小笼包子，令服务员十分惊奇。在上海，他早上起床到街上遛弯儿，常用外汇买油条豆浆当早点。常自掏腰包付路费，为山东搞文化交流一下捐了一万美金，不顾自家为国家，这也是“泰山将军”的性格遗风吧！

[责任编辑：晓度]



“关羽文化” 启示录

○陈 辽

此次去荆州(湖北江陵)参加第七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参观游览荆州,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即三国时代的关羽虽已身死1700多年,但“关羽文化”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有“关公馆”(在原“关帝庙”的遗址上重建),而且有关羽画、关羽戏,关羽雕刻、关羽剪纸以及歌咏、评价关羽的众多诗作。这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有关关羽的论文也有好几篇。可见“关羽文化”延续至今已是一种客观存在。

关羽在三国时代是一位有名的武将。他曾追随刘备建功立业,为刘备创建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大意失荆州,又使刘备的基业遭受了严重损失。比之三国时代的其他有名武将,关羽的作为,并不较周瑜、吕蒙、张辽、徐晃等人突出。然而,为什么“关羽文化”延续到今天,而三国时代的其他武将却没有这份殊荣呢?

我以为,我国之所以出现“关羽文化”并延续至今,首先得归功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关羽这一人物的成功创造。他把关羽写成中国人民“义勇”的化身。参加“桃园三结义”的是他,“刀劈华雄”的也是他,“屯土

山约三事”的是他,“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寻找哥哥刘备的也是他,“义释曹操”的是他,“显圣追杀吕蒙”的也是他。然而,这些事迹在《三国志·关羽传》里是没有的,全是罗贯中的艺术创造。于是他把关羽从一名武将提升为“武圣”;以一个凡人提炼成“天神”。然而这个“天神”又具有活生生的性格,因此关羽便成了“功盖天地、义勇冠三军”的关公,并由此出现了“关羽文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荆州人民谈起关羽来,仍然是眉飞色舞,以关羽曾经担任过荆州的军区司令员和地方长官为荣。由此得到启示: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可以塑人、教育人、鼓舞人,给人以美的享受,以至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文化。把文艺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是错误的;“玩文艺”更是要不得的;文艺战线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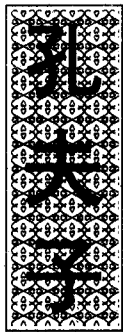
第二,罗贯中对关羽的这一艺术创造,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关羽文化”延续至今的又一重要原因,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里,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人民群众是绝少被作家们注意

到的。即使是《水浒传》写的也是一百零八“将”,而非普通的小百姓。但是,人民群众仍然强烈地希望并且努力表现自己的要求和意志。既然普通的小百姓不被封建社会里的人们重视,他们便在过去的英雄、豪杰身上寻找自己的表现,把自己的要求、愿望通过这些英雄、豪杰表现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关羽(当然不仅仅是关羽),创造了许多有关关羽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把他们对于“义”和“勇”的要求和愿望集中在关羽身上。由此衍变而为关羽传说、关羽故事和关羽戏曲等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罗贯中在创造关羽这一人物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关关羽的传说、故事和戏曲资料,再益之于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终于创造出了关羽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而当关羽这一艺术形象被创造出来后,人民群众以在这一艺术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是“关羽文化”之所以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又一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又得到启示:文学作品只有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要求和愿望,才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第三,“关羽文化”之所以出现并延续至今,统治阶级的提倡也起了很大作用。还在《三国演义》问世前,封建统治阶级即企图通过神化关羽为自己服务。所以,至少从南宋开始,关羽即受到尊崇;《三国演义》问世后,明、清统治阶级更对关羽多次封赠,一直把他提高到“关圣帝君”与皇帝并列的地位。因此在“关羽文化”中也有两种成份,一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关羽文化,一种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关羽文化。延续至今的“关羽文化”是这两种文化成份的混合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被“关羽文化”热昏了头脑。对“关羽文化”进行清理,分清什么是人民群众的,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应该是今天《三国演义》研究者,关羽研究者、关羽文化研究者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由此,我们又得到启示: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研究家从事创作和指导的思想,不能须臾忘之。

可见,“关羽文化”对我们的启示绝不是没有教益的。

近年,从东亚日本到欧美诸国,日益兴起了我国古代先圣的孔子热和儒学热。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不仅早就传扬中华域外,而且大步走向世界。本文对此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和史实,以期引起读者注意,并思考应如何正确对待、批判吸受和继承发展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悠然走向世界

○姜国柱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文献整理家,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他本人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富于深刻的哲理和为人的真谛。其思想底蕴涉及到宇宙本体、求知之路、为学之方、做人之道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悠久的辉煌文化,中国以“文明古国”与“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界,大都与儒家思想的熏陶、教化有密切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即对形成中国人的人格、国格、尊严等,都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相当广阔的地域中,都产生了历史的、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也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尽管极力贬抑中国哲学(当然包括孔子)的地位、作用,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500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还指出:“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可见,孔子对欧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岂止是欧洲,应当说,孔子的思想影响是世界性的。请看以下史实:

一、孔子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受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早最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子思想和汉字一同传入了朝鲜。公元1世纪到7世纪,是朝鲜早期的封建社会,即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在三国已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公元372年,高句丽根据中国的制度,建立了太学,并以儒家的“五经”(《诗

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教材,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派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公元285年,百济国王派遣王仁东渡,将《论语》等儒学著作传入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百济国曾聘请中国学者去讲授儒家思想。新罗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收佛、道思想,而建立了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同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唐朝学习儒家思想学说。公元675年,新罗统治者在首都建立了学习研究儒学的最高学府——国学。并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考试科目选拔官吏。

公元935年,高丽王朝统一朝鲜后,继续尊崇儒学,推行儒家思想,建立文宣王庙,扩充国学,设立州学,开办私学,广泛传播儒家思想。高丽王朝的统治者,极为推崇儒家思想,提倡忠孝观念,鼓励人们阅读儒家著作。他们认为,孔子之道“垂万世”,教“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之理。因此,要遵从孔子之教,履行孔子之道。

公元1392年,李氏王朝取代高丽王朝。李朝统治者,全力推行儒家思想,使之成为唯一正宗、正统的统治思想。李朝政府积极发展儒学,中央设立成均馆,府县设置学校,民间开办书堂,全面推行儒学,使儒学在朝鲜达到了全盛时期。应当看到,此时朝鲜的儒学,主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朱熹的“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知行观,教育、启发了朝鲜的儒生,培养一批理学家。其中李晃(公元1501—1570年),号退溪,是16世纪朝鲜的理学大师。他集朱子学之大成,把朝鲜的理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东方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占朝鲜后,开始打击儒家思想,企图摧毁朝鲜人民的传统思想。朝鲜人民

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产生了“东学党”，宣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东学，反对西学。1894年东学党领导了农民起义，其纲领是：“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在当时，儒家思想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后来，日本侵略者又改变了其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别有用心地大搞儒学复兴运动，提倡祀孔、读经。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家思想开始式微。但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朝鲜又掀起了儒学的复兴运动。至今在南朝鲜，儒家思想仍有深广的影响。

二、孔子对日本的影响

公元285年，百济的王仁东渡日本，向王子菟道稚郎子献《论语》、《千字文》等，从此儒家思想传到日本。王仁和其他渡日学者，在宫中讲授《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作，使日本真正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推动了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久，出现了日本古代的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公元513年，开始设立《五经》之学。7世纪，圣德太子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深入发展，文武天皇朝颁行大宝令，规定各级学校，讲授《论语》、《孝经》、《左传》、《周易》、《尚书》、《三礼》等儒家经典，并以儒学和汉学的有关内容，作为选拔官吏、策试官吏的题目和标准。

由于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它对日本古代的政治、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大化革新(公元645年)和大宝令(公元701年)的制定，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入，孔子的地位亦日益提高。大宝令规定，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太学和国学都要祭祀孔子。孔子被封为“先圣孔宣父”、“文宣王”等。祭孔之日，由明经博士宣讲《易经》等，仪式十分隆重。

日本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从12世纪到17世纪)的600多年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倍受重

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教为圣教，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其他思想学说被视为异端邪说。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德川幕府时代的儒学，是朱熹所精心构筑的儒家思想学说——朱子学。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而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形态，并成为一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统治工具。由于人们追求思想自由发展，需要挣脱封建思想禁锢，于是儒学思想内部发生了分化，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主要学派有：古学、阳明学、南学、古义学等。朱子学渊源于朱熹，阳明学渊源于王守仁，古学派渊源于吴廷翰。就是说，当时日本的主要思想派别的思想，都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流派。

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了近代的天皇制。这种封建制与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教育国民。因此，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尊孔之风日盛。日本的思想文化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日本明治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公元1847—1901年)在他晚年的著作《一年有半》中说：“我们日本从古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他认为，日本没有独创、独立的哲学思想意识，日本的哲学思想文化，是从中国传入的，即使是有所创新，也不过是在注释中国儒家的经书中引中和发挥而已。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见解。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

三、孔子对西方的影响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时候，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使“西学东渐”；与此同时，也将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入了西方，使“东学西渐”。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儒家的敬祖之礼、祭孔之礼、祭天之礼等，与天主教义并不矛盾，可以彼此相容并存。而

龙华民等则视为异端，谓宜禁绝。利玛窦在《二十五言》中，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来阐明基督教教义。他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实有，又信其至善而无少差谬，是以一听所命，而无俟强勉焉……。”西方许多来华的耶稣会士认为儒家思想(他们称之为孔教)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他们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极力寻找与基督教教义相合之处。殷铎泽说他翻译孔子等儒家著作的目的，是为了以《论语》、《大学》、《中庸》等书的思想，来宣传基督教福音的。

西方许多来华的耶稣会士，十分尊崇孔子的思想、人格、德行，有人推崇孔子为世界最古的圣贤。如李明在他的《中国现状新志》中说：“孔子哲学里，理性是遍一切时间和地点。”“顺世随俗而不失其庄重和美的孔子态度，其严格的禁欲生活(孔子可看作中国最寡欲的人)，轻视人世的富贵，尤其是在古圣贤中所罕见的特质，即孔子的礼让和谦卑，认为理性训练所成之纯哲学者，不如谓为领会神旨以改造新大陆的一人。”他们肯定孔子哲学思想的优越性，及其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因而在西欧广泛传播孔子的思想。

在耶稣会士内部，如何对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礼仪，也发生过一些歧义和争论。以利玛窦为首的赞成派与以龙华民为首的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上告到罗马教皇，请求裁决。教皇虽下了禁令，但争论却没有停止。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整整争论了100多年。随着争论的发展、深入，而使欧洲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礼仪，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公元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译本的《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哲学著作，从此孔子学说正式传入西方。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公元1676年就读过儒家著作，在公元1689年以后，结识了来华的耶

酥会士闵明我、白晋等人,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政治、伦理等方面,都比欧洲好。他说:中国人“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有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欧人惊异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了一日会面的时候,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的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中国人间,无论邻人也罢,婢仆也罢,因为生活习惯的缘故,总是常常保持着一种礼貌。”这就是说,中国人的政治、伦理、人际关系等,都远胜于欧洲人。莱布尼茨在公元1678年创立了以0和1两个元素表示所有数字的二元算术。当他20年后,看到儒家著作《周易》64卦卦象图的数学配列顺序,结果发现和他的“二元算术”完全相同,这使他异常兴奋,赞叹不已。

继莱布尼茨之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亦十分崇拜、积极提倡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他于公元1721年,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的实践哲学》。主要讲述:(一)中国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史,着重讲授孔子在中国的地位;(二)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的比较,即以中国哲学的“理性”与基督教的“神性”相对照;(三)中国人的道德原理与讲授者的道德原理相同。沃尔夫的思想通过弟子舒尔兹,再传给第三代弟子康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信理性,批判第一推动力的思想,可以说是间接受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影响的表现。

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法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前导的启蒙思想家,他们都崇拜理性,反对教会。中国和孔子是当时知识界讨论政治、宗教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非基督教信仰的世界,使他们异常高兴。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都来自孔子。因此,他对孔子极为服膺、称颂。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基督所从来没有的思想,基督只是禁

止人为恶,而孔子却是教导人为善。所以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是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的一言半语关系于人类的幸福。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悬挂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他写诗赞美孔子说:“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得了本国深深的爱好。”(转引自《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93页)

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对孔子更是推崇至极。他认为,孔子思想学说简洁可爱,强调道德和理性,反对暴力和迷信,与基督教完全不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者霍尔巴赫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社会体系》第一卷,第86页)

法国重农学派对孔子学说尤为推崇。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这是孔子早就明白的道理。他承认自己提倡的自然法,即按自然规律办事,实际上是儒家所说的天理。他以自己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而自誉。他认为,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之七贤。魁奈著名的《经济表》,被认为是完全继承孔子思想的。魁奈去世时,他的弟子大密拉博在哀辞中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赖赫准恩:《中国与欧洲》,第104页)由于魁奈如此敬重孔子,继承孔子,因而被重农学派称为“欧洲的孔子”。

孔子及其思想,不但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形成了东南亚的“孔子文化圈”,而且远过重洋,影响欧洲。就是在尚今,孔子的影响依然巨大,仍为世人所尊崇、称颂。德国汉学家毛来福认为:“孔子属于全世界。”他说:“孔子是和黑格尔、康德一样伟大的哲人。”瑞士汉学家胜雅律说:“孔子在西方舆论中是最有名气的中国人。……孔子作为一名大思想家,一方面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又属于其他民族,尤其可以给当代西方许多有益的启迪。”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教授说:“现在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高,认为孔子思想中还有很多对现代社会有用的东西。”近代学人、神学家费格立教授说:“……孔子是一个极有深远见识的思想家,拥有想象力,不亚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人。”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全世界诺贝尔奖金得奖人的一次会议,竟破天荒地做了这样一个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以上参见《大众日报》1988年10月10日第四版)

孔子的思想,从古及今,从中到外,都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的真实价值,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承认;孔子的思想影响,将会愈来愈大,正如毛来福先生所说的:“孔子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孔子及其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并为世界所公认,就在于孔子思想有许多“珍品”、“精华”。今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让他的思想精华更加发扬,为人类精神文明增辉,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孔子、认识孔子。

(责任编辑 尚弓)



今年是台湾收复 330 周年,也是郑成功在台湾逝世的 330 周年,人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中华民族杰出的民族英雄和他对祖国对人民建立的旷世功业。

一、海上世家

郑成功本名郑森,字明俨,又字大木,祖籍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村(古名安平镇)。明朝天启 4 年 7 月 14 日(公元 1624 年 8 月 27 日)生于日本平户。

郑成功的家乡濒临大海,自古以来便是通商外洋的著名港口。郑成功出生时,已是明朝末年,这时中国封建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特别是在平定了为患多年的倭寇之后,沿海经济更加繁荣。不论是手工业还是农业,商品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使得本来就有着经商传统的福建人,商业活动更加活跃。但是明朝官府并不鼓励人民出海经商,自明初以来便公布了严厉的禁海令,外来商人的贸易也由官府严格控制。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商人,他们往往置官府的禁令于不顾,甚至不惜以武力与官府对抗。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便是一位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著名海盗商人。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娶了翁氏女为妻,一年后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郑成功。

郑芝龙与当时一些从事抢劫的海盗不同,他所到之处并不滥杀百姓,对赤贫者还给予钱来资助。禁止部下掠掳焚劫,除了勒富民助饷外,并无劣迹。百姓归之如流水。官府也很看重郑芝龙的才能,想借他之力平定各路海盗。郑芝龙曾几次接受朝廷招抚,但不久又叛离,直到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9 月,郑芝龙才通过巡抚熊文灿接受招抚,朝廷下诏授给他海防游击将军之职,后又升为副总兵。

郑成功 7 岁时回到家乡南安县。郑芝龙以重金礼聘名师为郑成功教授功课。希望他能通过科举入仕,光耀门楣。

郑成功聪颖异常,他读书重义理而不强活章句。十一岁时,老师出“洒扫进退”为题让他作文,这一似是叙述日常生活礼仪的题目,而在郑成功

千古英雄

郑成功



○毛佩琦

笔下却做得大气磅礴。他在文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一揖让,一进退也。”如此襟怀抱负,令老师大为惊叹。郑成功读书之余,则舞剑骑射,熟读孙、吴兵法等书。崇祯 11 年(公元 1638 年),15 岁的郑成功考为南安县县学诸生(明清时期地方各级学校在学学生的统称。经省各级考试录入府、州、县学者称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等,统生诸生。)因为成绩好而得以享受 20 人的廪饩(廪生享受的廪米)。郑成功风仪整秀,心怀大志,长辈对他寄以厚望,认为他将来必定成就一番大业。

二、危难受命

崇祯 17 年(公元 1644 年),明朝

灭亡,清军入关。全国各地,特别是仍然控制在明朝外地诸王手中的江淮大地上,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清复明抗争。以南京为中心的故明官民拥立福王朱由松即皇帝位,年号弘光。

南京曾是明朝的院都,有一套与北京大致相同的政府机构。拥之福王即位的主要人物便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福王即位后,封史可法、马士英兼任东阁大学士,成为弘光帝内阁辅臣。史可法不久又奉命督师扬州,抵御清军南下。

20 岁的郑成功就在这时来到南京,慕名投靠到礼部尚书钱谦益的门下,颇受钱谦益的赏识,“大木”这个名字就是钱谦益为他起的。钱谦益还送他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这原是与

北京国子监并立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生有资格直接参加进士考试。

南明小朝廷的建立，虽然名为复兴故明大业，但朝纲紊乱，大小官员互相为私利倾轧，争斗得如火如荼。清廷武力长驱直下江南，金陵危急，但抵抗清军的只有史可法一支孤军。史可法向南京血书告急，被置之不理，不久，扬州城破，史可法不屈而死。清军在扬州屠城十日，死亡80余万人，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扬州惨案。继之，南京城陷，弘光帝及大批文武官员降清。其中就有久负盛名的钱谦益。郑成功对南明政权的腐败和钱谦益的降清甚为失望，只得暂回福建。

南京陷落后，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控制浙东地区，黄道周、郑芝龙又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福建是郑成功的家乡。唐王即位后，福州成为抗清的一个中心。郑成功在福州朝见了隆武帝。隆武帝见到郑成功伟岸的仪表和言谈举止，很为赏识。他抚摸着郑成功的背说：“可惜我没有一个女儿与你匹配。你当尽忠于我家，不要相忘！”并赐郑成功姓朱，以示恩宠，从此人们都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弘光时，郑芝龙被封为安南伯。江南陷落之后，郑芝龙便成了明朝在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力量了。后来他又拥立了隆武帝，而且为隆武政权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鉴于他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隆武帝封他为平虏侯，进平国公。但是海盗出身、手握重兵的郑芝龙对南明小朝廷并不是忠心不二，这颇令隆武帝担忧。一天，郑成功在宫中见隆武帝独自愁坐，就跪在隆武帝面前，对他说：“陛下郁郁不乐，难道是因为臣父有异志吗？臣受国恩，义无反顾，臣甘愿以死捍卫陛下！”

隆武2年（公元1646年，清顺治3年），清军攻破钱塘江防线，监国鲁王朱以海逃往海上，致使清军南下福建，直逼仙霞关。久有降明之意的郑芝龙决定投降清廷，此时，正在安平探望母病的郑成功，对于郑芝龙撤兵并准备降清大为不满。他劝父亲不要投降清朝，建议郑芝龙立足闽粤，收拾人心，大开海道，筹措兵饷，选练将士，号召天下，以图进取，恢复中原。但郑芝龙不听。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

的帮助下，带领一支队伍逃到金门。

郑芝龙终于降清了。临行前，他派人到金门找郑成功，要他同行，遭到拒绝。郑成功在给父亲的信中再次痛陈己志。他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二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缙素而已。”

三、浴血奠基

仙霞关失守，清军在福建大肆劫掠，对毫无防备的百姓淫掠烧杀，连郑芝龙的老家也不放过。郑芝龙的兄弟眷属乘船从海上逃命，郑成功的母亲翁氏自杀而死。郑成功闻讯后，失声痛哭，他披上孝服帅师赶回安平安葬母亲。国难亲仇，他决心担起反清复明的大任。

清兵在福建的烧杀抢掠招致了普遍的不满，各地百姓纷纷举起义旗抵抗清兵保卫家乡。郑成功把家迁到厦门，让他的叔叔郑芝鹏守护，自己到南澳去募兵。当时，整个福建地区都已被清朝控制，但是由于郑氏多年来在海上的威名，郑成功仍然募集到不少人。第二年春天，郑成功移驻鼓浪屿，与厦门隔海相望。

但这时，南明小朝廷分散各地的文武官员互不统属，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抗清指挥中心。隆武帝死后，桂王朱由榔又即位，改年号为永历。郑成功向永历帝陈述自己对时局的想法。不久，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威远侯，后又晋封为漳国公。

起初，郑成功并没有固定的地盘。平时练兵海上，出入海澄、镇海卫、鼓浪屿之间。他曾与郑鸿逵联兵进攻泉州，在当地武装和百姓援助下，攻下了泉州。

郑成功首战告捷，使他声望大增，来投奔的人也更加增多。逐渐控制了福建漳、泉沿海和广东潮州一带。随后，他又占领了金门，厦门。从此，厦门就成为郑成功的抗清复明基地。郑成功在厦门扩军练武，部众达到4万余人。军事实力大增。郑成功已成为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领袖，南明遗臣故老，海上骁兵悍勇，都纷纷前来依附。

此时，在西南地区的桂王永历政权成为维系各路抗清力量的核心。农

民起义军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也都加入了辅佐永历帝抗击清军的队伍，并成为主要将领，他们与远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遥相呼应，成为支撑永历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

永历4年（清顺治7年，公元1650年），清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以骑兵数万人加紧进攻广州。永历帝从肇庆逃到南宁，并派使者到福建，向郑成功告急，要他带兵勤王。

郑成功南下的消息被清福建巡抚侦知，他认为这是夺取厦门的好机会。于是便命泉州总兵马得功、漳州总兵王邦俊兵分两路夹击厦门。由于清军势力强大，留守厦门的郑芝莞听说大兵袭来，不敢迎战，弃城而逃。守军不战而溃，百姓四散逃命。清军进入厦门，将郑氏多年积储的财物洗劫一空后，便匆匆撤退了。

这时郑成功的军队已经攻克广东惠州附近的大屋所，广州近在咫尺了。正当全军为胜利欢欣鼓舞的时候，厦门陷落的消息传到军中，军营中哭声一片，纷纷要求回师援救厦门。在将士们的坚请下，郑成功只好班师回航。也对未能完成勤王大业，痛苦地说：“非臣不思，势使然也。”

清顺治8年（永历5年，公元1651年）5月22日，郑成功督师到海澄磁灶，26日，清军漳州总兵王邦俊率海澄马兵数千人到磁灶与郑军对垒。郑成功认为这正是个好机会，欲图进取，先从漳泉起手，然后再募集兵士，广积粮饷，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地区，重建抗清复明基地。于是，他率领军队，在磁灶与王邦俊打了一仗。清兵溃不成军，死伤遍野，郑军缴获了大批马匹辎重。九月，又再次发生激战。清军战败，王邦俊、陈尚智夺路而逃，仅以身免。郑军越战越勇。接着又在小盈岭打败敌兵，并相继收复了漳浦、诏安、海澄、南靖、长泰，直逼漳州。

清军在福建的连连失利，震动了清廷。顺治9年（明永历5年，公元1651年），清朝派固山额真金砺，自浙江开赴福建，会同福建巡抚刘清泰围剿郑成功，以解漳州之围。郑成功在海澄迎战清兵。清军马步兵数万人驻扎在城外，并调集十县民夫二万人，抬运攻城器具。郑成功也会同海澄守



厦门鼓浪屿圆山上的郑成功纪念馆

军备办守城器具，并亲自督战。清军用大小抗炮数百门日夜不停地袭击郑军营地。郑军防御工事尽毁，士兵无可容身，死伤惨重。

郑成功见营垒残破，官兵面现惊惶之色，他一面传令各营，鼓舞斗志，一面亲自督战，带领诸将到敌台上瞭望敌情。一次，他正在敌台上瞭望，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冒险。郑成功说：“死生有命在天，虏炮对我有什么办法？”他仍然坚定地登上敌台，遥望前方，一一指点。敌人发现郑成功登上了敌台，便调转炮口向他射击，弓箭也密集地射了过来。这时，站在他身旁的典膳役苏贵忙把郑成功推下台来，就在这一刹那，忽听一声炮响，郑成功刚才坐的地方正好被击中。

郑成功重新部署了兵力，并用计诱敌出战，结果，郑军大获全胜，清军惨败。战后，郑成功调集民夫重新加固海澄城，加高城墙，又在城上安设大小火炮，城四周环绕海水，外通舟

楫，内积粮草军器，使海澄县城固若金汤，成为郑成功抗清的重要军事基地。

四、丹心映日

清廷见一时难以用武力征服郑成功，同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李定国，阻止郑成功与李定国的联合，便转而对郑成功采取以招降为主的办法，利用郑芝龙与郑成功的父子亲情胁迫郑成功降清。

早在顺治9年(南明永历6年，公元1652年)，顺治帝便密敕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诱降郑成功。如果郑成功归顺，可以赦罪授官，并听驻原地负责沿海地区防剿海盗及管理洋船等责。

顺治10年(永历7年，公元1653年)正月，郑芝龙派家人周继武带信给郑成功，劝说他接受议和，遭到郑成功的拒绝。8月，周继武又带了郑芝

龙的手书，说清廷即将派人带着敕印来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给予一府之地，命他接受投降。郑成功写信给郑芝龙说：“当初清廷说给你三省王爵，并答应一到省就可还家，一入京便可出镇，但最终你却做了囚虏。清廷失信于你，我还敢相信吗？”接着，他痛斥了清军在家乡的暴行：“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厦门)，蹂躏我疆土，虐刘我士民，擄辱我妇女，掠我黄金90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钱帛，何可胜计？……”他还说，如果清廷有和谈诚意，那就要“给我三省之地，不然我部下十万之众难以安插。”郑成功利用与清廷和谈的机会，分遣各镇将领到漳泉等地扩征兵饷，为壮大军事实力做好积极准备。

顺治11年(永历8年)2月，郑成功在安平东山书院会见清使，清廷答应以漳、泉、潮、惠四府之地，划归郑成功；并封他为海澄公，授以靖海将军印。郑成功明确提出由于兵马繁多，非数省不可插。并提出，如真心和谈，必须如清廷与朝鲜、高丽和谈的先例；不剃发，不改衣冠。这个条件当然是清廷无法接受的。

6月，清廷再次派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和郑芝龙的二子郑渡来福建劝降。郑成功在厦门见了郑渡，但要清使赴安平与他会见。为了安排安平会见，郑成功派二十二员大将率领大批人马和各路水师前往安平，列营数十里，旌旗蔽日，旗帜鲜明，声威显赫。清使叶成格、阿山也带领数千精骑，步旅万余，来到安平等待与郑成功会见。一时间，两军营帐漫山遍野，互相严密提防，这是一次实力与决心的较量。

会见时，郑成功要求清使先读诏书，开始谈判，但叶、阿二人却要求郑成功先剃发。互相坚持数日，各不相让。叶、阿无可奈何，不降而别，携带兵马撤回泉州，安平会谈又告吹了。

郑成功听到清使返回的消息不禁大笑，他说：“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举动乖张。我不过是因为父亲被扣在北京，不得不暂作痴呆演出这场戏罢了。”此次和谈失败之后，郑成功在写给郑渡的一封信中说：“兄弟离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

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他在信中又说：“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井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夏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表现了他维护民族尊严的激烈感情。

在这次和谈期间，郑成功派人到永定、白土寨、长乐等地征饷，并乘机扩大地盘。清廷为了进一步逼郑成功就范，便把郑芝龙关入监狱，于是郑芝龙又派家丁谢表等来劝降。谢表等于顺治13年（永历10年，公元1656年）11月就到福建，可是直等到第二年正月才见到郑成功。当然这次劝降又被郑成功拒绝了，清廷对郑成功的招降至此完全失败了。

五、泪洒金陵

郑成功并不想在东南一隅划地而守，他的大志在于北伐中原，中兴明室。在与清廷和谈的过程中，他没有忘记扩大自己的实力以待来日一展鸿图。他广集粮饷，扩大地盘，致力于军政建设。

永历帝曾允许郑成功可以自行委任文武官员，武官许至一品，文官许设六部主事。他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及司务、察言、承宣、审理等官，以分理庶事，讥察利弊。设立了储贤馆与育胄馆，广为征集、培养人材。永历帝曾在粤西开科举士，凡是愿去参加科举的，郑成功都发给路费，阵亡将领和侯、伯子弟则可以进入育胄馆深造，以承父业。

在军事上，郑军原来实行五军制度。至此，他把陆军分为七十二镇，水师分为二十镇，每镇分中前后左右五协或营，由镇帅或副将主之，他还加强了军事训练，亲自教练督操，逐队加以指示，并把各镇操法和水师操法刻印成书颁发给将士。郑成功约束军队纪律严明，军官督操不认真或失职的，轻则杖责，重者降级。将士出征，禁止淫掠。官兵奸淫抢掠，连罪将领，

阿私不举，要治罪总制。由于郑军所到秋毫无犯，百姓都不畏避郑军，妇孺老幼都敢与他们争道。

在经济上，除了向地方征粮以供军饷外，海上贸易仍是郑成功的主要财政来源。郑军保护海上贸易，并经营五大商行和东西二洋的贸易。五行资本雄厚，拥用庞大的船队。郑氏的商船队东到日本南到吕宋（今菲律宾）、罗（今泰国）、柬埔寨、安南（今越南）等地，丰厚的商业收入使郑军饷源充足，并且为郑军供给了充足的物资，用以打造武器、盔甲，还铸造了永历钱。

经过多年的经营建设，郑军军威大震，为了早日完成复明大业，郑成功与李定国遥相呼应，又与逃来福建的鲁王余部张名振配合，打了不少胜仗，沉重打击了驻守福建的清军。

顺治10年（永历7年，公元1653年）3月，郑成功派张名振与陈辉一同率水师战船二百余艘进入长江，收复江浙。12年7月，又命洪旭率师北上进攻清朝腹地，克复舟山，进入台州港，13年（永历10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派甘辉北上，克复闽安，斩清将阿格商。

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所得地方频得频失，没有大的进展。于是，郑成功决定北伐，攻取金陵。他先派杨延世、刘九皋到粤西向永历帝送上奏本，说明督师北伐的决定，并要求永历帝下令李定国、孙可望领兵北出洞庭，与郑军合力进攻南京，以迎接圣驾。

郑成功开始为北伐积极进行准备。命兵官点验驻防思明州的水陆官兵，从人员配备到旗帜是否鲜明、武器是否充足齐备，都要一一验明回报。同时还要夫人出面，做好出征将士的家属工作，鼓舞士气。

接着，他又抓紧储备粮食、并画了秘密地图，还参考清军铁甲的样子，打造了铁臂、铁铠、两臂、裙围、铁鞋等，又打制了一种铁面，只露眼、耳、口鼻，面上用五彩图画。戴在脸上如同鬼形，号称铁人。士兵由军官带领，从实战要求出发进行了艰苦的训练，郑成功还要求将士进行水上操练，舳舻陈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掷上下，矫捷如飞。

郑成功还给军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禁令，令中说，众将士征战十多年，“总从报国救民起见，亦为勋名富贵后来子孙计，因此纪律必须严明。”他要求“上之戍缉必严，下之奉行惟谨。”

经过细致缜密地准备之后，顺治15年（永历12年，公元1658年）5月13日，郑成功率领号称80万人的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长江进发，开始以攻取南京为目标的北征了。

北伐大军声威浩大，帆樯遮天蔽日，绵延数十里，沿途清军纷纷投降来归。但当大军行进到江浙交界处的平山时遇山大风暴，船上损失惨重，郑成功的六个嫔妃和三个儿子也都遇难。遭此重创，郑成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在次年3月，才又率军北上。

经过休整后的军队士气旺盛，一路上，攻宁波、袭江阴、陷瓜州、克复江南重镇镇江，眼看南京就在眼前。南京曾是明朝的陪都，又是大明政权的奠基之地，郑成功眼看这座雄城不久就要在自己手里光复，不禁感慨万千，吟下了雄壮的诗句：

缟素临江誓灭胡，
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教天堑投鞭渡，
不信中原不姓朱。

7月初7日，郑成功来到南京城外观音门，拜祭明孝陵。11日，郑军伏兵截获了一份清政府的塘报，塘报的内容是说镇守南京的江南提督管效忠，自镇江失败之后，向苏、松等地请求援兵，又向清廷告急，说南京已危如累卵，请求派兵求援。郑成功看了这份塘报以后大喜，说：“象这样，南京一定会投降了！”与此同时，郑成功又接到管效忠表示愿意投降的信，但信中提出须等30日之后再向郑成功投降，因为清廷有规定，守城超过30天的，对守城将领的妻孥不治罪，而驻守南京的清廷将士的妻孥都在北京，因而请求郑成功宽限。

郑成功料定清军必降，就产生了轻敌麻痹的思想，按兵不动。大将甘辉说：“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怕敌军援兵一到，攻城就会多费一番功夫，请迅速攻城。”郑成功说：“所以未立即攻城，是想等敌人援兵齐集，一战而全歼敌人。管效忠知道我军的厉害，不投降也会逃走，况且附近郡

县相继归附，孤城援绝，他不降还等什么？”这时，江西九江等处听说郑军围攻南京，纷纷起义响应，一些地区的清军将领也与郑军联系，表示愿意投降，使郑成功更是坚信南京必克，放松了警惕。攻城的迟延也导致了部下的麻痹，有些士兵甚至在南京城外撒网打鱼，闲情消遣起来了。

其实，管效忠所说的缓降 30 日的话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他是在等待援兵。果然，郑军还没有动手攻城，清军已经向凤仪门外郑军前锋镇开炮了，郑军堵塞在路口上的炮都被击碎。清军大队人马又从城里冲出，郑军措手不及，前锋崩溃，导致全军战败。

郑成功虽几次布署兵力，企图挽回败势，但大势已去，大将甘辉、万礼、林胜等都在战斗中相继阵亡，郑成功十分悲痛，他对诸将说：“这都是我轻敌之过！”南京之战失败之后，郑成功带兵退出长江，开始，他还想取崇明作为基地。但崇明城坚难攻，郑军又因在南京战败，将士斗志不旺，只得撤回福建。为了缓和清军的进剿，郑成功派人到北京去议和，但这时由于南明小朝廷大势已去，永历帝逃到了缅甸，清廷不但拒绝和谈，而且调集大军围剿郑成功。清廷为了彻底剿灭郑成功在沿海的兵力，下令在沿海地带实行迁界政策即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沿海所有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许下水。严惩郑芝龙，查抄郑氏在南北各地的商行，掘毁郑氏祖坟。将投诚官兵分散，移往各省垦荒，防其再叛。清廷企图隔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困死郑成功。顺治 18 年（永历 15 年，公元 1661 年）8 月，清廷派户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实行迁海令，沿海居民全部被焚毁，片石不留。大火一直烧了两个月，居民络绎道途，流离死亡过半，惨不可言。

张煌和李定国失败后，郑成功已成孤军，迁海令的实行，使环境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徐图发展，郑成功决心开辟新的抗清基地，收复台湾。

六、收复台湾

台湾在古代叫夷州，又名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熹宗天启 4 年（公元 1624 年）后，被荷兰殖民主义者占领。他们把台湾做为海上贸易的基地，并移民垦荒，实行殖民主义统治，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榨取巨额利润。当地居民不满荷兰侵略者的压迫和虐待，于清顺治 9 年（南明永历 6 年，公元 1652 年），在郑芝龙旧部郭怀一的领导下，曾发动起义。起义遭到荷兰侵略者的血腥镇压，战死和被俘遭杀害的男女达万余人。

郑成功早有恢复台湾之志。郭怀一的起义就受到了郑成功的鼓励。但当时他专力北进，抗击清军，一时无力东顾。

两年前，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何斌，曾经向郑成功献上台湾地图。地图上标明了入台水路和荷兰人布防的情况。他还向郑成功报告了公司的许多秘密。何斌原是郑芝龙的部下，在暗中替郑成功管理在台湾的税务，成为郑成功在台湾的代理人。他备述了台湾百姓受到荷兰侵略者的压榨之苦，请求郑成功出兵台湾，赶走荷兰侵略者。

郑成功在打败清军的进攻后，便召集众将商讨进兵台湾的事。他向诸将陈述了进兵台湾的理由：台湾距离不远，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立足台湾、广通外国、积饷练兵，进可恢复中原之地，退可无内顾之忧。他驳斥了不同的意见，排解了畏难情绪，坚定了诸将进军台湾的决心。

清顺治 18 年（南明永历 15 年，公元 1661 年）2 月，郑成功命世子郑经及洪旭、黄廷、郑泰等大将留守厦门、金门诸岛，自己率大军攻复台湾。

27 日，200 余艘战船，满载着 25000 余将士，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一次历史性的远征就这样开始了。

大军航行到柑桔屿时，海上突然起了大风，郑成功不得不下令退回澎湖内屿暂避。当时，郑军所带粮食，仅够路途所用，一旦行程受阻，时间延搁，粮食便不够，而附近荒岛，又无处筹粮。郑成功极为忧虑。他耽心北风无期，延误进兵大计。郑成功徘徊

再三，终于决定不顾危险，传令出发。当时风暴未停，云雨晦暗，管中军船蔡翼和陈广等向郑成功请求等风雨停后再出征。郑成功坚定不移地说：“坚冰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答应我平定台湾，今晚开驾后，自然风恬浪静了。难道众将士能在这座孤岛上受饿吗？”这天是 30 日。夜间一更后，郑成功传令开船，天上的风雨稍稍减少，但大洋上的狂涛依然未息。船行至三更以后，只见云收雨散，天清气朗，北风又起，将士们如虎添翼更加振奋，大小战船扬起了风帆，鼓浪而东。

郑成功要进攻台湾的消息早就在台湾岛上闹得风风雨雨。揆一逮捕了一些据说是知道郑成功行动的人，对他们施加拷问、恫吓。整个台湾岛一片惊慌、混乱。揆一还以即将发生战争为借口，将大批农民赶出家园，稍不从命便会有生命危险，致使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还禁止渔民下海捕鱼，用残酷的手段破坏进口贸易，同时加紧修筑炮台、整治工事。

通向台湾港（又称大员港）的航道，被一座称做北线尾的沙洲一分为二。南航道在北线尾与鲲身之间。这里口窄水深，可行大船，称为大港。但荷兰人在鲲身北端建有热兰遮城堡，控制了航道。北航道在北线尾与鹿耳门屿之间，这里水面宽阔，但水浅沙淤，航道迂回，只能行小船，称为鹿耳门港。在何斌的引导下，郑成功决定从北航道开进台湾港。4 月 2 日早，郑军从鹿耳门驶向台湾港。说来凑巧，平日水浅的航道这一天潮水大涨，郑军进港非常顺利。200 余艘战船迅速入港，分布在广阔的海湾中。郑成功指挥将士纷纷登陆。岛上居民一看是王师来到，一下子涌出来几千人，用各种工具帮助郑军上岸。二万多人两个小时就登陆完毕。荷兰侵略者在普罗文查（即赤嵌城）和热兰遮的城堡上见到郑军迅速入港，迅速登陆，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四月初三日，揆一派汤马斯·贝尔德上尉率领 240 名士兵向北线尾的郑军扑来。同时，阿尔多普上尉也带领 200 名士兵乘领航船到普罗文查阻击已经登陆的郑军。贝尔德将军队一分为二，向郑军发起进攻。郑军集合队伍冒着敌人的洋枪迎战，同时

派兵抄袭敌人后方,使荷兰人腹背受敌。贝尔德见郑军勇猛难当便下令撤退,但荷军已经不听命令,惊慌恐惧,各自逃命。郑军乘势猛攻,奋力砍杀,将贝尔德及其部下全部杀死,缴获了大批枪械。

在普罗文查与热兰遮的海面上也发生了激战。双方互相炮击。荷军最大的战舰赫克托号中弹被炸得粉碎,船上的人一个也没跑掉。另一只大舰格拉弗兰号遭郑军火船燃烧起火,与帆船白露号一起逃往日本,通讯船马利亚号逃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整个海战还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郑军切断了海上交通,包围了普罗文查城,断绝了它与热兰遮城的联络,并控制了周围的农村。荷军陷入孤立之中,仅存的船只也在热兰城堡下不敢出战。

郑军切断了普罗文查城的水源,城内的环境迅速恶化。偶然出城的守城将领猫难实丁的弟弟夫妇二人被郑军抓获。郑成功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并将他们放还。二人向猫难实丁转述了郑成功的好意,猫难实丁决定出城投降。

随后,郑成功又派猫难实丁招降揆一。郑成功宴请了揆一的来使,但揆一并无意投降。他们要求郑成功撤兵,条件是每年向郑成功交纳税银和土货,并且为郑军此次远征提供劳师银十万两。郑成功严正地对来使说:“台湾岛一直是属于中国的。现在中国人要收回它,远来的荷兰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尽管岛上人民屡次受到荷人的虐待,荷兰军队又攻击了我们的船只和士兵,但是我仍愿意让荷兰人运走你们的全部财产和武器,离开台湾。如果你们违抗命令,便会自取灭亡。或者离开,或者继续抵抗,不用再谈判了。”

郑成功传令岛上百姓回家乐业。附近新善、开感等里的高山族首领纷纷前来拜见郑成功。郑成功设宴款待,并赐给正副土官们袍帽靴带。南北各地的高山族村落听说后,也相继接踵而至。郑成功还到高山族居民中了解民情。山胞提壶送水,出来迎接,沿路络绎不绝。郑成功向他们亲切地慰问,并送给他们酒食。人群欢动,欣喜万分。

郑成功的到来,使台湾人民感到

他们从此不再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虐待了。他们不仅帮助郑成功作战,还为郑军提供粮食。不少高山族居民自动奋起驱逐荷兰殖民者。他们把做恶多端的殖民者的头割下来,围着它跳舞狂欢。他们还愤怒地摒弃了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基督教,恢复了本来的信仰。

揆一拒绝投降。郑成功下令包围热兰遮城,向它发起攻击。大批小船冲向热兰遮城下。荷兰侵略军被迫退入城中。撤退前他们把城外的财产抢入城中,并四处放火烧毁店铺、工厂,想把它们烧成灰烬。郑军奋力扑火,抢救了不少居民商贾的财产。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郑成功决定在城四周架设木栅、挖掘壕沟,改用长期围困的方法迫使敌人投降。同时,派人到城中送信,对敌人发出敦促;荷兰侵略者必须交出城堡,郑军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揆一态度仍然强硬,拒绝投降。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中守军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人员锐减,除了战死的外,不少人染上疾病,健康的战士还只剩下400多人。

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局,为了维护他们的殖民利益,派遣考乌率领700名援兵,分乘十艘战舰开赴台湾。但是,先期到达台湾接替揆一的克伦克,见形势不妙,不敢登岸,逃到了日本。随之到达的援军因为数量太少,也使被困于城中的荷兰人大为失望。郑军则继续向城外增兵。

侵略军日益看到形势的严峻,终于认识到继续抵抗是无益的,决定放下武器,献城投降。经过五六天的谈判,清顺治18年12月13日(南明永历15年,公元1662年2月1日)揆一代表荷兰侵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不久,他们便带领残兵500余人和公司雇员、眷属以及财物等离开了台湾。

被荷兰殖民者占领了38年的宝岛台湾的上空又重新飘扬起中国的旗帜。台湾岛从此回归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登上城头,展望这用鲜血夺回的土地,不禁慷慨赋诗:

开避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菇苦间关不忍离。

在围攻热兰遮的八个多月中,郑军的处境也极为艰苦。粮食供给困难,筹运军粮的户官郑泰等滞留思明州迟迟不肯来台,官兵甚至吃木子充饥。不少士兵因而患病死亡。但是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入台以来,郑成功在下令到四乡购粮的同时,便分派士兵到各地屯垦。他规定屯垦士兵不得侵犯当地百姓的利益。对于搜掠百姓银两、盗匿粟米的军官或处死,或革职。鼓励将士爱护台湾的资源,限制将士们的砍伐和捕猎,一开始便表现出远大的怀抱,决心把台湾宝岛建设得更加富饶。

郑成功将普罗文查改为东都明京,设立了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一府二县,建立了一整套行政机构。他还改热兰遮为安平镇,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他告谕文武官员说,建立东都明京,开国之家,是万世不拔的基业。他还亲自带领官员到各地巡视,布趾耕垦,请老农向高山族居民传授耕作技术,教他们使用镰刀、犁、耙、锄、斧,兴修水利。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希望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家富人足的礼义之邦。

这时已是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这年,郑成功得到其父郑芝龙及其家属11人在北京被杀的凶信,不久又得知水历帝已被吴三桂杀害,心情十分沉重。加上一部分留守厦门的将士却不理解郑成功东进的苦心,不愿将家属送往台湾,积劳成疾的郑成功病情日渐严重。五月初八(6月23日)以手遮面而死。终年39岁。

明朝终于未能恢复,腐朽倾颓的大厦毕竟是独力难支的。但是,郑成功自起事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苦撑东南,威震海疆,北伐南京,牵动天下,东进台湾,收复国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崇高民族气节,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足以彪炳千古,光照日月。清人沈葆楨在为台湾延平郡王祠撰写的对联写道: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看天地,是创格完人。

[责任编辑:方徨]

项羽大战巨鹿城——

推翻秦王朝的决定一战

○丹 妮

此役确定了项羽西楚霸王的位置，使他得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

秦朝末年，秦将章邯打败了陈胜吴广，又打败了楚将项梁，就来攻打赵国。赵王忙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

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几万人马救赵。另派刘邦西进攻秦。

宋义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一路向北。走到安阳，宋义就让停住车马，不再前进了，一住40多天。

这时秦军攻城日急，赵国首都巨鹿危在旦夕，赵王天天派人来催，宋义就是按兵不动。

项羽很着急，跑进帐篷对宋义说：“我们既然来援赵攻秦，就该赶紧过漳河，和秦军交锋，我们在外边打，赵国军队从里边攻，内外夹攻，秦军一定会失败的。为什么长久驻扎在这儿，坐失良机呢？”

宋义摇头说：“您说错了。古语说，当搏牛虻，不破虻虱。就是说要谋大功，不求小利。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再去打秦国，肯定能赢。秦兵如果打不败赵国，我们就领军西进，直入秦关，可封秦王。所以我在这里等着秦赵决战，再决定去向。您不必性急，慢慢等着吧。骑马打仗我不如您，谋略计划您可不如我。”说完了自己鼓掌大笑。

当初，项梁骄傲轻敌，不听宋义劝阻，兵败身亡。宋义自然也不把项梁的侄子项羽看在眼里。

项羽压住一肚子火说：“秦强赵弱是很明显的，如果等秦灭了赵再去攻秦，我们连内应也没有了。如果您

是想西进入关封王，不是对楚国和赵国都不负责任吗？章邯是秦国主将，秦军主力，我们不去打他，怎么能走呢？”

宋义一听他揭穿了自己的心思，很生气，就说：“下去吧，你不必多说了。”

项羽只好压着火走出来。一会儿，宋义传出一道军令：“如果有谁像老虎那么凶猛，像山羊那么固执，像狼那样贪心，而又不肯听命令的，一律斩首。”这条命令明明是针对项羽的，气得项羽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

宋义还派儿子襄去齐国作相，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并摆酒设宴，为儿子送行。项羽也参加了宴会，可他没心思大吃大喝，应付一下就出来了。

当时已是秋末冬初，雨雪纷飞，士兵们又饿又冷，只有蔬菜拌豆子吃。项羽信步走到军营里去巡视。

只听兵士们边吃边议论，有的说：“咱们连豆子都吃不饱，当官的却大鱼大肉，太不像话。”

有的说：“现在还有山芋豆子吃，过几天怕连这些也没有了，咱们为什么不去救巨鹿？为什么总停在这儿？”

有的说：“听说赵国还是有粮食的，要是打败秦军，大家全有饭吃了。”

项羽听到这儿，走进帐篷，把攻秦救赵的道理又重复讲给兵士们听，兵士们都表示赞成，一致请项羽再去劝劝宋义。

第二天一早，项羽又去见宋义。宋义刚刚起床梳洗，项羽转告了将士们的意见，又说：“咱们出兵时，怀王把所有的兵力都交给咱们了，咱们要

是总停在这儿，不去攻打秦军，赵国亡了，对楚国也没利，这关系到国家安危，望您体贴士兵，以国为重，丢掉私利，还是带兵出发吧！”

宋义哪里肯听，拍着桌子叫道：“你敢不听我的命令吗？我是卿子冠军！”卿子冠军是楚怀王给他的封号，即全军统帅。

项羽早就忍不住一肚子的怨气，他想，这个人做统帅，只会误了国家大事。于是拔出剑来，一剑刺死了宋义，并砍了宋义的头。

他提着宋义的头，出来对将士们说：“宋义私通齐国，背叛楚国，我已奉楚王命令把他杀了，大家不要害怕。”

将士们本来对宋义近日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再看看项羽，满脸的胡须一根根都立起，大吼一声比打雷还响，想起他平时打仗威武勇猛，大家心里都又敬佩又害怕。

有人说：“将军您家世代都是楚国大将，这次又是将军叔侄立的怀王，本该您当统帅，如今您杀死叛徒宋义，应当担任上将军，统领全军！”

项羽说：“这事还得由怀王来定。”

大家说：“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还是您先代理吧！”

项羽同意了。他先派人去杀了宋义的儿子，怕他到了齐国煽动齐国和楚国作对。又派人向楚王汇报情况。

楚王没有办法，只好让项羽当了上将军。

项羽正式当了统帅，就率领全军出击。他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两万人当先锋，自己带大部人马随后。

楚军的先锋部队安全渡过了漳河，来截击他们的秦军也被他们打得大败而逃。

项羽得知先锋部队一切顺利，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漳河边，率兵渡河。到了对岸，他下令把所有的渡船都沉了，又命令士兵做好三天的干粮，带在身上，然后把锅砸了。并烧了渡口周围的草房，对将士们说：“这次救赵灭秦也是决定楚国命运的一仗，如果楚国胜了，秦国就灭亡了，其他诸侯国和广大百姓都得救了。大家一定要拼力向前，只准进，不准退！三天之内一定要消灭秦军，不然我们决不活着回去！你们说，行不行？”

将士们一看，后退没有渡船，前进也只有三天的口粮，不打胜仗是没有生路的，都下了必死的决心，一齐举手高呼：“决战到底，绝不后退！”

这破釜沉舟的做法倒也不是项羽的发明，《孙子兵法》上写着这样一条，“焚舟破釜”。

项羽带着楚军走了半天时间，就赶上了先锋部队。

两员大将告诉项羽，他们已和秦军遭遇几次，虽都打赢了，秦军仍很强大，不可小看。又说秦军运粮队伍很多，如果切断他们的粮草运输，军心就会不稳。

项羽一听，便说：“好吧，你们去截粮，我去救巨鹿。”

便又率军往前急赶。不一会儿，遇到一支秦军阻挡，项羽一马当先，只用长矛一扫，秦军将士就都东倒西歪、抱头逃窜了。

又走了不多时候，已经能看见巨鹿城了。只见城墙上赵国的守军，已经是零零散散、残缺不全了。再看城四周的秦军兵营，密密麻麻，好像围棋盘上的棋子围得密不透风，像铜墙铁壁。因为天色已晚，楚军就驻扎在秦营后边。

第二天一早，项羽仍旧率军拍马向前。

秦将王离听说楚军胆敢出战，就带领一支人马迎敌。在离城一里多地的地方，恰好碰到楚军。他早听说项羽厉害，不敢轻视，急忙布阵迎住。哪知当先打头的就是项羽，还没等他布好阵，项羽就冲了过来。只见他一挥长矛，楚军个个奋勇向前，项羽的长矛上下翻飞，杀得秦军人仰马翻。王

离只招架了几下，便退了下来。

楚军毫不相让，步步进逼。王离一看不好，仗着人多，又返身打了回来，可是打不了几回合，又退了下去。

项羽越打越勇，将士们也越杀越有劲，直杀得山摇地动，昏天黑地。王离进攻了三次，三次都被打退了。秦军死伤无数，伤亡惨重，王离只好退回本营。

章邯听说王离败了，就对部下说：“项羽果然厉害，我们不能大意，得用战术对付他。咱们兵分九路，一路接一路布好阵，我先把他们引进来，然后九路人马一齐上来把他们围住，不愁打不败楚军。他们人少，咱们兵多，这个计策是万无一失的。”于是派九员大将，各领一支队伍布置阵地，自己领一支精兵迎住项羽。

没想到刚一对阵，章邯就招架不住，败退下来。

因为天色晚了，项羽也不去追赶，命令队伍回营休息。到了夜间也不敢松懈，盔甲都不解，头枕着武器睡觉，以防秦军夜袭。秦军白天被杀得七零八落，夜间更不敢出来，于是一夜无事。

第三天早上，天刚拂晓，项羽就让将士们起来，准备好武器，吃饱了饭，然后对他们说：“今天要是不打败秦军，咱们就没饭吃了，不是他们死我们活，就是我们死他们活。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杀敌，争取全胜！”

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抖擞精神，杀向秦营。

章邯昨天败了，心里还在发虚呢，看到楚兵又来，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打。他也鼓励战士们说：“大家别看楚军凶猛，可咱们人多势众，两三个人还打不过他们一个吗？”

可秦军将士这两天都丧了胆，再怎么也说也鼓不起士气了。章邯只管自己领兵迎敌，迎头又碰见项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项羽想起是他杀死了叔父项梁，就恨得咬牙切齿，举起长矛，直刺章邯。章邯挺枪招架，杀将起来。

楚兵们个个英勇非凡，豁出命似的，越打越有劲儿。他们各自为战，不讲阵式，也不讲什么战法，彼此也不照应。原来项羽下了命令，不让他们彼此照顾，只管自己去拼杀。因为敌军强大，一个对一个必然失败，不

鼓励孤胆独战，所以楚兵以一当十，倒吓得秦兵胆战心惊，连旁边观战的看了都害怕。

这些观战的都是从燕国、齐国等各诸侯国来的援军，他们早已到达，共有10多支队伍，因为惧怕秦军，不敢出战，都在巨鹿城下建起营寨，等候时机。今天楚军和秦军交手，他们还不急于出兵，站在各自的寨墙上，向外观望。他们先看到秦军队伍整齐，旗帜鲜明，人马众多，像山像墙，坚不可摧，而楚军服装简单破旧，步伐零乱，不像个队伍，三三五五的，不讲阵式。他们便以为楚败秦胜无疑，更不敢出兵了。可是后来看到楚兵个个勇敢，抢着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冲杀，便一个个目瞪口呆，吓得直打哆嗦。

项羽的那支长矛更是所向无敌，他骑着乌骓马，冲到哪儿，哪儿就倒下一大片，他像飞一样地追赶着秦兵，吓得秦兵争先恐后乱跑乱窜，冲乱了自己的队伍。

章邯本来还想佯装撤退，诱敌深入，现在已不可能了，自己的队伍一乱，接应的队伍也无法接应了。章邯急忙退到后面，下令各部人马向前冲杀。可是秦军前进一步，却退回来两步，再命向前，秦军进两步却退回来四步。就这样，章邯下了五次总攻的命令，秦军五次都退了回来，到最后全军都溃散不成队伍了。

楚军看到秦军人多，反而士气越壮，喊杀声，格斗声，像山呼海啸一样震天动地。秦军再也抵挡不住，哗啦啦如潮水退了下来，章邯领兵退回城南大营，关上营门，不敢再战。

从项羽领兵到巨鹿城下，秦楚已经先后大战九次，九次秦军都失败了，他们已经没有一点儿再战的勇气了。

项羽一看秦军躲进了大营，他想，章邯是秦军中最强大的，对于连战几天的楚军不宜再挑硬仗打，还是先易后难。那王离也是一员大将，带着30万兵马，杀了他也就告捷了。便向着城东的王离大营杀来，一边派人堵住甬道，以防章邯带兵支援，自己率军冲进大营。

王离军队已和楚军交过锋，深知楚军厉害，也不敢抵抗，营门立即被项羽冲破了。王离骑着马正想夺路逃

台独之路行不通

宝岛诗旅评读散记

○郝桂林

年内风闻海峡彼岸“台独”势力抬头，有人居然打出什么“台湾共和国”名号，甚至妄图挤入联合国，把本来已经出现了祥和之兆的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一时出现再行扯开之逆势，据说台湾当局也有人羞羞答答的暗里应和，似已忘却5千年来的中华深情，更不把思和、思统一若渴的台湾人民心声放到心上，实为罪恶邪念，必然行不通。

若干年来，我沿着华夏文化的辉煌古道，阅读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历史文化和各个时期的诗歌。中华是诗国，民心如诗海，从诗中就可看出人民的心声。一部中华民族史，也是两岸人民共同创造的一部诗史。自古以来海峡两岸同胞一直随意你来我往，唐代诗人施肩吾就曾写过《题澎湖屿》等诗篇。明末诗人沈兴文，曾隐居台湾宝岛40年之多，写诗、著文，被后世公认为台湾文祖；郑成功文武全才，在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台湾之后，立即实施收复台湾，而这一壮举立即得到了台湾人民的欢迎，大军所到之处，“壶浆迎者塞道”。1662年1月25日终于攻克了台湾城，并和台湾军民一起军垦屯田，他在他的复台诗中高兴地写道：

开辟荆榛函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他的部众徐孚远、王忠孝也都在这里留下了诗篇。

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之后，台湾在统一的民族大家庭里得到了各方面的发展，大陆籍孙元衡、梁启超等都曾到台湾来作官、宦游，很多人又留下了许多诗歌。同时一批台湾人士也在这些人的培养下成了学者，象作为清末进士的台湾苗栗人丘逢田就曾出了许多诗集，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屈辱投降割让了台湾，诗人虽曾率众抵抗，但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他的诗篇《春愁》就抒发了盼望收复台湾，祖国统一的思想感情：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和丘逢甲几乎同时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也用诗歌抒发了同样的感情，他的《台南》写有：

四百万人同一呼，
去年今日割台湾。

卅载弟兄犹异至，
一家儿女各地方。
夜深细共荆妻语，
青史青山尚未忘。

连横先生不仅写诗书愤，而且还著了一部《台湾通史》，以大量事实证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两岸统一才是完整的中华。他又将思盼统一之志写入《闻歌》等诗作中：

满腔热血半消磨，
壮志犹存夜枕戈。

如此江山如此月，
倚栏无赖独闻歌。
台湾人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日本侵略，不少台湾留日学生，也曾致力提高台湾民众的觉悟，推动民族解放运动，也写了许多诗歌。如：

流落他乡几度秋，
西风医馆动新愁。

床床日夜心驰处，
唯是中华四百州。

生，迎面碰上项羽，只好举枪来刺，项羽举矛一挡，“铛”的一声，震得他虎口发麻。项羽再用长矛一拨，那王离手中的枪就被磕飞了出去，王离一看武器没了，转身要跑，乌骓马往前一纵身，贴住了王离的坐骑，项羽伸出胳膊就把王离从马背上夹了过来，往地上一扔，楚兵跑过来，把王离捆了个结结实实。

秦军一看主将被活捉，都四散奔逃，有的人被杀死了，有的被捉住了，也有的逃跑了。城南的章邯一看，死守营寨也将守不住，不如赶紧逃跑。就带领军队，向南退去。一直退过漳河，退到一个叫棘原的地方，防守起来。

王离手下还有一员大将，看到王离被捉，军队溃散，知道出去也没什么活路，就点起一把火，把营盘烧了，自己也被烧死在里面。

项羽知道将士们连日征杀，都很疲惫，看见章邯逃走也不去追，只恨恨地说：“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叔父的仇是一定要报的！”就带兵回营休息去了。

等到秦军营烧成了一片焦土，章邯等秦军逃跑后，各诸侯国的援军才慢慢定下心来，想起应当去拜见项羽，要求共同打章邯。于是派人去请示项羽，项羽说：“嘻，你们到现在才想起来见我吗？”便让他们到楚营来。

他们陆陆续续来到了楚营，到了

辕门（古时候把战车排列起来，车辕对着车辕，排成大门的样子，所以叫辕门，是大将营帐的入口），就瞧见一颗人头挂在高处，那正是把他们吓得魂散的秦将王离的头。而且还不断有楚兵楚将提着秦军大将的头进来，吓得他们两腿一软，全都跪在了地上。更想马上去见项羽，可站又站不起来，只好用膝盖走路，跪爬着进了大帐。到了项羽座前，谁都不敢抬头向上看，只是伏在地上，依次报出自己的姓名。

项羽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们，故意停了好一会儿，才让他们起来坐下，可他们还是跪着不敢起来，当中有个胆大的，抬起头来，伸一伸脖子，

再如：

未能敌忾赴同仇， 人正欢呼我恸哭，
梦告何如醉死休。 腥风催泪樵神州。

爱国，盼统一之情，使他们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战，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东京的留学生们竟然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街庆祝国庆，一些人陆续返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为台湾海峡两岸统一而努力，一位归国留学生这样写道：

未出娘胎已卖身， 老来狂喜红旗下，
半生漂泊作流民。 高唱东风祖国春。

台湾人民的这种热爱祖国，渴望统一的心情，被代代承袭，从不间断，并越来越浓烈，早在五十年代初，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曾这样以诗明志：

重阳今又到， 风雨一杯酒，
怀旧复登临， 江山万里心。

“万里”者，两岸也。几年以后的一九五八年老人家又写道：

破碎山河容再造，中山陵树年年老，
凋零师及记同游，游墓于郎已白头。

一九六二年他写的那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呢？”“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更是催人泪下！此类诗歌以后更多，一位台湾诗人又写道：

“ 悲莫悲兮，国分离，
国分烈兮，潸然落泪
盼统一兮，不知何期，
抛弃个人乐利兮，
为中国的统一与富强而努力。”

还有一位急得不得了地写道：

“……

但愿上帝发慈悲， 早统一兮可还乡，
祖国河山早统一。 亲情骨肉庆团聚。”

数年前一个台湾中学生曾以《水》为题写出了新一代对台湾海峡两岸统一的渴望：

家父名叫金水， 大陆上有白山黑水，
我家住台北淡水， 有名山胜水，
故乡有水， 台湾大陆只隔一水，
母校亦有水…… 黄帝子孙血浓于水。

一位台湾同胞在大陆探亲时，大笔一挥写下了“祖国统一万岁”的“无韵诗”。

写到这里不由得又想到那个令人感到芒刺在背的“台独”——不，“台毒”，真不知他长着的是怎样一颗心？他们敢看这些代复一代的诗人的眼睛吗？他们敢看作者的那一簇簇、一丛丛的火红的赤子心吗？听听台湾人民是怎样评价这些“活宝”们的吧：

台独之路行不通， 全民唾弃
分裂国土是迷梦， 国法不容……
台独要引狼入室， 要把台独一扫空
台独要制造暴动，

这首发表在台湾《太阳报》上的《台独迷梦》才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前些时候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统一大家谈》有奖征文，仅台湾来稿就有100多篇，著名的陈立夫、雷渝齐、王晓波、陈大络、李光裕和东仁等等都在来稿中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批评台湾当局设置障碍，阻碍祖国统一进程的前途之举，陈立夫先生等还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态度何等鲜明？路透社台北8月8日电又通报：去年，台湾居民平均一天与中国大陆通电话1万5千人次，这个数字又说明什么呢？再看看今年中秋节中央电视台与台湾等电视台共同合作播出的《神州一片月》吧！在这种情况下想搞“台独”，不是既不合民心，又不合国法吗？“台独”之路是绝路，“台毒”之害必自毙！这就是时代的结论。

咽了口唾沫说：“上将军真是神威，从古到今没第二个，这样的英雄当然是我们大家的统帅，我们情愿听您的指挥。”

其他人也连忙齐声附和：“情愿听上将军指挥。”

项羽也不和他们客套，率直地说：“承蒙各位的看重和推举，我就不推辞了。只愿咱们同心协力，共同灭秦。今天请各位暂时回营，以后有事，再请过来商量。”

诸侯国的将领们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才都站起来，各自回去了。

这时赵王和赵国丞相也来到楚营，向项羽表示感谢。

项羽对他们很客气，亲自迎出帐外，又让到里面分左右坐下，赵王说：“幸亏将军赶来，不然赵国军民都要

遭殃了。也是将军神力，才破了秦军，我们在城上都看见了。”

项羽说：“您不必客气，我们解救赵国危难，也是在解救自己。不打败秦军，诸侯各国都不得生存，所以我军将士都拼命杀敌。现在王离已死，章邯躲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赵国丞相张耳表示要整顿一下赵国军队，然后来协助项羽去打章邯。

赵王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才回去了。

项羽命令军队休整几天，把截获秦军的粮草补充足了，就通知各诸侯国军队，陆续渡过漳河，准备攻打章邯。

章邯自从巨鹿大败后，还剩下20万人马，这时守在棘原城，不敢随便

出战，只是向秦王朝请求救兵。

项羽渡过漳河，就把军队驻扎在南岸。几天前渡过漳河是为了打章邯，如今渡回南岸还是为了打章邯。可这一去一回情形大不相同。去时楚军只有几万人，缺兵少粮，如今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加上各路诸侯的军队，项羽已统领了三、四十万人马，在当时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了。

巨鹿之战摧毁了秦军主力，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也确立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地位，使这位英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有声有色的话剧。





台湾姑娘凌蕙蕙一跃成为“台湾小姐”和世界佳乐小姐第五名，从此，生活向她打开一扇五彩缤纷的门，可是，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时间的流水洗涤一切。一年前轰动全国、世人瞩目的北京亚运会那龙腾虎跃、热气朝天的场景，在我大脑记忆的“屏幕”上已日渐淡忘。但有一组镜头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而且，因周围场景环境的淡化变得愈来愈突出，愈来愈强烈。那是日本和台湾女子篮球队的一场比赛。就球技和身体素质说，日本娘子军水平似乎比台湾姑娘略胜一筹，但是台湾姑娘以及看台上的台湾啦啦队队员们却不甘落后，大有一种非胜不可的架势。特别是那些高高矮矮老老少少的啦啦队员，在一位身上佩着红绸带，身材修长面目秀美的姑娘的指挥下，拼足劲儿，挥拳蹬脚，齐声高呼：

“台北队，加油！加油！”

汗水从他们面颊上滚下来，喉咙喊哑了，手臂挥酸了，脚蹬疼了……

仍然一个劲地喊！喊！这种疯狂的激动，这种似火的热情，不仅感动赛场上的台湾女将，也深深感染了大陆观众。

血浓于水，人们合着啦啦队长的口令齐声欢喊：

“台北队姑娘们加油！加油！”

奇迹出现了，看来弱小的台湾姑娘愈拼愈狠，越打越勇，终于战胜强大的日本队。

人们跳跃欢呼。

泪水溢出啦啦队队长的眼眶。

事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这位台湾赴亚运会啦啦队总队队长。北京的报纸上，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以及其它一些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照片，报导了有关她的消息，有的刊物还将她的大幅照片作了封面。

这位漂亮引人瞩目的啦啦队队长，就是荣获1988年台湾“中国小姐”的冠军，和同年，又获世界佳乐小姐第五名的台湾画家，被台湾新闻文艺界称为“才女”的、我的表妹凌蕙蕙。

蕙蕙是我姨妈最小的女儿。1963年出生于台湾，以前，我只知道有这

到这次她来大陆才得以解开。

不错，就是她——凌蕙蕙，我的小表妹。她生于60年代，那时，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何况我姨父收入微薄，姨妈没有正式工作，拖着五个子女，日子可想而知。蕙蕙六岁时姨父病逝，生活更艰难了。我姨妈写得一手好字，是位坚强的女性，她毅然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以卖书画为生。对蕙蕙她要求很严，除了上学轻易不许出去。家门、校门两点一线循规蹈矩，这就是青少年时代的蕙蕙。蕙蕙在家里除做功课，业余时间就是画画练习书法。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她20出头。

“表哥说了你不信，”蕙蕙笑着对我说，“以前，我没有什么朋友，很少与外人交往，而且来了电话也由妈妈先接听。”

那时，她的世界就是在家这一方小天地，她想象不出外面那更广阔、更迷人、更神奇的世界是个什么

“台湾小姐”

凌蕙蕙的人生变奏

○张士敏

么个小表妹。她是美还是丑，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却一概不知。1989年，海外家人来信，说她美压群芳，获得1988年台湾小姐冠军，我将信将疑。在我的概念中，所谓“台湾小姐”、“香港小姐”不外乎选美。台湾人口虽远比不上大陆，但也4000多万，漂亮姑娘何止万千。而我们的家族中，无论父系还是母系，所有女姓都相貌平平，未有出类拔萃之辈。这小丫头是个啥特殊的？再说，评选者，外表长相上电子秤。我姨夫是个小职员，早在十几年前就故去了。蕙蕙一无关系、二无背景，是个道道地地的平头百姓，台湾小姐的桂冠、世界佳乐小姐的荣誉怎能轮上她？

几年来我一直存着这个疑窦。直

样。

“那你怎么想到参加台湾小姐的评选？”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电视起的作用。”蕙蕙说，“电视是我与外界社会接触的最好的媒介。1988年年初的一天从电视上看到恢复评选台湾小姐的消息，平静的心不平静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每年都要评选本国的最佳小姐，譬如香港每年都搞，台湾在五、六十年也曾搞过，不知怎么1966年停了。一停就是十几年。这消息在台湾各界，尤其是女孩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跃跃欲试。我想何不试试呢。”

“评选台湾小姐有无规定？”

“当然有。首先要未婚，年龄25周岁以内，当时我正好25岁，机不可

失。我决定报名应试。”

“对你来说这很不容易。”我说，“可以说这是勇敢的决定性的一步。”“确实如此。现在看来这是个英明正确同时也是果断的决定。它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时姨妈赞同吗？”

“妈妈既惊异又担心。”

“惊异可以想象，”我说，“担心又为什么呢？”

“你知道台湾社会很复杂，特别是对女孩子。妈妈担心我上当受骗，担心我变坏。”

“这可以理解。”

“我说社会是复杂的，但中国有句古语：出污泥而不染。好与坏，关键在自己。不求上进，成天呆在家里也没用。”

母亲被说服了，但哥哥姐姐们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不谙世事，见了生人脸还红的小妹不过是只“丑小鸭”，而台湾小姐好似美丽的天鹅，“丑小鸭”变“白天鹅”那是异想天开。

“你们等着瞧吧。”蕙蕙含笑并充满自信地说。

角逐是激烈的。由于停办多年，加上高额奖金，一举成名，姑娘们趋之若鹜。先是初选，从众多报名者中筛选出一批人参加初试，逐个面试后，从中挑出二、三十人，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举办专门的培训班，训练礼仪交际谈吐举止再上电视亮相，征求观众意见，就这样一道道，过关斩将，蕙蕙终于荣获台湾小姐的桂冠。

“这么说这些姑娘中你最漂亮了？”我问蕙蕙。

“不，我不算最漂亮，应试者中比我漂亮的大有人在。”蕙蕙如实地告诉我。

“那怎么会选中你呢？”蕙蕙的回答使我大出意外。

“你以为选台湾小姐仅仅是挑选面孔漂亮吗？”

“当然，”我说，“那不就是选美吗？”

“是选美，”蕙蕙说，“可这个美的含意是多方面的，外表长相，才能、艺术素养、风度气质都作为评分内容。”

既注重外表美，也要内在美，原来如此！

蕙蕙的才艺是出类拔萃的，她从小酷爱艺术。中学毕业后考取台湾华

罔艺术专科学校国剧(京剧)班。京剧是她的专长。与此同时还学习芭蕾舞和音乐。她喜欢弹古筝，并在一业余乐团中担任古筝演奏员。蕙蕙从小还跟随母亲练习书法。后来又学习国画。1984年拜台湾国画大师工笔名家喻仲林先生为师，学习工笔画。1985年至1987年又先后追师周以鸿、陈张弘等画坛名家，学习工笔及写意。她天资聪颖，虚心好学，在老师的指导栽培下，不多几年，所学双勾设色画鸟，便具有一定水平和特色。她先在台湾然后又去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获得好评。这次又乘参加亚运会的机会，分别在北京昆仑饭店和上海华亭宾馆举办个人画展。程思远、廖静文、黄青、陈沂、程十发等许多文艺界著名人士出席。有剪影、有题辞。人们想不到一位年轻美丽的台湾小姐竟有如此艺术才华和素养，纷纷给以真诚的赞扬和祝贺。

中国古代所谓“琴、棋、书、画”蕙蕙几乎都会，如此才艺应试，女孩子中无以匹敌。

为此台湾报纸称她为“中华才

女”。

出众的才艺加上天生丽质，评选中夺魁理所当然。

荣获台湾小姐桂冠后，紧接着蕙蕙又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由55个国家和地区(各国第一名为当然候选人)参加的佳乐小姐评选，荣获第五名。

蕙蕙成功了。她走出自我小天地，来到大世界，从一名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孩儿一跃成为明星。报纸刊登她的专访特写和照片，电台、电视台也争相采访和报导她。她成了青年人特别是姑娘们学习崇拜的偶像。1988年9月，台湾华视艺人组成华夏访问团奔赴美国、加拿大等国访问，她被特邀参加。为了支持亚运会，观摩亚运会盛况同时给参加比赛的台北队助威，台湾各界人士自发组成啦啦队。大家一致推选年轻的蕙蕙为啦啦队总队长。于是，便有了那难忘的一幕。

成功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一个姑娘一旦美名加身荣膺台湾小姐的桂冠，就成为各方人士追逐的



对象。有的嫁给阔佬阔少，终日游玩享乐，无所事事。有的被捧昏了头，虚荣心徒增，不愿再作原来一月只赚一、二万薪水的苦差事，便利用美貌和台湾小姐的资本，去做广告明星；更有的抵不住金钱和色情的诱惑，成为某些黑心片商赚钱的工具，下海拍A片（色情片），其下场就不用说了。

远的不谈，说最新的。不久前从《新民晚报》港台消息专版上读到一则新闻：据台湾报纸报导，刚刚夺得1991年台湾“中国小姐”后冠的卢淑芳小姐，在即将出发赴伦敦角逐世界小姐的前夕，因“涉足不良场所”，卷入绯闻案。为维护台湾小姐的荣誉，目前被台湾选美协会取消头衔，并要将所得奖金全数追回。本届“中姐”则由亚军接任。

好容易获得成功的一颗新星，刚刚放射出绚丽异彩，便昙花一现，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蕙蕙同样面临诸多考验。

追求她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富商大贾，讲定只要能成婚，保证她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少投资公司来请她，有的赋予业务经理头衔，有的委以公关经理美名，条件诱人，待遇优厚。至于请她拍电视片广告片的那就更多了。不用说，全都是报酬丰厚。对此，蕙蕙全都婉言谢绝。

台湾是个财神至尊，金钱高于一切的社会。对这些广进财源的事儿不感兴趣，那么她对什么感兴趣呢？

她钟情的是绘画，是她心中的艺术之神。

她曾深沉地对我说过：“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外表美是短暂的，迟早要凋谢消逝，至于台湾小姐美名更是空的，只有艺术是永恒的。我要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充实自己。”

为了屏弃干扰，摆脱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和不速之客，她每天清晨走出家门到一个临时租借的小房子里潜心作画。绘画和所有脑力劳动一样，不仅寂寞也很艰苦。就这样蕙蕙每天伏于画案，画呀、画呀，为了节约时间……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买一只快餐饭盒充饥。

许多人理解蕙蕙，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不懂生活，不会享受，还

有人劝她：“画画多苦呀，熬到成名不知要到哪一天呢，傻妹，趁着年轻貌美找个舒服挣大钱的活儿。”

蕙蕙含笑不语——这个问题她早已回答过了。

她回弃金钱，屏弃灯红酒绿衣香鬓影和各种各样的诱惑，手执画笔，口嚼冷饭盒，执著地默默地锲而不舍地画呀、画呀……

一位哲人说：人生最可贵的是追求，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本身。蕙蕙并没有太多的想结果，更没有想一步登天，成为大画家，只是用她那颗年轻诚实的心，真诚地追求。追求美，追求自我价值，追求人生的充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功夫不负苦心人，她获得丰盛的硕果。

前几年艰苦劳动不算，在亚运会结束后回台湾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就作了大大小小数十幅画。其中有人物山水，有工笔花鸟。技法水平比以前有更进一步的提高。为了走向世界听取同行前辈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1991年10月2日她在泰国举办了个人画展。曼谷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给予赞扬和肯定，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才貌双全”的“中华才女”。嗣后她又在著名的台北华视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马树礼，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凌嵩郎，台湾“侨务委员会会长”曾广顺以及孔夫子嫡系子孙著名学者孔德成先生等一批台湾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以及画家艺术家，有的前往观看，有的为画展题辞，有的写序言，有的写介绍。一些台湾报纸用整版篇幅和特大号标题对她进行评介。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赞美这位画坛新秀，赞美这位有着高尚理想并为之执著追求的台湾小姐。正如《大明报》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多少次受众人羡慕的眼光，身处五彩缤纷的交际圈里，凌蕙蕙竟然能执意拿着彩笔，在偌大的画纸上挥洒出不平凡的境界。这样专注于内在修养的中国小姐也许应该是众多‘花瓶’学习的对象”。该报还指出：“凌蕙蕙画出的不是普通画”而是“中姐典范”。明年二三月她还可能应邀到新加坡和

南非举办画展。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绘画，了解中国文化。

蕙蕙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环境里抵住形形色色金钱物欲的诱惑，洁身自爱，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取得成就，一方面是从小严格的家教，使她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更主要是她对中华文化的执著热爱，是中华文化对她熏陶和教育的结果。

文化素养决定人的素质。

古老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厚的人生哲理，引导和诱发人性美。

台湾是个崇洋的社会，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听的、看的几乎都是洋货，有些人确乎到了“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的地步。蕙蕙并不排外，她认为外国确实有许多好的先进的东西，特别是他们现代科学技术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蕙蕙也用洋货，譬如日本电器、巴黎时装、法国香水和化妆品她都喜欢。有时她也听摇滚乐跳迪斯科。但她认为这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可以将外国的好东西拿来为己所用，但不能因为喜爱和使用这些产品就数典忘祖，忘了自己是炎黄子孙。在生活中一个人必须自爱自尊，才会获得别人的尊敬。一个民族同样如此，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灿烂最古老的民族，创造了光辉的中华文化，这是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否定和代替不了的。我们不仅不能自卑而且应该引以自豪。事实上，她在海外与友人的交往中，已深切体会到外国人最欣赏最看重我们的，是那些最富民族特色、乡土味最浓的作品。她着迷似的潜心学习国画，弹奏古筝，演唱京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有了这些，尽管她身穿新潮巴黎时装，脚蹬意大利皮鞋，跻身在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情调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佳乐小姐评选会场上，人们仍旧认为她是真正的中国小姐。她画的国画，她弹奏的古筝，她演唱的京剧，都受到外国朋友的喝彩。地道的中国味，在一位美丽妙龄，具有现代意识的台湾小姐身上充分展现，人们不能不赞叹古老中华文化的恢宏深邃及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张蕾〕



漫画家的非漫画之路

——访台湾漫画家蔡志忠

◎陈斌

高高的鼻子、厚厚的嘴唇、清瘦的面庞、透露着聪颖的目光、和那使人过目不忘的垂肩长发，普通话虽很不标准，却以那坦率的应答，略带腼腆的表情和轻柔的语调，使人感到他很随和亲切。这就是台湾漫画家给我的第一印象。

“一生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画漫画”

1948年生于台湾漳化的蔡志忠，从小不仅喜欢看漫画书，还喜欢自己编故事，自己画。15岁那年，他觉得自己“画得和那些已出版的书的水平很接近”了，他试探着将所画的几幅画向出版社投稿。没想到出版社很快回

信，称其画得很好，邀其到社里上班，专司漫画。“我在七八岁时就做了人生计划，一生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画漫画。”学业未成的少年蔡志忠，经不住自己喜爱的事业的诱惑，告别父母欣然只身前往台北赴职，揭开了实现人生计划的序幕。

他在台北一画就是五年。主要是武侠连环漫画。应征入伍三年中，并未中辍对艺术的追求，自修了大学中的多门艺术课：色彩学、设计法、中国和西洋美术史等。后来又战胜三十几个大专毕业的美术高手，破例被一家视听节目服务社录用，充任电视美术指导。进而自开“卡通”公司，既为经营者，又是动画片的主要绘制人。

几年后他又毅然关闭了卡通公

司，作为自由撰稿人，潜心投入漫画创作。1983年起，他的作品不断出现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日本的报刊上。1985年4月，他赴日本商谈出版事宜，闲暇中读完了随身带的一本《庄子》，发现“书中讲的和自己的言行很相象”，庄子的许多观点与自己的想法十分接近，不禁萌发用漫画将庄子深邃的思想“轻松愉悦而又不失诚敬地表现出来”的欲望。他立刻动笔画起来，一个月就把草稿全部画好。此行生意商谈无果，倒带回一部《庄子说》漫画手稿。一出版就产生轰动效应，短短数月再版12次，并荣登“文学类”畅销书宝座。蔡志忠深感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漫画形式，形象生动地注释经典大籍，传播先圣哲人思想之精髓，实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程。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老子说》、《孔子说》、《孟子说》、《列子说》、《韩非子》、《禅说》、《六祖坛经》、《史记》等26种古籍漫画纷纷面世。

“漫画是一种语言，
凡是我看到的，
都愿用漫画反映出来”

20多年来，蔡志忠已出版了300余种漫画书。少年时经常一边听课，一边在课本空白处画漫画。一本课本找不出一页“干净”处。长大后，自我规定早饭前午睡后、洗澡前、洗澡后都各画几种。最多时一天画80幅草稿。经常同时画五六本。他通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有时一天仅吃一顿饭，睡两三个小时觉。生活环境造成他生活节奏很快。

关于漫画，他说，我并不认为漫画是讽刺幽默，而认为它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手段。一个人看得很多，想得很多，感触很多，必然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为此，三毛可以写散文，李扬可以写小说，演讲家可以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而我却是用漫画表达我心里要说的话。

他又说蚕吐什么丝，要看它吃的是什么桑叶。我这只蚕叫作漫画家的蚕，我看的书很杂，什么都爱看，因而我“吐”的漫画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广大读者熟知的反映老子、庄子等古代哲人思想的漫画外，还有以人物为主

角的《光头神探》、《大醉侠》；以动物为主角的《可爱的动物人》；有表现古典文学名著的《西游记》、《三国志》；有介绍异地风光的《北京行脚》、《日本行脚》；就连相对论和台湾众多的棒球队，也成了蔡志忠漫画表现的对象。凡是看到的，吸收的，都用漫画反映出来了。

“画这些书的目的是要简化古书”

观蔡志忠的中国古籍漫画堪称一绝。溶经典文化于世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之中，用畅快潇洒的画面使前贤圣哲的严肃说教变得幽默风趣、易于领会。那一幅幅清晰夸张的画像，一个个丑而充满灵气的人物，那么工整而不写实的风格，独特的象征性语言，使读者在惬意的欣赏中，领悟华夏先贤们的慧心、哲理。在他的

笔下，老庄哲学、孔孟之道、禅理、《中庸》、《大学》等，都变成了童叟可读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在《庄子说》中那光头神探居然穿上了古装扮演庄周，画中的大人物身体大，小人物身体小，十分有趣。在《六祖坛经》中，其人物活活泼泼、高高兴兴、实实在在、轰轰烈烈，使人仿佛看到禅师的重现。在《孔子说》中，孔子高兴了就唱歌，生气了就发怒，伤心了就痛哭，看不顺眼时也会骂人，有时也会开开玩笑。他是人，不是神，做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尤有意味的是，画家还不时让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出现在久远的古代人身上，使人感到传统有了一种崭新的价值与意义。画中人物和情境线条简练而富象征神韵，处处洋溢着哲理情趣，读来使人如亲闻古代智者的低语。

蔡志忠说，当年台湾出版界新出的书“上焉者是用不同的方式鼓励竞争，助者火拚，下焉者则绘声绘影，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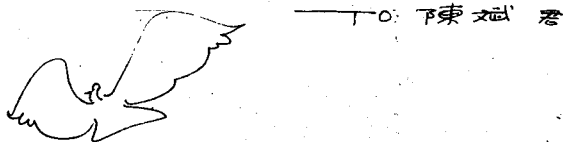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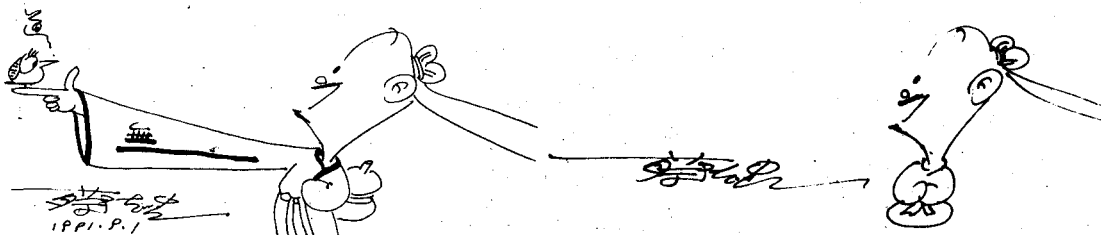
诱人沉迷堕落，海淫海盗助者犯罪。”但他不随浊流，独辟蹊径，确实可贵可敬。却又淡然置之地说，“画这些书的目的”是要简化古书，写其中的“意”。

“爸爸写的字对我产生影响”

人问蔡志忠之成就，是否得益于家庭影响。他说，我出生于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乡民代表会的秘书，在全乡书法最好，乡公所和国民小学门前标牌上的字均出自他的手。村里人操办红白喜事和写寿联都来找他，他一律免费服务。

他深情地说：“我从小就接触爸爸写的字，如果我画画和某种遗传基因有关，那就是我爸爸写的字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蔡家上溯几代也没有一个与艺术有关系的人。但是“我的求知欲很强，什么事都想知

請多看看... 哈哈... 一口



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地球?为什么会有太阳系?……”因此他认真对待学业,广读各类书籍。更感谢父母“无为而治”、“放马吃草”的教养方式。这使他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早早养成了独立的个性,为其独特的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做什么事都做到能力的极至”

仅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蔡志忠,其卓著成果从何而来?他自己答以两个字:“喜欢。”又解释道:“我通常喜欢一件事,就把它做‘尽’做‘绝’,做到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程度,这样我就会无憾。这个习惯是很小就养成的。我喜欢看漫画,就喜欢看很热烈。我喜欢看电影,就喜欢看不得了,几乎把想看的电影都看过了。喜欢听唱片,就听遍所有爱听的唱片。我很容易入迷,只要是我喜欢的。相反,我不喜欢的,就不关心它,从来不理它。”

他的成功哲学就是“选其所喜全力以赴”。“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我的能力的最极至!”凭着这样执著地追求“极至”,他不仅在漫画领域独树一帜,在他涉足的其它领域也有不凡业绩。他开办卡通公司时拍摄的《老夫子》第一集,获最佳卡通影片金马奖。他热衷桥牌,因而先后29次获桥牌锦标赛“双人赛南北组冠军”,今年又获北美洲桥牌大赛第3名。他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信条:“这个社会并不迷信学历,只要有实力,便不会被埋没!”

“充分品尝生活的每一刻”

蔡志忠对待人生自有见解:“我是活在现在的人。通常许多人没有活在现在。”他拿出一支画笔指着说,“假如这是时间”,指着笔杆中点,“这是现在”,指中点后一段,“这是未来”,指中点前一段,“这是过去”。“往往不是过去,就是未来,现在只是一瞬间。”他认为,一般人常想用现在的刻苦去换取将来的不刻苦,如本以为求学是苦的,但为了日后的获益,也



“我不辛苦,排队等候签名的读者才辛苦”

就求学;本以为工作是苦的,但为了将来能获得更高职位,也就去工作;而这种“活在将来”而没有“活在现在”其实是错的。因为这会导致“没有机会上学读书时,才感到大学生活是好的,到退休时,才感到工作是愉快的,到临死那一刻,才感到生活是美好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读大学时享受读大学,在工作时享受工作,在生时享受生,而要认为它们是苦呢?”

他说:“我活在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当下,就充分享受那每一刹那,每一当下。在被采访时,我就享受被采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被采访。在有千百人要求签名时,虽然很恼,我也会享受签名。因为不是每个人,就是我自己也不是时常有机会面对千百人要求签名。清闲时,我就享受清闲,因为不是时时刻刻都得以清闲。”他又指着面前的咖啡说:“在喝咖啡时,我就享受喝咖啡,因为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喝咖啡的欲望,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咖啡喝。所以,充分地、实实在在地品尝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每一当下,这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作为曾获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蔡志忠,与大陆读者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中国古籍漫画系列在大陆累计印行700多万册,在众多图书品种订数萎缩时,它成了佼佼者。1989年3月,他的书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首次发行时,读者排起“长龙”。当天就销出2900余册。一股“蔡旋风”愈刮愈烈。199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书市上,准备的8000套蔡志忠漫画,4天内抢购一空。今年仅在第四届全国书市上,他的作品就又发行了1万套,共23万册,并被评为书市的十大畅销书之一。难怪出版界人士戏言:三联书店这两年靠“卖菜(蔡)”发起来了。

蔡志忠说:“只有当读者喜爱你的书时,你才真正完成了创作。”面对广大炎黄儿女对其作品的喜爱,蔡志忠同样奉献给读者一片爱心。他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为读者签名售书时,不是草草签一个名字完事,而是同时为读者画一幅小画,或书中

的人物,或作者的自画像,不厌其烦。他的签名售书,不是10分钟、20分钟就结束,而是只要有读者就一直签下去,往往一签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接受签名者1天多达近千人。我问蔡志忠,“你这样签名不是太辛苦了吗?”他说,“我不辛苦,排队等候签名的读者才辛苦。他们在外面排队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还说,为资助内地的出版事业,蔡志忠将版税留存三联书店,以无息形式作为“三联”的周转资金。

笔者问及蔡先生对其作品在大陆深受欢迎的感觉。他说,我早就预料到我的书在大陆肯定会受欢迎。三联书店要出这套书时,我就想,大陆读者和台湾读者同样背负5000年的文化传统,这套书在台湾畅销,在大陆也会畅销,但是畅销和受欢迎到如此程度,却是我没想象到的。其盛况还超过了台湾。不过蔡志忠没有自鸣得意,而将此归结为大陆读者受到来自书以外的其它方面的诱惑少于台湾读者。书在大陆发行后,蔡志忠陆续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几乎每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感谢我画了这么好的书,这使我很感动。信中也有抱怨买不到书的,使我又觉得很惭愧。”



“我相信有一天, 任何国家、任何语言 都会有这套书”

蔡志忠在台湾有“百万漫画家”之称。台湾每卖9本书,就有1本是蔡志忠的,每卖4本漫画书,就有3本是蔡志忠的。其作品在台湾累计已发行了五六百万册,仅《庄子说》、《老子说》、《西游记》、《三国志》等几种就超过100万册。市面上有70多种蔡志忠的作品同时在出售。

“现在我的书在全世界的发行量估计不会低于3000万册。”他说。除海峡两岸外,他的漫画作品近几年还风靡香港、新加坡、泰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而

且均是由日本讲谈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等一类本国最大的、一流出版社出版。苏联、捷克、匈牙利、西班牙、法国等许多国家也分别与蔡志忠就出版其作品签约。如今,世界上每天至少有15部机器在印制蔡志忠的作品。

蔡志忠的漫画产生如此世界性的轰动效应使亿万读者“走入中国古典宝藏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对此他自信地说:“我相信有一天,这一天不会很久,不会过50年,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语言都会有这套书。这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用漫画所表现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等中华圣贤哲人。”

蔡志忠成功了,他的古籍漫画已“成为读者迈入经典大门的一把钥匙”。但蔡志忠永远不满足他的成功,当三联书店正在赶印、即将推出他的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幽默漫画系列》时,当其作品的覆盖率愈来愈接近作者的预言时,他又把视角转向一个新的领域:研究植物园艺学、用电视、图书、录像带、录音带等多种系统形式介绍植物知识和园艺技术。为此,他一头又扎进了植物世界之中。我们拭目以待,等着他的再次成功。

①1991年2月,蔡志忠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为购画其作品的读者签字作画。

陈斌摄

②1991年9月,蔡志忠在广州第四届全国书市上为读者签名售书。

陈斌摄

③蔡志忠先生近照

陈斌摄

④蔡志忠先生和本文作者合影。

⑤、⑥蔡志忠签名作画的庄子像。

⑦蔡志忠先生的赠言作画。

⑧蔡志忠给本文作者的自画像。



一对姐妹花 两棵浮萍草

——严凤英和她的妹妹

○林青



严凤英“再生”， 胞妹不姓严

1978年5月，严凤英逝世十周年。这天清晨，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大院里，飘扬着如泣如诉的由著名画家赖少其作词、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作曲、特为悼念严凤英而作的《落花曲》：“十年落花无数，何来锦囊，亦无埋花处。花在泪中难为土，举起招魂幡，犹有伤心处。春满江淮花起舞，燕子已归来，君子九天碧落处。”

挽联、挽幛、花圈和鲜花丛中，悬挂着严凤英生前的巨幅照片，那妩媚

的双眼，那纯真的微笑……使人们不由得驻足仰目，凝视不舍。

简短的平反昭雪书读完后，人们依次向遗像行礼后，又向逝者亲属慰问致意……。当我握住一双手，透过泪眼看对方时，不由一惊，这不是严凤英吗？我赶紧擦去泪水，仔细看去——“霞霞（谢谢）！”竟是一口吴侬软语！正在我发愣的时候，那双酷似严凤英的手，又向我后面的人伸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严凤英的妹妹——赵国珍。

尽管我和严凤英同在一个剧团，同台演过戏，同住一个大院，一座楼房直到她去世，算得上是她较好的朋友，对她妹妹的事，却知道的不多，出于对死者的思念以至一种好奇，第二

天我请赵国珍来到我家，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日后又两次登门拜访她，了解了她的身世遭遇，正如她含泪的叹息：“我们姐妹真是一对浮萍草哟！”

1952年，我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发狂地爱上了黄梅戏和独具魅力的演员严凤英，风风火火地从上海来到安徽，参加了省黄梅剧团，从此结识了严凤英。

我们一见如故，处得不错。后来我到北京中央戏院学院学习，她特地为我设宴饯行……尽管如此，她却很少和我谈到自己的过去。她的性恪如同她的艺术，既丰富多彩又难以捉摸。

很久以后，我才陆续听到一些她的轶事，包括她的妹妹。

骨肉不幸分离， 姐妹各奔东西

严凤英的祖父原是桐城县罗家岭的一个巧手木匠，被安庆一个小客栈的单身老板娘留下了，无奈这个老板娘未能生养，祖父在四十岁时抱了一个孩子，取名严司明，这就是严凤英的父亲。

严司明聪明漂亮，念过小学，写得一手好字，在一家印刷所当过抄写生，还会拉唱几出京戏，廿岁就结了婚。婚后不久，生下了严凤英，取名鸿六，日子过得非常甜美。不到三年，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鸿鸾。可惜这对年青夫妇染上了鸦片瘾，放荡堕落，无以为生，竟把二女儿鸿鸾卖给了安庆的一户人家。

年幼的鸿六眼看着自己的妹妹被从妈妈怀里抱走，心如刀割，爸爸妈妈的狠心肠使她初尝人间悲惨。此后，只要一听到孩子的啼哭，她便会想到妹妹被抱走时的景象。偶尔上街时，两只眼总是不住的寻找，想重见那个抱走妹妹的人，好问出妹妹的下落。但是不久，鸿六也被送回离安庆大约有六七十里路的罗家岭老家。从此，罗家岭的山山水水把鸿六、鸿鸾姐妹生生地隔断了！

鸿鸾被卖给了姓赵的人家，取名赵国珍。这家男人在衙门里做事，那年已七十多岁。女人那年才三四十岁，没生过孩子，是第四次填房。他们

把介绍人袁妈留在家里当了国珍的奶妈，要袁妈断绝与严家的往来。使严家只知买孩子的家姓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晚上袁妈带国珍睡觉，鸿鸾就在袁妈的照看下逐渐长大。

严鸿六在乡下还有一位祖母，她与这位孤身奶奶相依为命，在放牛、砍柴、挖野菜中度过艰辛但是自由的童年。有时祖母不得已把祖父带回的有限的米量一点让鸿六去集镇上换点油盐钱，去集镇的路上，有一条清彻的河溪，河上有一架石桥，鸿六每逢捧着七、八斤重的米篮累了的时候，或者卖米回来，总是要坐在柳树下的石桥上，两脚泡在河水里拍打着、学唱着新近听来的山歌。每当看到别的孩子带着弟弟妹妹赶场、拾柴、嬉戏时，又总是想起自己那苦命的妹妹。一个愿望悄悄在她心里长出来：将来一定要把妹妹赎回来！

国珍到了赵家，亏得袁妈心肠好，国珍的日子过得还轻松。国珍三四岁时，袁妈带她出去玩，她听见袁妈对人说：“这伢子，长得越来越象她乡下的姐姐了。”国珍听了很奇怪，怎么我乡下还有姐姐？问袁妈时却什么也不说了。回家后国珍就问妈妈，谁知妈妈把脸一板，责问“是哪个对你讲什么姐姐不姐姐的？”国珍吓得不敢再往下问。有回在因一点小事被妈妈打骂，晚上，袁妈在床上抚摸着她被打青了的胳膊，止不住流着泪说：“伢子，有件事我早想告诉你，怕你小伢子，心里存不住，反而给你招祸……”国珍人虽小，心却灵，她摇晃着袁妈说：“我不讲，袁妈不叫讲，就不讲，打死也不讲！”袁妈叹道：“小国珍，看来我在这也呆不长了，这件事我不告诉你，走了心也不安……。你知道吗？你不是赵家妈妈生的，以后，你在他们跟前千万要小心才是呵！”从此，国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不久，袁妈果然被辞退了。接着赵家父亲又死去，家里生活来源断绝，赵家妈妈脾气就更坏了。时时在国珍身上出气。有一次国珍被打得钻到床底下去，妈妈半夜趁国珍睡着了把她拖出来打，一面打一面骂道：“叫你坏！我把你卖到妓院去，换钱抽大烟！”吓得国珍再也不敢睡觉。

一天，妈妈给国珍两毛钱，叫她去打酱油，国珍拎了瓶子上街，见一

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玩“跳房子”，她只顾出神地看着，那只握钱的小手不觉愣愣地伸开了。

丢了钱，她不敢回家去，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江边，码头上天色暗下来，码头上的人也渐渐少了，她看到暮色中自己的孤单身影时，不由全身战抖，拔腿就朝一处亮光跑去……

这是从迎江寺旁的一座破庙中发出的光。庙里，住着不少家难民，他们各占一个角落，自成一方天地，正烟熏火燎地做饭呢。一个地铺上正吃饭的白胡爷爷收留了她。小国珍就这样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花分两朵皆血泪， 各表一枝尽辛酸

鸿六在乡下的平静生活也被战争打破了。祖父和城里开客栈的“小奶奶”跑到乡下来。他们看到山风没有把鸿六吹黑，反而造就了她的野性，不大象个女孩家。他就把鸿六送进本村私塾，让教书先生来管她。鸿六却正好学会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常受先生的夸奖。这时，父亲严司明也回到乡下，有时，拉着二胡教鸿六几出京剧唱段，鸿六总是一学就会。后来父亲又走了，却给鸿六留下了对父亲的美好记忆，更在她心中埋下了一棵艺术幼苗。有回在上街的半路上，她意外地看到了一台黄梅戏。

她一接触到充满山野芳香的黄梅戏，立刻就着了迷，竟背着家人偷偷拜了镇上的严云高为师，认真学起黄梅戏来，这个师父教了六、七个小孩，他们组成一个小小班子，经常活动在附近的一些乡村集镇。不久事情被祖父知道，认为有辱门风，便把严凤英捆了起来，准备沉塘。她索性逃出了戏班，开始以演戏维持生活。一颗黄梅戏的新星即将破土而出，放出异彩。

小国珍当晚由逃难的爷爷收留，第二天一早，爷爷打算把她送回家去。她一听吓得哭了起来。她边哭边想了一个主意，哭着对爷爷说是跟妈妈上姥姥家去，不想上船时和妈妈走散了，妈妈会回来找她的。几天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来。爷爷便托人把国

珍带出去，四处打听她的家，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幸而碰到一个没孩子的许姓女人，把国珍收下了。她的男人在码头上洋行做事。他们就成了国珍的新父母，就此改名为许佩芬。哪知许家父亲实际干着鸦片生意，常将鸦片塞进柴捆里，再装船运往上海。他们又带回个玻璃香烟柜，让小佩芬天天去卖香烟。

佩芬在香烟柜前和叫卖声中长到十二岁，成了一个俊秀可爱的小姑娘。许家妈妈对佩芬还算不错，父亲却是个流氓，喝醉酒后想对佩芬无礼，吓得她尽量躲着父亲，气得那家伙经常打骂佩芬。父亲失业后全家搬到上海，摆了个小摊子，佩芬被送进纱厂当了童工，谁知没几天被辞退了。父母骂她丢了工作，在家吃闲饭，她一气去向姨娘的孩子求救，那个表姐正当舞女，介绍她到舞厅去卖糖。

佩芬从赵家逃到许家，一直渴望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亲人。爸妈不爱自己，狠心把自己卖了，真正的亲人只有常在梦幻中出现的姐姐。可姐姐在哪里呢？

隔行隔山不隔情， 姐妹难寻难相识

抗战胜利，严凤英十五岁正式搭班。上台以她甜亮的嗓音、美丽的扮相，和她超群的聪明才智一炮打响，很快便压倒群芳，红极一时。但艺术上的成就相反使她遭到一个旧社会女艺人常受的屈辱和不幸，她的艺术生命几乎夭折。

严凤英在安庆初露头角，就被怀宁的一个土匪头子霸占了，严凤英几经波折摆脱枷锁后，又害了伤寒病；她在困境中找到了四岁后就见过的母亲。可是，人间无钱就无情，她得不到渴望的母爱，便发誓自己去拼！她辗转流落在青阳、贵池、芜湖、南京一带，当过女招待、茶楼卖唱、酒肆伴舞……

一九四九年南京的一个戏曲世家子弟甘律之将她收留。一年多她和甘家子弟们一起练功、学京戏和昆曲，对她此后从事黄梅戏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甘律之为了支持严凤英的事业，送她回到自己的植根地安

庆。

严凤英 1951 年回到安庆，成为“胜利剧院”的台柱子，1953 年成立安徽省黄梅剧团，她又被调到省团，艺术上日趋成熟，以至出类拔萃了。这时的她，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生活安定了，却不断想念起妹妹来。她得知旧社会造成的骨肉分离不少都重获团圆，就向组织上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希望领导上能帮自己找妹妹。

严凤英找妹妹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江淮平原，马上有人找上门来，有个安庆口音的女同志找到了严凤英进门便说：“姐姐，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妹妹鸿鸾呀！”说着拉着严凤英就大哭起来，然后将严凤英的家世，一五一十地说得有头有尾，许多事情连严凤英自己也不知道。思妹心切的严凤英信以为真，真象亲妹妹那样待她，几天后，有的热心快嘴人忍不住了，把严凤英叫到外面悄悄说这个“妹妹”长得没有一点象她，提醒她再仔细问问，不要上当。她开始听不进去，但是有一次这个“妹妹”又滔滔地谈起“小时候”的事时，严凤英不禁起疑想道：我比她大几岁都记不清这些事，她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心里有想法，态度也有些冷淡了，这个“妹妹”心里发虚就破绽百出，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假冒的事实，原来她说的家世，是从严凤英在安庆的父亲那儿了解到的。这以后，有了警惕的严凤英又发生几起“认姐姐”的事，都冷静地处理了。

组织上也派人去帮她调查，安庆派出所的同志听说这事后，热情地调查老邻居、翻找了许多户口本，终于查到赵家的姓名住址。赵家仅剩的衰弱老妈妈，只知道国珍八岁那年跑走，其余什么也说不出。找妹妹的“线”断了。

天涯两茫茫， 妹妹在何方

已改姓许的赵国珍在上海舞厅卖糖卖到十六岁，当了舞女。她偶然结识了一个姓周的大学学生，小周对她很好，教她学文化，要她衣着朴素，不要再去舞厅……国珍一生中第一次

受到人家的尊重和怜爱，心底出现了一个新天地。小周的纯朴、正派、使她由衷地向往、倾倒。他们相爱了，但却遭到许家的断然阻止。他们要用国珍来赚大钱，就把她锁在家里。国珍在小周一家的帮助下逃出许家，与周双双离开上海，到郊区一直住到解放，人民政府婚姻法颁布，他们才获得自由重回上海。

周家搬到苏州居住，国珍也去了。美丽安静的苏州和那不断飘来的悠美琵琶声，启动了国珍的艺术心扉。她梦想自己也能上台演唱，就和小周商量，小周说她已有孩子的人了，家里又不缺她吃穿不同意她去。几年后，小周思想也有些变化，同意她去学琵琶。一次国珍带琵琶路过苏州车站旁，她看见街角上放着一只只大木箱，上写“安庆市黄梅剧团”字样，这几个字，一下将她吸引住了，她走近那些箱子，盯着上面“安庆”两字，这两个字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哟！儿时的记忆一下涌上心头……尽管回忆是那么苦涩，那么辛酸，可那是自己的出身地，那里还有自己的亲姐姐、自己的家呀！她情不自禁地围着戏箱转了一圈又一圈……

剧团的同志们一见站在戏箱旁边的国珍一个个都愣住了，不约而同地窃窃私语“这人真象严凤英呵！”

严凤英调到省里后，安庆黄梅剧团失去了一根台柱，正愁后继无人，大家见了赵国珍不由都想道：这个女同志要是嗓子好，培养培养，准能成为第二个严凤英。有人忍不住问她道：“喂！同志，你喜欢唱戏吗？”“喜欢呀”，国珍毫不犹豫地说。“那你……能不能唱只歌给我们听？”

国珍顺势取出琵琶，大方地唱了一段评弹，那嗓音还真有几分象严凤英的清亮甜润，同志们高兴得一窝蜂地问国珍道：“你参加我们剧团怎么样？”“你喜不喜欢黄梅戏？”“愿意跟我们去吗？”七嘴八舌最后变成一句话“愿意吗？”“有啥不愿意？高兴也高兴煞了！”国珍一句话说得大家突然沉默了。国珍看出他们对自己的苏州方言有顾虑，忙说“我小时候讲过安庆话，我会想起来的……”“真的？有这么巧事！？那太好了！”就这样她们互相讲定，等他们回去向领导汇报，一旦批准就来信通知她。他们说现在

正缺演员，象她这样条件，很快会有好消息的。

国珍感到生活中突然有了希望和光明。但却不敢告诉家人，悄悄等着剧团的回信。

1957 年省里举行全省会演，安庆的剧团也带着新戏来了。他们一到合肥就探望从本团出去的严凤英，一见面就谈到了苏州车站的奇遇。绘声绘色的描述，严凤英一听就急切地问：“她姓什么？”姓许，叫佩芬，“姓许？为什么她不姓赵呢？”“那为什么？同志们这才懊悔地埋怨为什么当时不问问清楚。

有人说有她的地址可以写封信去问。严凤英也高兴地让快写信去问。

琵琶师为姐姐“架桥”， 《天仙配》使妹妹认亲

赵国珍终于等到了安庆黄梅剧团的另一封来信，小周板着脸问是怎么回事，国珍不愿再隐瞒，从车站偶遇讲起，说了自己的愿望，她知道，假如没有小周和他家人的支持，她哪儿也不能去。信一打开，上面简单几行写道：“经研究决定，同意你参加我团，望接信后速来报到。”国珍忍不住喜形于色，小周却一下炸开了，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国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将会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机会。

不过，命运之神已经将她们姐妹之间的一根红线搭上了，接通这根线只在早晚。

未能如愿的赵国珍为了表示对安庆黄梅剧团的歉意，向他们推荐了自己的琵琶师陆寿康，并得到录用。

严凤英等不到音信，找到了那位琵琶师，请他去信，去苏州问问情况，又交待他不要说是严凤英在找妹妹。

国珍接信后，就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陆师父，说自己是安庆人，年龄廿八岁，叫赵国珍，不是赵家亲生，自己乡下有个姐姐……

严凤英从陆师父那儿一见这信，立即确认这个许佩芬——赵国珍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她恨不得一下子就能和妹妹见面，但是严凤英当时已经全国知名，一言一行，都将社会上产生影响，她提醒自己，慎

重！一面把这事向组织作了汇报，一面直接给赵国珍写信。

这时国珍已随全家又迁回上海。严凤英的信，是从苏州转来的。国珍这才知道，自己的姐姐就是严凤英，自己梦中常见的亲姐姐终于找到了。可是她一下想起严凤英是名演员，认错了人定不让人笑话自己想攀高枝。到底是不是，她想起自己和严凤英很象，相互一比定能认出来！小周说《天仙配》是严凤英拍的电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他们赶快找到一家正在放《天仙配》的小电影院。电影开映后，她盯着七仙女的脸看，确实感到似曾相识，旁边坐着的小周和女儿大声争道：“我说眼睛最象？”“我说嘴最象！”“笑起来特别象！”一场电影看完了，全家人走出电影院，大家一致认为：严凤英是赵国珍的亲姐姐！

她给严凤英写去一封信，细说了自己的全部情况，她希望姐妹尽快见面。激动的泪水点点滴滴洒落了信纸。

当时正是严凤英在事业上的高峰时期，电影《天仙配》放映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书信如雪片飞来，她已无暇应对。《女附马》的开拍又已排上日程，加上舞台演出《春香传》《打金枝》……她太忙了，难免将找妹妹的事搁置一边。这使国珍的日子不太好了，家里家外，闲言碎语，不断向她袭来。她又给严凤英写信说：“我要的是姐姐，不是名演员，不认就算了……”这一撒娇，姐姐就急了，赶忙回信说：“你急，我比你还急，我们见面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后来严凤英已经得知不久就要去上海拍电影《女附马》，她没有明说以免妹妹焦急和失望。

姐妹终于重逢， 动乱造成遗憾

严凤英终于来到上海，《女附马》开拍了。她一住进“新亚酒家”就给妹妹打电话说当晚来这里见面。

晚上，国珍来到灯火辉煌的新亚酒家，她上了三楼，进了大厅，眼睛扫视着来来往往的演员。只见走廊那边走来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同志，高高的个子，长圆形的脸庞，身披一件旧列

宁装，人们纷纷和她招呼，喊着“严团长！”国珍立刻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姐姐，严凤英也一眼便认出了妹妹，急走几步，一下抓住了国珍的手说：“妹妹你来了！”国珍的嗓子忽然被堵住了，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只是使劲握住对方的手，两张笑脸，四行热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人们很快发现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走廊上涌满了人群，旅社服务员和演员们纷纷赞叹、评说和议论……

还是姐姐老练些，掏出手帕来替妹妹擦去眼泪，然后把国珍搀到自己的房间坐下来；姐妹俩的话话这才象黄浦江水一样汹涌而出……

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妹就这样见了面，以后严凤英找各种机会到上海，一到就找妹妹，抽时间和妹妹一起上街、合影、散步……当她们并肩走在马路上，人们无不向她们投来惊异和羡慕的目光，每逢此时，她们感到自己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一次，严凤英在华东医院动手术，国珍整日守候在床边。姐姐稍好一点，便拉着妹妹各病房去转，逢人便问她们俩象不象？一遍又一遍地说她们当初怎么分开，后来又怎么找到的故事。

严凤英又来上海拍摄《牛郎织女》时，正逢国庆观礼，好几个地方要她去参加活动，她分不开身，便叫妹妹代她出场，两人的衣裳互相穿，眼镜互相戴，连她们自己也笑说分不清谁是谁了。

严凤英要国珍改名严凤鸾，国珍就打了报告。

严凤英没有女儿，要国珍从三个女儿中过继一个给她……

严凤英年年去上海，赵国珍无论在哪里必定准时赶去看她，她们骨肉难分，生死不离！一九六八年那么快地来到了。国珍随所在的评弹团巡回演出到蚌埠，即将乘车返回的时候，一幅巨大的标语赫然出现在车站的墙上“严凤英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国珍惊呆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想马上去合肥看姐姐。姐姐一定正在受着折磨，她要去安慰她……剧团的同志将她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将她又拉上回上海的火车。

严凤英死了。以她年青的宝贵生



安庆“菱湖公园”的严凤英塑像

命换取了人们对“四人帮”的认识和仇恨。

国珍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么充满生命活力的姐姐会永远消失了，可是，年复一年，她的电话铃再也不曾响起姐姐的声音“妹妹，我又来了！”再也没有看到姐姐那美丽亲切的面容，只有在自己的阁楼上姐姐像前，她才能尽情地同姐姐诉说自己不尽的哀思，流淌着流不尽的泪水……

多少年过去了，黄梅戏终于走出低谷，又以新的风姿出现在舞台上。剧团的同志们每次去上海总要去看望赵国珍，而国珍只要见到黄梅剧团的同志们，也就见到了姐姐，见到了亲人，赵国珍也渐渐老了，但思念的泪水却永远也流不完……

1987年，开往安庆的轮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她那双疲倦的眼神中在不断闪光。她，赵国珍，安庆的女儿回来了！看到迎江寺的宝塔，当初逃跑时的景象依依似在眼前，暮色中传来的妇女呼唤着孩子的声音仿佛又回响在她耳边……船靠岸了，严凤英的大儿子王小亚和他的父亲王兆乾在码头迎接。他们一起来到菱湖公园，这里，停立着一尊严凤英的仙女塑像，他们三人站在塑像前，抬头仰视，周围一片寂静。

他们的思绪已飘向遥远，遥远……

(责任编辑：卢弘)

印度卡达克舞之王称她为“坚石女人”，并以一位印度女神的名字叫她“霞妹”。
印度新闻界则把她誉为——

二十世纪的女“玄奘”

——著名东方舞大师张均的人生传奇

○孙云晓

1988年12月20日下午4点多钟，一辆有外交使节标志的豪华小轿车，悄然驶进了北京和平里居民区，在一幢4层的黄色楼前停住。从车里出来的是两位中年男子。都留着黑黑的小八字胡，穿无领制服，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纸箱。他们刚想确认一下门牌号码，忽然发现一家门上贴着印度女神像，便微笑着按响了门铃。

女主人张均开门迎客，见是两位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不禁愣住了。这

时，其中一位外宾用英语问道：“您是张均女士吗？”见张均点头，他笑逐颜开地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印度驻华使馆的人员，受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夫人委托，特意给您送一些礼物。”说罢，他抖了抖纸箱，响起一阵悦耳动听脚铃声。张均顿时恍然大悟，急忙用英语招呼外宾进屋。

客人进屋一眼便看出了主人对印度艺术的倾心。呈古铜色的钢琴上，放着一个被印度人民奉为“舞蹈之王”的湿婆神铜像。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彩色挂幅，上面绘着3个女子的婀娜舞姿。就连玻璃柜里和茶几上，也点缀着印度工艺品……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的室内花园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夫人，热情招待了张均等数十位中国专家。

印度贵宾为什么如此敬重张均呢？

张均是国家一级演员，东方歌舞团艺术指导。在一篇介绍她的短文中写道：

“张均从小爱好文艺，擅长舞蹈，15岁即初露头角。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印尼时，开始学习亚洲舞蹈。1962年成立东方歌舞团时，由周恩来总理点名，调任该团主要演员，踏上了专业表演、教学和研究东方舞蹈的艺术道路。……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已过不惑之年还赴印进修，刻苦学习、钻研印度古典舞蹈。她认真向印度舞蹈之父——乌黛·香卡、卡达克之王——比宋·玛哈拉吉和其他印度古典舞蹈各派名师学习，使其艺术

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样，她荣获印度达尔帕纳艺术学院‘戏剧荣誉学位’，取回了东方舞蹈的主要代表——印度舞的‘真经’，被印度报刊赞为‘20世纪的玄奘’……”

“我在黑海边戴上红领巾”

张均是湖北蕲春县人。她于1935年2月出生在汉口，童年却是在四川度过的。妈妈是大学教授，爸爸是文职人员，都喜欢艺术，因而使张均从小便受到良好的熏陶。到了中学时代，她的艺术才华已经小有名气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14岁的张均在上海参加了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算是正式进入了文艺界。

1951年夏天，应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邀请，中国将组织一支中国少年儿童队（即今日少先队）代表队，赴苏联访问并参加黑海阿尔迪克少年先锋夏令营。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少年儿童代表团。

也许是考虑到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史吧，团中央决定从新安旅行团产生一位代表。消息传来，新安旅行团里一片欢腾。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的孩子，哪个不想去苏联看看呀！可是，接下来大家便猜测起来：毕竟只有一个名额，这个幸运者会是谁呢？

幸运者是张均。

1951年6月11日，张均和来自祖国各地的队员代表们一起，乘火车，





自北京向莫斯科驶去。整整走了10天才到达。这么漫长的旅行生活，张均感到又新奇又兴奋。可她万万没料到，一到莫斯科，自己竟患了猩红热，差点儿把小命儿丢了。因为她生病住院，同来的伙伴们因祸得福，在苏联多呆了一个月。不过，张均也着实让苏联医生吃了一惊，这倒不是因为猩红热，而是被隔离在病房里的张均，居然跑到阳台上练功。在苏联医生眼里，这个中国小姑娘一定是疯了！

直到40年后的今天，张均依然每天坚持练功，不练反倒难受。好朋友对她开玩笑说：“不知张均吃什么药了，总那么精神，恐怕死后进棺材的时候，脚还要蹬两蹬呢。”

病愈之后，张均来到了克里米亚黑海之滨，参加阿尔迪克夏令营。她与各国小朋友一同下海游泳，一同在海滩上日光浴、拾贝壳。张均不负重

托，不但独自表演了精采的剑舞，还帮助中国队员们排出一台节目，受到热烈欢迎。至今，还有人回忆起当时跳的“腰鼓舞”。

忆起阿尔迪克夏令营，张均久久难忘的一件事，是她在黑海边第一次戴上了红领巾。她说：“我是先入共青团，后入少先队的。”由此，她一直把自己认做少先队的一员。

这次出访归来，要说张均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喜欢中国的民族舞蹈了。

“要成立一个东方歌舞团”

1954年，新安旅行团改为上海歌剧院，张均成了舞蹈队的演员。

不久，张均接到任务，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临行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

表团成员，说：“这三个国家是近邻，文化上相互影响。你们去不光介绍我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人家的文化。”在出国访问的日子里，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带领大家学会了两台外国歌舞，一台印度的，另一台是印尼和缅甸的。不用说，张均都担任了重要角色。返回北京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他们的演出，并且表扬了演员们。

1956年，张均被派到北京舞蹈学校，学习中国的民间舞和古典舞蹈。就在张均学得特别来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完全意外的事情。一个印尼舞蹈团随总统来中国访问，周总理指示北京舞蹈学校，派两人随印尼舞蹈团参观学习。当时担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的戴爱莲，早就认准了张均是跳东方舞的好苗子，所以一下子便选中了张均。

张均得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当头一棒！以前，她虽然跳过印尼舞，那只不过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内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喜欢，甚至觉得印尼舞又怪又土。所以她又哭又闹，不肯接受任务。等到该随印尼舞蹈团上火车的时候，她竟然躲藏起来了。

张均犯犟的事儿，传到了文化部领导那里。领导也来做她的工作，讲周总理为什么重视东方舞等等。想到周总理那双信任和期待的目光，张均动心了。上次出国访问回来，周总理一听说他们学回来两台东方歌舞，兴奋得马上邀请他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还请毛主席来观赏，这不都是为了在中国发展东方舞吗？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却时时惦着东方舞，你还能再拒绝下去吗？

几天后，张均一个人拎着箱子，乘火车去东北追赶印尼舞蹈团了。她随印尼艺术家生活了两个月，已可以与他们同台演出了。后来，印尼副总统来中国访问时，周总理专请张均表演印尼舞。

1957年，泰国艺术团来中国演出时，周总理特地又让张均跟着学习3个月。近半年的熏陶和琢磨，张均的感情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她开始爱上了东方舞，并开始发现东方舞的魅力和规律。听说印度舞蹈团要来中国时，不待领导下达任务，她主动去找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求随团学习。

不久，印度副总统来华访问。周

总理为了欢迎这位贵宾，特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欢迎大会，并安排了文艺演出。看过那场演出的无不承认，张均的《拍球舞》最为精采。

请看艺术评论家对《拍球舞》的评论：“……特别是张均表演的《拍球舞》，雕琢得细致、动人极了。一个聪明、美丽、稚气、任性的印度少女，独自在花园的草坪上，自由自在地玩皮球。她一会儿双手捧着球，不住地在胸前翻滚欣赏，一会儿用手由高到低地拍打，或用手指由低到高地轻轻擦弹。忽儿她把双肘交替轻轻击球，忽儿又生气地把皮球扔向高空，其动作优美而准确，有时柔软，有时刚强。其舞姿轻捷优美，时而腾跃，时而回旋。其神态半娇半嗔，妩媚可爱。皮球是虚拟的，演得却活灵活现。拍皮球的少女，更是刻划得维妙维肖。这个舞蹈，不过几分钟时间，但却给予观众丰富的艺术享受和回味。这里充分体现了张均擅长表演东方舞蹈的才能。她已经比较纯熟地掌握了印度舞的风格、韵律和技巧……”

《拍球舞》是张均的成名之作。直到现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人都念念不忘这个舞的魅力。外交部长钱其琛有一次见到张均，开口便说：“啊，张均，《拍球舞》！”

1961年1月，张均随周总理访问缅甸。在一次宴会上，张均与另一位演员表演了缅甸的《古典双人舞》，使缅甸总理吴努大为欣赏。在缅甸总统吴温貌的花园晚会上，吴努总理又向周总理建议，让张均与另一位演员再次表演《古典双人舞》。告别演出时，张均与她带领的演员们，表演了14个东方国家的舞蹈。结果，演哪个国家的舞蹈，哪国大使便兴奋地来与周总理碰杯，洋溢着一片友好之情。

事后，周总理愉快地说：“演出非常成功！我还不知道，咱们中国还有这么一批财富，这十几个娃娃起了外交家起不到的作用。”说罢，他略沉思了一下，提议道：“要成立一个东方歌舞团。”

返回祖国后，周总理夫妇特邀张均等演员去中南海紫光阁吃饭。当时，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周总理自己吃窝头，却请演员们吃大米、白面和豆腐。他笑呵呵地说：“你们这些娃娃为缅甸之行立了功，我请你们来

表示感谢呀！”

听着周总理的话，26岁的张均流泪了。几年之间，自己成长为一个著名的舞蹈家，不正靠总理为自己指出的成功之路吗？

“神也要感动的啊！”

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东方舞蹈班，由张均担任东方舞教师。周总理出访缅甸时高度评价的那“十几个娃娃”，正是张均的学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东方舞蹈班为东方歌舞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对东方舞研究的深入，张均越来越向往印度舞。她虽然学会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舞蹈，却没有真正掌握印度舞的规律。她知道，印度古典舞蹈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同时，它也以严格的程式、复杂多变的手势、深奥而难以掌握的韵律，使世界各国的舞蹈家望而生畏。可是，印度舞对东方舞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掌握印度舞就说不上掌握东方舞。

然而，一直到20年后的1980年，张均才获得了赴印度学习舞蹈的机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派留学生到印度学舞。已经45岁的张均激动地说：“我等得头发都白了，真恨不得把印度舞吞进肚子里！”

1362年前，27岁的唐僧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去印度取经，历遭磨难。如今，张均和另一位舞蹈家刘友兰，也踏上了“西天取经”的道路。虽然，她们乘现代化交通工具——飞机，仅用20多个小时即可到达印度，但她们“取经”的艰难，绝不在唐僧玄奘之下。

今天一提起出国学习，不少人总是联想到优裕的生活和异国风光。可是，张均和刘友兰去的达尔帕纳艺术学院，连学生宿舍和食堂都没有，她俩只好住在一间临时腾出的房间里。每月500卢比的奖学金，除了买学习资料以外，只够维持起码的伙食标准。因此，她俩每天必须自己买菜，一日三餐全靠自己在小煤油炉上煮。然而，比起学习印度古典舞蹈的艰难，生活上的清苦又算不了什么。

印度的古典舞蹈分为六大派，即



婆罗多、卡达克、莫赫尼亚特姆、曼尼普利、奥迪西和库契普迪等等。印度人常常用毕生的精力专攻一派古典舞，而且要从七、八岁学起。他们习惯地认为：过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再学印度舞是学不好的。因为印度舞蹈的语汇纷繁复杂，一个眼神，一举手或一投足，都包含着特定的意思。各派舞蹈的风格又迥然不同，难度极大。就以达尔帕纳艺术学院来说，仅学婆罗多舞的学制即长达6年。可是，张均和刘友兰不但年纪大，并且只能学半年，怎么办呢？她俩全都铁了心：奋力拼搏！

每天清晨，两位中国女子披星戴月地苦练起来。全学院仅有的住宿生小屋里射出枯黄的灯光，劈劈啪啪的脚掌击地的节拍声，打破了校园沉睡的寂静。晚上，印度师生都回家了，张均和刘友兰则继续练了起来。

与其他舞不同，印度舞要求跳舞者常常处于半蹲的姿势，并使劲儿用脚掌踩地。柔软脚掌在练舞场的硬瓷砖地或土灰地上，既要有脆响的声音，又要有急促的节奏。两三天后，脚掌肿起来了，走路都疼痛难忍，可练起舞来，还得使劲踩。皮肉绽开了，流出一缕缕鲜血，刚刚结了层血痂，下次再踩，又渗出新的血。一直到脚底长出一公分厚的硬茧，连踩着红红的烟头都不感到烫的时候，才算过了练舞的第一关。当地商店的老板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这两个中国女子几天就要买一斤盐，难道中国人口那么重

吗？原来，她们是用盐水泡脚呢，为了保护腿关节不受损伤。

她们着了魔似的，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印度舞了。为了牢记动作顺序，她们把做饭、走路、等车的时间也都利用起来。复习那像经文一样难记的动作顺序，为此经常把饭煮糊了，或引得路人吃惊地望着她们。而她们也似乎进入无人之境，哪儿都成了舞蹈的天地。

张均和刘友兰的拼搏精神，震撼了达尔帕纳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一位老教师说：“像你们这样同时学三派舞蹈，别人是做不到的，学院里人人都在夸你们。你们一天练十几个小时，连神也要被你们感动的。”是的，神被中国学生感动了。有些教师主动给她们辅导，从开始每隔一天上一次课到天天上课，后来晚上再给她俩单独上一课。这样，仅仅3个半月，她们顺利地通过了婆罗多等三派古典舞的考试。鉴于她们所得的优异成绩，印度政府批准了她们延长半年留学时间，以学完印度的六派古典舞蹈。几天后，她们乘上了驶向新德里的火车，那儿是印度的首都，那儿的舞蹈，正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她们。

到新德里后，印度的夏季很快来临了。五、六月份，气温高在摄氏48度，报上每天都有热死人的消息。一般人呆着不动都热得受不了，可是张均和刘友兰每天却要练十几个小时的舞蹈。每次，她们在卡达克舞蹈学院上课，浑身的大汗就如同水淋了一样，可又顾不上洗一洗，就要赶到另外几个学院，学习其它派别的舞蹈。烈日烘烤下的街道，犹如火焰山上漫长的路途，而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那浓重刺鼻的汗臭味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这艰苦的生活，就像取经路上的一次次劫难，时时在考验着两位中国女性。

张均感慨地说：“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只要心里有一个理想，就能产生超乎寻常的力量。”当时，对印度舞蹈的热爱和祖国的荣誉感支持着她们，使这两个并不健壮的女性不仅挺住了，而且以惊人的毅力取得突出的成绩。

一年过去了。晒黑了、累瘦了的张均和刘友兰，终于全面地掌握了印度的六大派古典舞蹈。这在世界上都

是一个奇迹！看过她们的精采表演之后，印度古典舞蹈中心主席苏娜·曼辛用钦佩的眼光望着她们说：“你们一年学了10年的课程。”

印度新闻界也发表评论：“如果在写二十世纪的世界史时，要描述张均、刘友兰对印度的访问，她们不会比法显和玄奘差。”（《金融快报》）当然，她们取回的不是佛经，而是舞经。

永恒的“艺术生命”

张均和刘友兰满载收获，返回了祖国。在印度的时候，张均看到隔壁的一座别墅里，主人躺在草坪上的躺椅上看报，心里羡慕极了。她说：“我当时就想，回国后好好地把手伸直，美美地睡一觉。”

谁知，张均回到北京只有两天，印度诗剧《沙恭达罗》的导演白珊，就来登门拜访了，特邀张均担任该剧的编舞。于是，张均征尘未洗，又上征

程。她不辞辛苦地奔波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东方歌舞团之间，不但编舞还要教舞。

艰难的日子又出现了。给《沙恭达罗》剧中伴舞的女孩子们，连印度舞是什么样都没怎么见过，跳起来就更加吃力了。譬如，印度舞中有一个“三道弯”的造型，即把头、身、胳膊自然地扭成“三道弯”，就把女孩子难住了。张均便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口里念着节奏，一遍又一遍地手把手教，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舞步，一个身段地耐心辅导。

《沙恭达罗》成功地演出了。在场的印度客人纷纷赞扬“好极了！”国际广播电台一位印度专家评论说：“一般印度人都没感觉是中国人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当时，许多人建议张均举办个人的独舞晚会，并预言会相当精采。关于这一点，张均当然胸有成竹。早在20年以前，她已经具有举办个人独舞



晚会的水平,何况刚在印度拼搏了一年之后。但她以更博大的胸怀,从整个舞蹈事业的发展角度着想,认为培养年轻人的事业才是当务之急。

1982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知道,舞台对演员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我也不愿意离开舞台。可是,想到事业的发展,还是应该多让青年人上。”她还说:“舞蹈艺术是青年的艺术。年龄对舞蹈演员尤为重要。我今年已经47岁,不能再多上舞台了,但艺术生命并未结束。全力培养青年演员,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与体会教给他们,由他们继续发展舞蹈艺术。这样,我的艺术生命也就得到了发展。”

其实,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这样做了。1982年初春,张均便在东方歌舞团举办了印度舞蹈训练班。

“印度班”开始只有5个学员。她们原来是学芭蕾舞的,毕业后分配到东方歌舞团,用不上芭蕾的专长,正面临改行的危险,个个情绪低落。张均看他们身体素质和形象都不错,就向领导提出试着教一教她们。这些年轻姑娘们非常珍惜这样一个转折,一接触印度舞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人人勤学苦练。

北京的2月,天气是相当冷的。可是,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没有暖气,只生了两个炉子。根据印度舞的要求,必须光着脚练习。在张均的带动下,姑娘们纷纷脱去鞋袜,劈劈啪啪地跳了起来。一个个脚磨破了,冻裂了口子,大家都不叫苦,贴块橡皮膏继续坚持练习。

张均太累了,终于病倒在床上,但她没休息几天,又挣扎着来为学生上课,她已经离不开这些可爱的姑娘们……

“真经”是难以轻易取回的。1986年,已经51岁的张均第4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次,她不光是来取舞蹈之“经”,同时是来寻求舞蹈训练之“经”。这是一门更复杂的学问。但她没料到,此次印度之行,自己竟遭受了意外的磨难。

1987年春节来临的时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邀请张均去吃团圆饭。身

在异国的张均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她洗了澡,换上漂亮的衣服,乘上公共汽车,恨不能立刻飞进中国使馆。

与中国的公共汽车不同,印度的公共汽车没有门,许多乘客不等车进站停稳就往下跳。突然,毫无防备的张均,被拥挤地印度乘客撞下车来,摔成了严重的骨折!她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认定,她的右脚三处骨折。医生为她打了厚厚的石膏,告诉她半年才能正常。印度教师和中国使馆都劝她回国养伤。张均一听就急哭了,“经”没取到手,怎么能回去呢?她说什么也要坚持学下去!

谁都知道,跳舞是用脚来跳,脚受了重伤怎么跳舞呢?张均却从骨折第3天又继续学舞了。她跳不成了就坐在那儿用手来表演,用心去体会。晚上,再做大量笔记,画出一套套舞蹈动作的图形和符号。

困难是巨大的。她的宿舍像窑洞一样简陋,没有卫生间。上厕所时,她要柱双拐一跳一跳,到50米外的公共厕所去。因为她要到好几个地方学习舞蹈,一路行走极为艰难。幸好有两位中国男学者的帮助,每日用自行车推着她去上课,上台时还背着她。有时,男学者来不了,她就拄着双拐一步步移动。她的毅力感动了印度同学。有位印度姑娘在她的石膏上写道:“我的神啊,请让她快些好吧!”

整整3个月啊,张均没有洗澡,这对一个极爱清洁的女人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啊!印度的夏天来得早,又闷又热又痒,她咬牙忍着,一天也不停止学舞。3个月后,谢天谢地,拆去了石膏。可她吃惊地发现,由于肿的缘故,右脚变成“大象的脚”了,天哪,这怎么跳灵巧的印度舞呢?

练!苦练!张均下了狠心,开始用脚跳舞。上课的时候,仅练跺脚的基本功,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刚刚拆去石膏的脚,踩在坚硬的水磨石地面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脸色越来越苍白,张均也不肯停止。为了充分表现出舞蹈的丰富含意,她还要随时做出微笑、幽默的一系列表情。

又是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由

于勇敢顽强苦练,张均的脚恢复了正常,她学会了许多新的印度舞蹈。她的教师、印度卡达克舞之王感动地称她“坚石女人”,并以一位印度女神的名字叫她“霞妮”。

再次返回祖国的张均,以更高的标准和水平培养新人。她不但继续培养年轻人,还招收了五、六十名小学生。从小开始严格训练。

张均热爱印度舞,也更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1990年1月10日,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即集多年研究东方舞的心得,设计用对比的方式将中国新敦煌舞姿与印度舞蹈同时展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让观众们赏析这两大闻名世界的东方艺术的异同点。这场敦煌与印度舞蹈鉴赏晚会,受到中外观众的热烈赞扬。印度驻华大使任贾德用流利的汉语称赞说:“这是为印中建交40周年准备的最精美、最真挚、最有价值的献礼。”他还表示要把这台晚会介绍到印度去。其他一些外宾则称这台晚会是一枝展吐友谊芬芳的鲜艳美丽的并蒂莲。

就张均来说,这次晚会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向艺术界向中外观众,展示年轻一代东方舞演员的风采。譬如,她的学生车秀清、赵永斌等人表演的《舞神之舞》等各派印度舞蹈,已达到技艺娴熟的程度。9岁的小林萍是她的得意弟子,小姑娘出场,格外引人注目。新闻界欣喜地评论道:“9岁的林萍是深得张均真传的舞蹈新苗,她以扎实的基本功和纯正舞韵表演的《提拉那》,博得了观众极为热烈的掌声。”《北京晚报》则干脆称小林萍“舞蹈神童”、“张均的得意高徒”。看到东方舞后继有人,被誉为“舞星唐三藏”的张均能不深感欣慰吗?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一个艺术家的事业如果被一代代人继承下来,她的艺术生命不就是永恒的吗?

不过,张均自己说:“取经也好,传播也好,我不可能把这件事做完。我只完成了上篇,下篇交给学生们去做了。我相信,学生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下篇将会更加精彩!”

[责任编辑 晓渡]



音乐家之死

1990年4月18日,傍晚时分。

阴雨连绵,天幕低沉,空气郁闷。一切都似乎在预兆着要发生什么不幸!

施光南站在钢琴前教女儿蕾蕾练习学唱大型歌剧《屈原》的片断。蕾蕾是很有天分的孩子,如同她父亲那样热爱音乐艺术……蕾蕾亮开了嗓门轻松地唱出了一句高音曲调,父亲极为高兴。

“不过,你表达的情感与用声的技巧还有欠缺。”父亲认真地对女儿说,“我来为你示范唱一下。你好好听着。应该这样唱……”

光南一边拉高嗓音,一边动情地高高举起一只手……他的明亮的男高音歌声在琴房里回荡。

突然,他的脸色骤变,高举的那只手僵住麻木了……

“蕾蕾,快,快给爸爸揉一揉。这只手不知怎么搞的啦?”光南对女儿说。

蕾蕾还来不及为爸爸按摩手臂,猛地,光南的嘴上肌肉又突然痉挛起来。

蕾蕾完全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懵了。她还什么也没有为父亲做理,

父亲已觉得顿时天旋地转,头昏眼花,浑身瘫软了下来……

“蕾蕾,快扶爸爸到沙发上……”

被惊动了的光南的80多高龄的老妈妈也赶忙过来照看儿子……几颗心全被绞痛着!

“妈,你快回家吧,爸……”蕾蕾给妈妈的办公室去电话,话语也不清晰顺畅了。

光南的妻子洪如丁焦灼地骑着自行车赶回家。进门一看光南,他躺在沙发上,已不醒人事,嘴边直流水……他昏迷了过去。

她立刻给住家地区的朝阳区急救站去了电话,恳求他们派车派医生来抢救。但这个急救站的急救车外出……

她赶快给北京市急救中心去电话。

“你的家在哪?”急救中心值班的问。

“在建国门外灵通观……”

“你那地方太偏僻。你在建外的大马路上等我们吧。”

急救中心的大夫及时赶来,上楼为光南打了急救针。

“这病很危险!”大夫说,“得尽快送医院。”

“送哪个医院?”如丁因为着急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送协和医院吧,近些。”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

——诗人臧克家

音乐家

施光南的恋情与家事

○傅溪鹏



原来，洪如丁以为丈夫的病是一般的昏迷，她记得。有一回，光南得了食物中毒，也是这样昏了过去，经抢救，很快便康复了。不料这回……

在协和医院地下室急救室里。医院里的有关专家全聚在这里，对光南的病情进行会诊。

如丁和女儿心焦如焚地在急救室外等待着，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那怕那么一点点……

“你赶快去打电话，叫他们单位的领导赶快来！”值班大夫出门来，急促地对如丁说，“病情挺严重的……”

如丁的脑瓜子轰得一响，如同炸开了一个响雷，一下子记忆中的电话号码全忘记了，脑中一片空白！她瘫坐在长椅上，两眼发直！

诊断结果是严重的突发性脑溢血症。光南的血压高达300。心脏曾经骤然停止跳动。经抢救，尽管恢复了心跳，但是，颅腔里的大量积血压迫

了脑神经和呼吸神经，造成大脑死亡与呼吸停滞……

往外打的电话，还是女儿打的。

光南所在单位中央乐团负责人，还有文化部及全国青联（光南是青联常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先后赶到医院探望光南。

光南平静安详地躺着，闭着双眼，没有笑容，没有痛苦，如同熟睡了一般，像是连续几天几夜写曲子劳累不堪而进入了梦乡，酣憩一般……

可无情的事实却摆在面前：他已经脑死亡了！

中国医学上判断生命的死亡标准是停止心跳。可按国际医学界的惯例认为，脑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即使抢救过来，也只是植物人……

光南被从地下室移到一楼的普通大病房里。如丁和蕾蕾悲痛万分地跪爬在光南身边，用颤抖的手不时地梳理着他的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抚

摸着他那纯情质朴的脸庞，盼望着奇迹会突然降临，他会突然醒来。

如丁轻轻地号了号光南的脉搏，从心底里强烈地感到他那倔强的生命力依然存在，而从心电图监视器的荧屏上显示出来的心跳也是那样地富有力度……她清晰地意识到，他应该回到他的母亲、女儿和妻子身边……

“为什么不可以把光南移到他们医院的国际急救中心去抢救呀？”如丁急切地向有关医护人员询问，“那里有世界一流的服务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我们去问问。”对方淡淡地答道。

但终究没有答复。

如丁给有关部门的有关领导去电话，并再次请求有关医护人员，希望把光南转入高干病房。

但是，有关部门的领导似乎无能为力。

“病人的病情不允许移动。”医护人员回答。

“既然不许移动，那怎么能够从地下室移上来呀？”如丁疑惑不解。

医护人员无以对答。

“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这里是脑外科病房，有关的治疗设备均在这里。”医护人员终于找到了一条理由。

“照这样说，那高干病房的脑科病人也得到这里治疗啦？”

“……”

再询问国际急救中心，答案便开始明朗化了：“现在急救中心没有床位。即使有床位，也进不了……”

急救中心，每个病人一天必须支付的医疗费据说高达700元！什么部门来承担这巨额费用？

“说句实话吧，进不了高干病房和急救中心，原因只有一条。”有人终于说真话了，“级别不够”。

这是个多么简陋的病房呀。每位病人的床位之间只用一面宽幅的白布隔着。这也就算是一间“单人病房”了。光南病床的旁边是一位不知名的老人，陪住的家属夜里只能坐在一把凳子上打盹休息；一切服务简陋又不方便；因为病床多，探望的人多等等，处处显得那样杂乱拥挤……著名的音乐家确实实地“享受”着平

民百姓一样的待遇！

望着丈夫平静而又安详的面容，音乐家的妻子如丁泪眼模糊，不禁想起了她们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

奇特的求婚者

洪如丁的父亲洪丝丝在中国新闻社任专稿部主任。正巧施光南的姑姑也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与洪主任是同事，常有往来。一天，光南的姑妈到洪主任家中串门。

“这位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光南的姑妈看到台玻璃板下放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赞赏地问道。

“我的女儿。”洪丝丝的夫人说。

“在哪工作呀？”

“还在天津大学的精密仪器系读书。”

“有对象了吗？”

“没哪。”

“正巧，我有一个侄子也在天津工作，他是搞作曲的，在天津歌舞团。”

在光南姑妈的建议下，两家的长辈都有意为两位年轻人捏合捏合。

这是1970年。如丁25岁。光南31岁。

如丁的妈妈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如丁。

“都31岁啦，还没有对象？还没结婚？要不就是有怪僻，要不就是失恋过！”听了妈妈传过来的话，如丁琢磨了一下，快人快语地推测道。

“你不要胡说。”如丁的妈妈赶快解释道，“听他姑妈说，他很正直，很正派！”

“哼！歌舞团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他会没谈过女朋友？不相信。”如丁进一步研究后，又得出了一个结论，“要不就是特别傲气，什么人也瞧不上。”

说到这里，如丁倒是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了！

她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读书4年，有多少男同学追求她，情书不断，什么蜜语甜言她没听过？可她就是一个也瞧不上……她有一种与一般女孩那种逆反的奇怪心理：被动地被追求实在没意思，不吸引人；自己为对

方吸引了，主动去追求，那才有味儿！因此，在她心里想：我倒是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搞作曲的，看他有多傲气？

“我讨厌被人介绍来介绍去的。”如丁告诉妈妈，“你们不用管了，让我自己来想办法接触他……”

按姑妈给的地址，有一天，如丁便到歌舞团去找施光南。借口是托他捎东西到北京，因为那时如丁还在大学读书，最后一年级，她的经济力量有限，不能常回北京老家；而光南早工作了，有工资，常回北京家。

如丁还从妈妈那里得知，这个施光南就是《五好红花寄回家》的那首歌的作曲者。这支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是如丁最爱听爱唱的歌。她原以为写这首歌曲的是一个老头子，不料竟是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心中自然产生了一种敬慕。

到得宿舍门口，托人捎话进去。施光南赶出门来迎接。

姑娘见他的第一个印象，是瘦瘦的高个头，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还算厚道朴实。她心想，对方总该请她进屋去坐坐。不料人家竟在那里傻站着，默不说话。

“你每星期都回北京吗？”姑娘只好先开腔。

“是的。”光南规规矩矩地回答。

“请你帮我带一包东西回北京，让你姑妈转给我爸。”

“好的。”他赶忙把东西接手里来。

再就没话说了，彼此傻站着。

“你们这里最近有什么演出呀？”姑娘又主动找话说。

“有呀，马上就有一个演出。”这回，光南的话开始多起来了，“还有我的一个作品。到时我给你留票请你去看好吗？”

“好的。”姑娘虽然学的理工科，但喜欢音乐，特别爱听音乐会，爱听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等国外名曲……

又没话了。

姑娘琢磨着他也许会请她一起出去走走，或请她出去吃顿饭……因为一般来说，未婚的男子见到漂亮的姑娘，都巴不得有机会和她多呆一会儿，多巴结巴结，何况双方的家长肯定都想介绍他和她的事告诉了对方……可光南和别人不同，纹丝不动，还装着不知有这么回事似的！如丁心里有些儿不悦，心想大概他瞧不上自己。哼！太傲气啦！有多少男子在追求她哩！可他却无动于衷，傻瓜一个！她在宿舍门口被“晾”了大半天，便怏怏不乐地走了，可脸上还装着没事的样子，她也表现出根本不





知道要介绍他们谈对象的事一样！

过了几天，如丁果然接着光南请她去听音乐会的电话。她自然很高兴。

他陪着她坐在靠近舞台的前排座位上。音乐会开始和进行中，不时有人过来和光南打招呼，目的自然是找借口顺便瞄了瞄洪如丁几眼，还有，舞台边上，也不断有人擦幕布，往台下向如丁瞅几眼……如丁慢慢觉察到他们团里的同事已经在注意他俩了……可光南不动声色。于是如丁也就不动声色。她才不在乎呢！

舞台上演到了光南的作品《上前方之路》。那是为舞蹈配的曲子，写越南人民抗美援朝上前方的故事。曲调极为抒情，极为优美，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唱的。

“你写的曲子不错嘛！”如丁赞扬道。

“是吗？”光南的眼睛亮了。

“这么好听的曲子是怎样写出来的呀？”如丁开始崇拜作曲家了。

“今晚只演出片断。你有兴趣，可以到团里来，我为你弹奏全曲……”

姑娘去了。可他一见到她，除了为她弹奏曲子，又是谈他的曲子，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她觉得有些受到冷落，觉得他这个男子好象只对曲调感兴趣，对漂亮

的姑娘不感兴趣……

据她了解，也的确如此。在歌舞团里，主动追求光南的漂亮演员话说并不少，可他从不理睬人家，实在够傲气的！如丁又气又不甘心。奇怪得很，他越是对她“不感兴趣”，可她越是觉得他“神秘”，非要窥探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从而他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有一回，她去他那里玩。他正在写一部新的歌曲，是一首二重唱曲子。

“你会唱歌吗？”光南问。

“唱得不好。”

于是，他弹琴伴奏，她站在琴边歌唱。两人合作得极为默契动情……如丁一边唱着歌，一边从光南的肩膀上侧面凝视着作曲家那深沉丰富的脸部表情，她的心被拨动了，她为他动情了……音乐，一种情感交流的最好媒介，使她进入了一个美妙的意境……她更加崇拜他了。顿时，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她……可他却似乎又没有什么反应……

奇怪得很，光南与如丁已经来往接触相当长的时间了，可他从来也没有什么表示，而且从来都不评论评价如丁如何？例如，长得怎样？漂亮不漂亮？迷人不迷人？性情又如何？还有，他对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俩的约会地点主要在海河边上。每回约会，都是如丁等光南，这又是一种反常。一般，男女青年恋爱约会，总是男的等女的！

“对不起，我正在写曲子。一节没写完停不下来的……一停下来，下一回再接上去创作，就再也找不到那个灵感了……”这是他每回约会迟到时的最充足的理由，也是叫如丁没法生气而被征服的原因。

“你这个人呀，也只有遇我这样的女孩子。要是别的女孩子，早气跑了，那会像我这样，总站在这海河边傻等呀？”如丁又疼爱又可气地数落他。

可他似乎没听进去，也不当回事。如丁抱怨后，削个苹果递过去，他客气一声都没有，接过去往嘴边一送，便沙啦沙啦地咀嚼起来，好象刚才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

1971年夏天，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到北戴河度假。组织上派施光南和另一位芭蕾舞家到北戴河陪客。让那个舞蹈家教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学芭蕾舞，而让施光南帮助亲王谱曲子……当时，中国传唱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几首曲子，实际上是光南协助写出来的……

“你到北戴河给我写信吗？”他出发之前，如丁问他。

“当然。”他回答。

他果然遵守诺言，写来了几封信。可每封信上写的全是谈他的创作，没有只言片语是表示对如丁的情感文字……

后来，光南下乡去拉练，给如丁写回来的信又是另一种格调，全是讲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他从不说一句爱她的话。当面不好意思说？难道信上也不敢写吗？这真是叫她哭笑不得，叫她捉摸不定！

“他到底爱我吗？”如丁时常这样问自己，真不知道前面的爱情之路她该怎样继续走下去，“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再主动，总不能……”

这个男人的心呀，真叫人猜不透！

1971年阴历8月15日中秋节，光南和如丁是在北京过的。他大老远地骑着自行车，跑去探望如丁和她父母。如丁想，今天是中秋节，他要来，肯定得买些月饼，向未来的岳父岳母献

殷勤的！可是完全出她所料，他压根儿就没想到“月饼”两个字，更不会专门跑去买月饼了。他带来了三样东西：一座柬埔寨民主战士的雕像；一张录制他的作品的唱片；一块写着“中柬人民友谊万岁”金字的金牌。

“他送这些东西来，算什么意思呀？”如丁莫名其妙，疑惑不解，悄声问她妈。

“大概是表示他的成绩吧？”如丁的妈妈猜测道。

大家在一起聚了聚，吃过饭后，光南要走了。

“这张唱片送你们。”光南拿起那张唱片，对如丁一家人说，“上面录的是我的作品，请提意见……”

他说话的口气神态，跟对一般朋友那样……

接着，他把金牌和雕像收拾好后顺手带走了……看样子，因为他觉得雕像上有西哈努克赠送他时的签名题字，得留下自己作纪念；而金牌呢？送给如丁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拿出来展览展览，便随即收回入库……

如丁又一次哭笑不得！

可如丁的父母倒有不同的评论。

“看得出，他真是那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青年！”妈妈对女儿说，“你碰到这样的男孩子，实在是福气。这真是个不错的人！”

如丁更崇拜他，更觉得他神秘莫测了……

他们之间照旧你来我往。每回见面，他还是一味地谈他的曲子，谈他的创作；而如丁还是耐心地听着他那冗长的演讲，那种有时叫人兴奋有趣的，有时又令人枯燥乏味厌烦的演讲……

如丁有时觉得，自己都快没感觉了，似乎麻木了……

已经交往一年半多的时间了，仍然不见分晓！怎么办呀？能有什么办法呀？如丁自问自答道。等着呗，不管怎样，终究总会有个结局吧？！

1972年元旦。光南带着如丁到他姑妈家去做客，也算是如丁去探望探望她老人家。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姑妈突然当着他们两人的面这样问道。

这个突然袭击，如丁怎么也没有想到！

“春节。”光南回答得极快极顺口。

这更叫如丁惊讶，料想不到！

在姑妈家。她没好意思问他，只好打哈哈，敷衍应付过去。心想，出去再跟他算帐！

“请问，你春节跟谁结婚呀？”一出姑妈家，如丁便直接了当地责问光南。

“跟你结婚呀！”光南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跟你结婚呀？”

“这不是？我们早就好了嘛。”

“这算结什么婚呀？你跟谁求婚了没有？”

“还用求婚？”如丁没有料到她的这一问，竟然引出了光南的一大篇独特的“恋爱求婚”理论，“我和你好了这么久，交往这么久，就是打算要同你结婚的……如果不是要同你结婚，我干吗要跟你来往？跟你在一起呀？……难道你就不知道？我写的好多曲子，好多好多优美的曲子，都是为你写的！都是我对你的情感的流露……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我大声喊我爱你吗？还要什么正式的求婚仪式吗……”

这个长篇演讲，完全把姑娘的心彻底征服了！她还有什么话说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带有点“强权主义”的男子汉，只懂得用行动来爱来求婚，不晓得用话语来爱来求婚！真是个奇特的求婚者。

夫妻情依依

光南与如丁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尽管他们两人学的专业从事的业务相距较大较远，但心里是相通的……

光南创作的歌曲，不少作品的第一位听众或试唱者就是妻子，有时也有女儿蕾蕾。别以为洪如丁只是理工方面的专家，但她还是音乐艺术方面的爱好者，而且是有极高的鉴赏能力的。每每丈夫创作完一首曲子，向她征求意见时，她的鉴定多数是很准确的。她说，“这首曲子群众一定喜欢”，“一定会打响”！那么这首曲子便会广为流传的。例如，《打起手鼓唱起歌》、

《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都是首先为妻子所欣赏的。

有时，他们之间也难免有点矛盾，但他们自会进行“内部调整”，很快便协调了……

“你要是娶个歌唱家当老婆，也许会合作得更顺些……”有时个性坦率的如丁会有意逗着他说道。

“不见得，要是有个歌唱家的老婆，我可能早就厌倦了……”光南也幽默地说，“有一定的距离，才能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才会总是有新鲜感……对不对？”

“这么说，你没有后悔？”

“永不！”

“……”

光南是那样地爱着他的妻子，在不少事情上，他都主动为如丁着想，竭力关心照顾她。他虽是个大艺术家，但在家里常常是个重体力劳动者。什么扛粮食，扛东西等重活、粗活，多半他都抢着干，尽管有时干得不漂亮，但心意到了，妻子自然极为领情。当然，家中仅有的一间装饰过的房间——客厅兼他的琴房的壁纸，全是他自己动手一张张地贴上去的。谁能想到，一个音乐家竟也学会了装饰房间的手艺……

妻子在一家合资公司工作，业务繁忙，上班工作极为紧张劳累，光南常会主动多承担些家务。早上起床后，光南常常主动帮助叠被子、擦桌子、扫地，抢着做一些非“技术性”的杂活儿……

洪如丁是个工程师，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努力自学深造英语……光南十分支持她。业余时间，妻子喜欢艺术，喜欢跳舞。可光南偏偏不会跳舞，不喜欢跳舞。说来也奇怪，作为音乐家，有那么强的乐感、节奏感，居然会是不会跳舞的人？看来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他不愿把心思和时间投放到这上面去！

“能把光南拉上舞场的人，定能力挽乾坤……”光南的朋友晓光曾经开玩笑说道。

可光南很理解和支持妻子的跳舞爱好。一回，民航局邀请中国音协的同志们去参加舞会。光南自然是去不了的。

“请你多招呼一下如丁，多陪她跳一会舞……”他特地给晓光同志去

了个电话,用近乎恳求的口气嘱咐晓光道。春节快到了,光南希望多为妻子增添些欢快……

光南对妻子的情感是那样地诚挚纯真。有一回,南下广州演出时,光南很想为妻子买点什么礼物回来,可不知买什么好。因此,他便抽空跟着一些女演员上街转去,观察人家到底都买什么……后来,他学人家的样子,高高兴兴地买回来一些尼龙丝袜子和一盒进口化妆品。

“瞧你!这种袜子我已有不少了……”心直口快的如丁一时没有注意到光南的一片情意,无意地数落道,“这盒化妆品多少钱呀?”

“80元。”

“那么便宜?别是伪劣产品呀?”妻子开玩笑道。

“不会的。是水货。”光南认真解释道,“好多演员都买哩。关牧村都买啦!”

“可看样子不怎么样……能用吗?”

“这个——”光南的积极性一下子降到了零度……

“得得,我这是说着玩的。”妻子发现自己的过失,立时改口,高兴地说:“这太好了!我正需要呢!”

“是呀?那我算是买对了!”光南的心态旋即跟着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像个被夸奖而高兴万分的孩子那样……

还有一回,光南到广州出差,到华侨农场参观。

“为阿丁买点什么回去呢?”他征求身边的朋友道。

“买些柠檬嘛。”晓光说,“如丁不是爱吃这种水果吗?”

“对对!”

光南一听,兴奋地拍着手跳了起来,如同孩子一般。

从广州临出发回京的那天早上,大家到处找光南,发现他突然“失踪”了……

当大家正在着急时,他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他特地赶到街上去买了好几只菠萝。

“这是干什么呀?”有人不理解道。

“给如丁买的。”光南照直地回答。

“你真是死心眼,这东西死沉沉

沉的。”

“如丁喜欢呀!”光南认真地说。

他回到北京那天。他们家的那栋高楼正好停电,电梯停开了。他扛着沉甸甸的一大包水果和一包行李,爬了七层楼的楼梯……

“阿丁,你看我给你买回来什么啦?”一进门,他便高声地叫嚷道,“你快来看呀!”

“这回,你可买到我心上了!”如丁一看是柠檬和菠萝,一下子也高兴活跃了起来。“我最爱吃这种水果……”

光南到日本访问时,精心地为妻子挑选买回了一只水晶石胸针……

1990年3月份,光南访问巴基斯坦时,又为妻子特地挑选购买了一块名为“星光灿烂”的项练宝石……巴基斯坦盛产宝石。这自然是极为宝贵的礼物。但是,不想那里的做工实在不怎样。回国没几天,那宝石没镶牢固,便从项练上掉了下来。

“我马上送到使馆去,托人捎回巴基斯坦去修。”光南说。

“送回去修,说不定会修理好,说不定修回来不久,又会掉的。”如丁说,“还不如在国内找人修理。我认识友谊商店的师傅,我去求他帮帮忙。”

“这样更好,还省事。”

不想,这块宝石送去修没几天,光南突然脑溢血……他还来不及看一眼那他从远方为妻子买回来的已经重新修好了的闪光的宝石……

光南平时再忙再累,也常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关注他的女儿。他发现女儿有歌唱天才,便着手设计培养女儿成为未来的音乐家的蓝图。他创作《屈原》这部大型歌剧后,时常孜孜不倦地耐心教女儿演唱其中的片断,直到他临终的时刻……

有一年夏天,他特地抽时间陪女儿到一个农场去玩。他整天和女儿一起去游泳,钓鱼,摸虾;一起啃老玉米……当女儿钓起一只小鱼时,光南便会情不自禁地又鼓掌,又喝采。

“这个时刻,光南的兴奋程度,实不亚于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赶路去买到了两张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洛蒂演唱会入场券时的喜悦心情……”同去的朋友晓光描绘道。

你走得太早,太早了

中央乐团、文化部、全国青联和洪如丁单位的领导及同志们,还有音乐界的同事好友们,都那样真挚地关注着光南同志的病情,都自动赶到医院来排班轮流看护他……

光南的病榻上,妻子一直为他放着一只小录音机,轻轻地为他播送着他创作的优美的曲子。亲人们是多么希望他能够听到这温馨的音乐,希望他……

光南昏迷不省的日子里,晓光、王立平、王世光、王酩、凯传等音乐界同事朋友,都不时前来看望这位少有的音乐天才。大家只有在这里默默地流泪,祈祷……

晓光夫妇从冰箱里取出来两只黄澄澄的柠檬,送到光南的病榻前。

柠檬,是光南爱吃的水果。这些柠檬是去年他们南下到广州开音乐会时,被人邀请到一个风景区旅游中采摘的。

那天,在返回广州的半路上,经过北回归线的塔碑时,夕阳西沉,已近黄昏。

“给你们拍几张照片吧。”同行的晓光夫人杨羊对光南晓光两个男子汉说,“晚霞的景色多美呀!”

回京后,杨羊把洗印出来的照片送给光南。

“一个高塔,一个夕阳,一个光南。”光南瞧着诗意极浓的画面,感慨地对晓光说,“这是杨羊的杰作。就命题为《最后的夕阳》吧。”

想起光南当时的这个命题,在病榻前端详着音乐家谧静的脸庞,晓光夫妇不禁伤感起来:难道真的是“夕阳”到来的时刻了吗?

上帝实在太不公平,太无情了!5月2日,施光南终究还是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抛留下他的事业,他的亲人,他的同事好友……

音乐家走了。

可是音乐家创作出的那些优美旋律将每天每天,与太阳一起升起,与月亮一同回归……

(责任编辑 晓渡)



苏

巴

什

落日

○肖复兴

到库车，正赶上赶巴扎，满城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库车是新疆第二大县，气度不同寻常，恐怕与它的悠久历史有关。库车一带原是古龟兹国旧址，龟兹乃西域 36 国中强国之一。因此，虽岁月流逝，风沙剥蚀，龟兹古国遗风遗迹仍然斑驳依依可寻。

泥鳅钻沙般，车子钻出热闹拥挤的库车县城大约 20 公里；树木越来越少以至最后杳无一株，沙石越来越大以至褐色的山丘赫然目前，便可看见天山山麓下绵延不断的山脉上匍匐着一道道残缺不全的城墙和城郭。山是黄色的，城也是黄色的，二者浑为一体，苍茫浑厚让人感到历史可触可摸沉甸甸的托浮在天地之间。山起伏着犹如游龙扑展展伸向远方，城墙也随之蜿蜒起伏着，风无遮无拦尽情吹拂着，这一道道断壁残垣便真的随风翩跹如同富有了生命力一样。

这就是苏巴什古城遗址。

新疆有许多古城遗址，比如交河古城、高昌古城、楼兰古城、轮台古城、博乐古城、博格达沁古城、通古斯巴古城、央达克沁古城……每一处都可以伸出一串长长的历史故事或传说。苏巴什古城同它们一样，不假雕饰，甚至显得颓败不堪地矗立在这片荒寂的土地上。它却让人不得不心头发紧发沉，思绪飘摇而肃穆景仰不

止。这是同观赏那些雕梁画栋油饰一新，或者古迹早已荡然无存却偏要平地起高楼赝品冒充历史遗迹，比如黄鹤楼、滕王阁、狮子楼……无法同日而语的。

苏巴什是维吾尔族语。“苏”意为河，“巴什”意为头。苏巴什即为河之源头。就在古城城下，相传是西游记中猪八戒洗澡时怀了孕的子母河。一脉河水汨汨而下，清乃发绿，是大都市中经过漂白过滤甚至磁化的自来水都断然流不出的颜色。它是天山积雪融化而流淌下来。当年就是靠着它，使得龟兹人有了生命之源，才在这四周一片亘古戈壁中生存、繁衍至今。如今，河水被砌得整整齐齐的石堤围拦，如同规矩矩放学归家的小学生，齐步唱着欢快的歌流下山去。河水中似乎还流淌着龟兹人的古韵悠悠，相传当年龟兹人的歌声是相当粗犷动听的，大约可与当今的摇滚劲歌相媲美。

方圆几十里处处可见残垣颓壁，每段残墙，每一片瓦砾，都诉说着一个埋藏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老心事。这里除了山脚下立着一块标明苏巴什古城地的长方形石碑之外，无一样现代化的装置，甚至连一个遮挡阳光供人小憩的凉棚都没有。有的只是这山这墙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

滩。与大都市灯红酒绿大厦摩天相比，这里原始的粗犷，更让人荡涤了心胸，感受到与大自然的相通，与历史的接近。

正是落日熔金的黄昏，我登上了最高的城郭。据说这里原是当年龟兹国的王宫，不知是否带有演绎色彩，年代久远，已无法核实。正面原有一溜石阶供王官贵人拾级而上，现已风化为一片黄土，陡陡的，斧削一般壁立着。人们在宫后另修了台阶，斗曲蛇弯，攀援而上。依稀尚可看到宫门，土黄土黄颓败着，很难想象当年的辉煌。不过，这倚山而造的格局，平眺万里的气势，依然流泻着当年的气度非凡。周围宫墙已高低不平、参差不齐，但镶嵌在里面大大小小的石子依然如亮眼睛一样注视着，默默无语，却渴望与你攀谈。四周山色，一鞭残阳，伏墙远望，其它所有残墙断壁均奔到眼底，一览无余。落日把每一道墙都镀得金碧辉煌。

站在这里，临风眺望，我独想一人。那便是汉代西域都护班超！千里迢迢奔赴这里，就为寻他而来。他曾就在那一片逶迤残墙之中，会在此刻向我走来吗？拂去悠悠岁月的风尘，敞开额冠博带，向我伸出他那被西域风霜雕刻成木雕一般皱纹纵横的大手与我相握吗？

龟兹国为西域强国，与汉人原也相亲和睦。史书记载：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曾娶汉解忧公主之女为妻，算起来比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还要早七百年。汉武帝时西域三十六国归顺汉朝，龟兹国自乐也融融，国泰民安。只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后，西域三十六国分裂为五十五国，相互之间残杀，北匈奴又利用并驱使他们进犯中原，一时战乱绵延，闹得这里大白天都要紧关城门。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投笔从戎的班超仅带三十六人出使西域。一介书生，独闯异域，指点江山，面对刀光剑影从容不迫又智勇双全，制服这大小55国，该是何等威武，又是何等危险！且不说军情如火，敌寇如云，只看这塞外恶劣环境就够他消受的了！岑参诗“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便是抒写这一带令人生畏的天气。那些只会在内陆地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人，如何品尝得了这大漠风飞、

瀚海凌风！国家危难、动荡之际，需要的正是班超这样万难不屈的人直面人生与世界。试想当初班超依然只是给人抄书苟延残喘谋生，该是何等模样？文人是世上无用的，尤其是面对强悍的世界！班超不是文人，只是文人的一腔秀气成全了他、辅佐了他！

想当年，龟兹国曾凛凛然固一世之雄，龟兹王建曾攻破疏勒国杀死疏勒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王，占据西域北路，就在这一片古城之下横挡着班超南征之路。在这莽莽苍苍的瀚海戈壁，班超曾与龟兹国有过一场闻名遐迩的大战。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率兵2万5攻莎车国，龟兹王征兵5万支援莎车。如何以少胜多？班超开会决定撤兵。侍候会议的一龟兹战俘闻讯逃跑连夜乘报龟兹王。龟兹王亲率1万将士伏击撤兵的班超，奈何空等一夜到天明，万星垂落时分，班超早已连夜占领了莎车。战俘逃跑，正是班超欲擒故纵、调虎离山之计！此大战使班超威震西域，两年之后，龟兹国便投降臣服。这一年，和帝下诏，拜班超为西域都护，使得他与张骞成为西域双星高照的人物！

我站在龟兹城临风怀想，不仅仅是金戈铁马中的班超。英勇威武且智慧不凡的大将并不只他一人。面对敌人，看得见摸得着。最怕是背后有人捅上一刀，还笑颜逐开。自古忠臣难逃此劫难，亦可谓特产之一。汉将卫侯李邑到西域，在是护送乌孙国使者从南道绕葱岭回国，刚到了闻时正赶上龟兹攻打疏勒，先兀自闻风丧胆，班师回朝。自己畏，退缩不说，反倒诋毁班超，上疏皇帝班超拥妻抱子不顾国家徒享安乐云云……班超不知如何辩解，虽拥有千兵万卒满腔热血，难抵小人一封纸书！班超最后竟如此毅然与妻子离婚以示清白无辜。细想当初，那女子好生可怜也实在可敬，为了班超，亦为西域，该是做出何等牺牲。而班超实属不敬难道不亦可怜吗？当然，汉章帝还算是位头脑清明之人，为之感动下诏书命李邑到班超手下听令，或许多少能给班超和世人一些安慰。班超之所以是班超，在于遭人馋言诬陷之后并未给李邑一双西域小鞋，而是派他送乌孙侍子回洛阳，公差私顾，与家人团聚。可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心胸宽阔如眼

前平沙莽莽黄入云的戈壁，才使得班超如天一样巍巍永立。现在，人们记住了班超，谁还会想到当年有个叫李邑的小人呢？难怪当初章帝唤班超回朝时，于闐百姓夹道痛哭拦马相留，疏勒都尉甚至当场拔剑自刍以示不忍班超离去之情！古人的慷慨悲壮，真是现今抹拭眼泪的方巾手帕难以相比。一个人活到这份上，壮怀激烈，清白剔透，也算是真大丈夫，不枉白活一生！

班超永远是我心目中西域的英雄。没有班超，便难有西域日后的生产和发展。我在库车县文物馆展览厅中见到一具龟兹女子与一男婴的尸首骨架以及棺槨，是近年才从苏巴什古城佛塔旁出土的文物。那女子头骨扁平，有古龟兹“以木压头”之痕，这是当时美的标志。她身着的绿裙保存完好，裙上的花纹清晰可见，依然可以与现在维族或柯尔克孜族妇女裙子上的图案找到姻缘关系。那男孩头戴木雕龙头，木纹灼然。棺槨因这里天气干燥竟历经如此年代竟没有完全腐蚀，上面印着天蓝色几何图形、朱砂红色的吉祥花样……这些足可显出自班超平定西域之后这里繁荣与发达。班超在西域整整三十年，待他于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回到洛阳时，年龄已经七十一岁。这一年九月，班超病故。我想大约是西域风霜习以为常，而内地的柳暗花明却享受不了。实在是西域情深难舍他而去呢？还是这本来就是班超悲怆的人生？……

我走下古城，回首一望，心里充满留恋。这里由于荒凉且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光顾。即使到库车来的人，大多也只是看克孜尔杂哈千佛洞。班超的魂灵在这里飘弋了整整一千九百年。他是孤独的、寂寞的。他只能与这一片古城又一片古城相伴。但我想即使有一天，苏巴什古城，以及班超曾经走过的西域疆土上所有的古城一座座全部被风化石化殆尽，班超也会永远屹立在这群山万壑之间！

大红灯笼般的落日迟迟不肯落下去，就那么久久地衔在古城墙的断壁残垣之间，万道金辉瀑布一样流泻着。这一刻，我体味到杜少陵诗“落日心犹壮”的悲壮深邃的意境；这一刻，苏巴什古城像燃着了红红而炽烈的火……

[责任编辑 晓渡]

中共 党史 争鸣 掇英

麦阳 辑

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是被撤销的吗？

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由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致使大革命失败，他因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对此党史界传统的说法是在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党的总书记职务。近年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八七”会议的文件没有关于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处分决定，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决议都集中在政治上对其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涉及他的职务问题，只是在选举时自然落选了。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之前就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27年7月11日在汉口举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辞职要求（陈未到会），从此他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以代替陈独秀领导中央工作。陈独秀本人的说法也印证了他是辞职的观点。陈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

日本投降有无条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军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历来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及社会科学工具书等都说日本投降是无条件的，近年有些论者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制”。根据的史实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于1945年8月9日上午10时半在特宫防空洞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否有条件的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讨论中，以东乡外相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在维护日本国体即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接受公告。下午2时半，内阁举行了例会讨论是立即投降还是继续战争的问题，东乡外相再次重申了他的主张。10日上午6时45分，日本外务省分别发报给日本驻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的加赖和冈本两公使，请驻在国政府分别将通过的东乡外相的议案转交美、英、中、苏四国。外相议案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权的要求。”8月13日凌晨2点半，日本驻瑞典大使冈本发回了同盟国复照的背景报告，说明关于天皇制度问题经美、英与苏联交涉折衷，实质上是承认了日本方面的条件。8月14日上午10时，裕仁天皇召开了明治维新以来从无先例的御前会议，最后确定了日本投降的方案。

重庆谈判是谁 首先提议的？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与蒋

介石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是谁首先倡议的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五种说法：

一是蒋介石提议说。认为蒋介石看到和平为人民所希望，而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尚有困难，加之国民党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动摇。慑于和平舆论的压力，考虑到兵力调遣所需要的时间，才有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之举。

二是美国提议说。认为美国基于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迫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中国内战的压力，在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的同时，也希望蒋介石进行谈判，企图用“和平协商”的方法遏制共产党，于是蒋介石在美国导演之下打出“和谈”的幌子。

三是赫尔利提议说。认为通过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直接谈判以解决国共矛盾的设想，最初是由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提出的。1944年9月赫尔利奉命使华，他力促国共谈判主要是抗战后期调处国共矛盾方针的延续。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字，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终于公之于世，赫尔利认为很有把握用政治手段迫使中共妥协，即建议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谈判。

四是政学系提议说。认为邀请中共谈判的主意是政学系出的。迫于国内人民、中间势力和各民主党派纷纷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的献计，意在用软的手段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五是吴鼎昌提议说。论者认为蒋介石是在美国的授意下，采纳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邀其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

斯大林劝阻过解放 大军过长江吗？

许久以来，党内有一个传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米高扬跑到西柏坡，转达斯大林口信，劝我军不要过长江，同国民党划江而治，搞南北朝。对此传说，许多人半信半疑。在斯大林是否劝阻过解放大军过长江的问题上，党史界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争论不下。

持肯定态度的人主要的依据是：（一）《司徒雷登日记》曾记载1949年

1月4日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二）毛泽东不止一次讲到过。1949年3月下旬他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说过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三）1955年1月，周恩来同即将赴苏任驻苏大使的刘晓谈到，米高扬到西柏坡是代表斯大林来的，苏联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刘晓也回忆1957年8月在朝鲜驻苏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米高扬也曾为他那次当说客的中国之行表示歉意。（四）米高扬之子塞戈·米高扬表示相信他父亲确实携带了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警告。（五）法国外交部收藏的档案披露，其《时代周刊》外事部主任唐纳曾从可靠来源得到消息，1949年俄国人干预中共，建议他们沿长江停止，把胜利限制在中国北半部。

持否定观点的人所持的理由是：（一）据师哲回忆，米高扬一到西柏坡就声明他是“带着耳朵来的”，没有捎带口信。（二）斯大林在1948年2月召开苏共、保共、南共三党会议时已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就不可能到1949年初中共胜利在望时劝阻其与蒋介石和谈。（三）斯大林拒绝李宗仁发出的调解国共内战的建议，并把国民党的备忘录转告毛泽东，更把苏联给国民党的复文给中共看并征求其意见，这表明他是尊重中共意见的。（四）1949年元旦，毛泽东已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且内部也向苏联作了通报，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即使担心美国干涉，也难以再启口要中国搞“南北朝”。（五）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未谈过斯大林劝阻解放军渡长江，制造“南北朝”的传说。显然，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还有待有关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掘和争论的进一步展开。



歌星苏小明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人们喜欢这首抒情优美的歌，也喜欢把这支歌唱得清晰动听的苏小明。但今日的苏小明又怎样呢？她的家庭、工作、还有学习……

的斑斓世界

○陈大鵬
沉石

1991年的夏天，苏小明从法国电视上知道了中国南方遭受水灾，她坐不住了，当她得知北京文艺界举行义演支援灾区的消息时，与陈佩斯通过电话后，立即决定自费回北京参加赈灾义演，她放下手里的活，便匆匆乘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临上飞机前，他爱人艾瑞克嘱咐她，你唱《军港之夜》，中国观众会喜欢的，这是我抄写的歌词，你在飞机上还可以背一背。小明深情的和丈夫吻别。

飞机在云海里飞行，苏小明望着舷窗外的云海。出国已6年了，九十年代的观众还喜欢《军港之夜》吗。赈灾义演能打动观众吗？

小明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刚下飞机，就被北京电台《周日综艺》特别文艺节目组接到了直播室。小明十分清楚，这可是北京电台周日最受听众欢迎的特别节目，而且是现场直播，设有热线电话，听众可以直接提问。目前国内听众口味变了，要是面对直播提出一些别的问题怎么办？

当现场直播主持人张树荣宣布，

今天请来的客人是从巴黎回北京刚下飞机的苏小明时,即刻响起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线电话,询问是那样直率热情:“苏小明,我们没有忘记《军港之夜》。”“你什么时候从法国毕业?”“你回国能举办个演唱音乐会吗?”有问生活情况的,有点歌的,还有的想请苏小明签字合影的……整整两个小时,电话没断过,仿佛一股股热浪涌进了苏小明的血液。主持人张树荣更是激动,他主持过多少《周日综艺》节目,可从来没有像这般热闹过。

苏小明被听众那种特殊的厚爱深深感染,她悄悄流下了泪——包含着几分喜悦,但更多的是思考,一种超越自我的思考。

二

苏小明回到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和母亲亲热亲热,就直奔北京市赈灾义演组委会。张百发副市长握着苏小明的手说:“这次赈灾义演,我没有想到你和郑绪岚都从国外回来了。大灾当前,考验人心。首都演艺界此举是一种精神,我相信演出一定会成功。这场晚会将全部售票,包括主席台票,连我自己也要买票观看。”

首都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万名观众群情振奋。五彩的聚光灯和追光灯多彩的光环融为一体,把体育馆的舞台装点得分外绚丽。舞台正中用霓虹灯组成的是一幅中国的版图,中央是闪烁红光的两颗相连的心,霓虹灯缀成了义演晚会主题:“共有的家园”。先由演员合唱主题歌《我们共有家园》,那发自肺腑的心声深深地打动着观众,他们从这一首首歌中看到了一种力量。

随即苏小明上场,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每个音符都含着情和爱。台上香雾涌动,蓝色的追光灯闪烁烁,犹如大海碧波荡漾,一下子把观众带到了大海之中,勾起人们对这首流行歌曲美好的回忆。人们从心里又一次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而且苏小明的演唱自然朴实中又多了些浑厚的真情实感。

散场时,张百发副市长高兴地拍着苏小明的肩说,“没想到你的歌越

唱越好!”

苏小明望着这熟悉的工人体育馆,眼睛湿润了。11年前,也是在这里,北京举行的首届新星音乐会,苏小明胆颤心惊地被人硬推上台,她第一次唱的新歌《军港之夜》轰动了北京观众。她万万没想到,《军港之夜》使她从这里走向全国,成了中国大陆通俗歌曲开创性的歌星,就连红得发紫的邓丽君也感到吃惊,苏小明的录音带在同年竟然大大超出邓丽君的录音带的销售量。

有人说,苏小明凭借一首好歌才有了时运。的确,《军港之夜》曾有许多大歌唱家唱过都达不到小明唱的效果,听众耳朵会挑着呢。

怪吗?一点也不怪。苏小明就是苏小明。

三

苏小明已家喻户晓,海政在全国的名气也大了。说件趣事,有位海政首长与地方一位领导坐一个包厢,这位首长介绍说,我是海政的,那位领导说,就是苏小明那个部队的吧。瞧,这位首长竟成了苏小明部队的了。

提到苏小明到海军,也是件不易的事。苏小明青少年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她母亲苏明,原是总政歌舞团副政委,“三八”式干部,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可怜的小明经常休学,连初中都没有上完。小明懂事早,能理解母亲的心情,虽然不明白当时社会的真伪,但她从艰难困苦中学会了为自己寻找出路。

小明报考别的文工团,都考取了,就因为母亲是“反革命”,都不敢要她。小明跑到人少的地方痛哭了一场。从此,她变得孤独了。

1974年底,她又悄悄地报考海政文工团,不知是机遇还是天赐,苏小明进了海政歌舞团合唱队。这时,小明的母亲也放了出来,平了反。1975年,苏明又担任了总政歌舞团的副政委。

在歌舞团合唱队,除了正常的练声外,还要学习美声。小明头痛的就是美声,练着练着就找借口溜了。有时候指导老师看出了小明的把戏,强迫小明也要把美声练习唱完,小明受不了:“我是直嗓子,不会拐弯,你打

死我也唱不好。”指导老师无可奈何,只好说:“你自己看着办。”

回到家里,母亲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小明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我不学美声,你看我能不能成为歌星,说不定还能唱出独特的风格哩。

母亲也没办法,说:“那你就等着出名吧。”

小明唱了几年合唱,当时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一大堆,压根儿就没有苏小明的份儿。可小明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试图改变自己。

七十年代末,港台通俗歌曲纷纷流行大陆,广大听众对通俗歌曲爱好愈来愈强烈。而大陆却没有几首好的通俗歌曲,更没有听众喜欢的通俗歌星。而邓丽君却成了大陆青年歌迷所崇拜的偶像。

苏小明睡不着了,她几次半夜起来,盯着窗外凝思,母亲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了,小明?

小明不语。几天她在团里很少说话,她开始为自己设计,为自己寻找演唱的机会。

小明找到词作者马金星,非让她为她写歌。小明更喜欢作曲家刘诗召,只要一见面,老远就喊,刘大叔,别忘了为我写歌!要适合我唱的。

那些日子,她似乎消瘦了,也黑多了。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北京市举办首届新星歌手演唱会,在工人体育馆进行。可准备时间不多,小明急了,找团长王建华磨,王团长态度很明确,新星音乐演唱会对每个新手都是平等的机会,况且他也了解苏小明唱通俗的特点,就明确地把任务交给了刘诗召,请抓紧为苏小明写首歌。

刘诗召原打算下部队体验生活,接到马金星送来的歌词《军港之夜》一看,心里的火花被点燃了。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军港之夜的美丽画面。刘诗召是地道的海军作曲家,他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对大海的旋律有独特的韵味。刘诗召采用了闽南渔歌的小调与当代水兵生活有机结合,以抒情纯朴的风格突出军港的夜,从而达到对水兵这一主题的升华。刘诗召对苏小明非常了解。这首歌在谱写时,眼前时常闪现苏小明那特有的演唱风格。写完了这首歌,刘诗召还没来得及再看一遍谱子,更没有来得及找苏小明试唱,第二天一大早,就把

《军港之夜》谱好的曲子交给了王团长，便到旅顺部队体验生活去了。

待刘诗召从旅顺回到团里，刚一进院，就让王团长叫住了：“老刘，祝贺你，你写的《军港之夜》被小明唱出了，反响强烈。”

“是吗？”刘诗召眨着眼，半信半疑，但他对这首歌还是偏爱的。

第二天，刘诗召早早来到体育馆，找个角落悄悄地坐了下来。

舞台灯光渐渐暗下来，一束束蓝色的柔光洒满舞台，霎时，优美的旋律回荡在体育馆，苏小明穿着洁白的海军服，庄重而又大方地走上舞台，伴着乐曲，深情地唱道：“军港的夜啊静悄悄……”第一句刚唱完，全场掌声四起，仿佛大海的潮声在为苏小明伴奏。每一句唱词都是那样轻松纯朴，像是苏小明与观众在述说着军港之夜那美丽动人的景色。一首新歌先后被三次掌声打断，这是不多见的。台下观众不间断地喊道：“苏小明、苏小明……”

刘诗召的眼睛湿润了，他真正感受到了一首优秀歌曲带给观众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歌的处理，小明把握十分准确，尤其是中间部分的朗诵，更增添了诗意，使歌曲抒情雅致。刘诗召也情不自禁为苏小明热烈鼓掌。

刘诗召又为苏小明写了一系列新歌，《海风啊，海风》、《妈妈，我们远航归来》、《可爱的中华》、《幸福不是毛毛雨》等，这些歌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产生广泛影响。1982年和1984年，苏小明录制的两盘磁带销售量达国内最高水平，就连广东、福建等沿海城乡家家户户都在放《军港之夜》。而邓丽君的磁带销售量逐渐下降，人们把通俗歌曲的口味自然地转向了苏小明。

苏小明演唱的台湾校园歌曲，别具风味，轻松自如的演唱风格，吐字真情清晰，给人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此，台湾也知道了有个苏小明，香港也知道了有个苏小明。

四

一首《军港之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歌曲赋予它的内容和价值。八十年代的水兵因而显得格外潇洒浪漫。上海码头的水兵过去上街都不愿穿

水兵服，《军港之夜》使水兵增添了自豪感，穿上水兵服走在大街上胸也挺得高了。青年们向水兵投去羡慕的目光。那个年月纷纷要求当海军的多了。

北海舰队有位水兵分在护卫舰上，出海巡逻时，遇到风浪，军舰在浪峰上颠簸，这位水兵吐出了黄水，逢人就责怪道：“什么军港的夜静悄悄，都把人给颠死了，都怪苏小明唱的那首歌，我才当水兵的。”

可见，苏小明在水兵心中的位置。每当苏小明下部队演出，常常被水兵那真情实感的场面所打动。有一次，苏小明到旅顺演出。当军舰上的水兵得知苏小明要来，都高兴地直蹦。舰上领导最头痛是全舰水兵的头发太长，他们平时说破了嘴皮，总有些调皮捣蛋的水兵不理。舰长便提出要求，要看苏小明的演出，必须军容风纪整齐，头发不合格的，不允许观看。

不到半天，全舰百十号水兵全理了光头。

水兵把苏小明请到军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连炮塔上、舰桥上都站满了水兵。他们请苏小明签字、留影。一位从山东农村入伍的水兵，拿着与苏小明合影的照片，兴奋得两天没睡着觉，他说，我这个水兵没白当，一辈子都值得。

有一次，苏小明刚走进旅顺军港，正赶上—艘威武的军舰驶进港湾，军舰的高音喇叭正放着苏小明的演唱《妈妈；我们远航归来》。苏小明激动得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看着。“军旗呀军旗飘呀飘……妈妈，我们远航归来了……”这时，水兵站在甲板上纷纷朝码头招手，远航归来的情景与那首歌是多么贴切。海风吹拂着水兵蓝色的披肩，海鸥欢叫着盘旋在水兵中间，仿佛迎接辛劳的水兵，又仿佛向水兵传递着陆地上的信息。伴着歌声，舰桥上的信号兵双手飞舞着信号旗，接收的第一个信号是：苏小明在码头。这信息，通过舰长立即传到了各个战位。

军舰—靠码头，苏小明便上了军舰，水兵们穿着还没来得及脱换带有海水的水兵服，立即把苏小明围在了中央，最后苏小明干脆站到军舰的炮塔上，手握话筒，为水兵唱起了盼望

已久的《军港之夜》、《妈妈，我们远航归来》等歌曲。

那位吐出黄水的水兵，紧握着苏小明的手，含着泪说：“我是听了你的歌，才当水兵的，开始我责怪了你，没想到你来到我们舰上演唱，有你这首歌，我就是吐出血来，也要出海远航……”

苏小明每看到这种场面，总是控制不住感动的泪水，她看到她的歌在水兵心中激起波澜，在大海上飘荡万里。每一艘军舰、战舰都有她演唱的磁带，小明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来自水兵的呼唤，她永远属于水兵。

《军港之夜》传到了香港，一位年迈的华侨，专程来到大陆，他携带女儿，非让带他去军港亲眼看看，可是警卫没让他进，这位老人只好站在对面的港岸等到入夜时，静静地观赏着美丽的军港。他让女儿把录音机打开，幽静的夜空中回荡着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那场景与那美妙的旋律，使老人终于领略到了《军港之夜》的风采，老人笑了，陶醉在美妙的夜色之中。据说，这位老人是国民党海军，解放前跑遍了大陆的海岸线，可从没有一座象样的军港。他听到《军港之夜》后，一定要回大陆看一看。老人满足了，他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那样美好。

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在港台大受欢迎。他们喜欢苏小明的演唱，尤其是吐字清晰亲切，使人置于夜色的大海之中，增添几分温馨甘甜的快感。

五

苏小明出了大名，但苏小明还是苏小明。她和她的长相和她的歌—样—朴实可爱。她没有一点歌星的架子，遇到熟悉的人，依然是那副风趣的样，团里上上下下都说，小明压根儿不懂什么是明星。

她的丈夫陈小伟是海政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人非常忠厚老实，琴拉得潇洒自如。陈小伟对小明帮助很大，在小明的演唱上，总是尽心去指导，处理好每个细节。苏小明夫妻的业余生活安排得也丰富多彩，小明唱



歌,小伟伴奏。

小明清楚,小伟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但俩人性格差异太大,一个外向幽默,一个内向深沉。这对苏小明来说,似乎缺少点生活情趣的共鸣。小伟也很爱小明,他有他的生活条理,可反差大了,有时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陌生感。这种潜在的“陌生感”也许是他们最后分手的唯一原因。直到小明出国后,很长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小伟也可出国到小明身边,但并非真正的幸福。他们友好的分手,虽说有几分痛苦,但双方都十分理智。

苏小明非常重视感情,常常念到她与小伟那段美好的时光。记得有一次,苏小明回国到海政歌舞团看望老团长,在酒桌上,小明还提到了小伟,流露出一种昔日的恋情,深情地对大家说:“小伟是个好男人,我欠他的情!”说着,眼睛湿润了。在过去,小明很少有这样激动。尽管小伟后来到了美国,生活得非常好,但人的情感是细腻的。

苏小明追求的是事业和朴实的生活,她的婚变只是一种高层婚姻自然走向。

说到这里,该说说苏小明出国的前后。

《军港之夜》一炮打响,使苏小明走红。苏小明每天都要收到大量来信。有的信封写得非常简单,寄北京

苏小明收,这样的信,苏小明也能收到。

然而,名气归名气,苏小明冷静了许多。有一天,小明听着美国歌星麦当娜演唱的歌曲,渐渐感悟到了什么,半晌,小明的眼睛滞凝着。麦当娜是美国著名的歌星,小明非常崇拜。边听着麦当娜的演唱,小明边心里琢磨,瞧,演唱适度,不过分夸张,浑厚而稳重,高、中、低音区比较一致,用气掌握巧妙,特别是对音调的转折、韵味都演唱得有深度有特色。

小明干脆关掉录音机,不想再听下去,她站在窗前,久久地望着外面。这一切,作母亲的早就看在眼里,猜到了女儿的心思。以前,小明总哼着《军港之夜》,母亲就提示过女儿,孩子,你现在有了名,但应该清醒认识自己。你的艺术功底还需要加强,艺术是无止境的。

小明走到钢琴旁,情不自禁地弹起了她常弹的曲子《秋天的思念》。音符从她的指缝间流出,回荡在室内。母亲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小明的对面听着。

突然,苏小明的手指停住了:“妈,我要出国,我要到法国学习。”

母亲看着女儿没有表态,小明急了:“我还年轻,我需要系统学习。我姐在法国可以帮助我,到巴黎去受高等教育,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孩子,你能想到学习,我支持

你。”“你真是我的好妈妈!”小明激动地把母亲搂着。此时,母亲心里内疚极了,孩子因受她的牵连,文革期间没有很好上学,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盼孩子上学再深造。

苏小明要出国,先是海军方面感到吃惊。海军好不容易出了个苏小明,怎能出国呢,要出国就得脱军装。

团里作不了主,文化部作不了主,请示海政首长同样作不了主。

在同时期,国内的歌星还没有出国的,苏小明也算是开歌星出国的先河。苏小明说得非常清楚,我是海军培养出来的,出国深造是为了尽快提高自己,我还是属于海军。

苏小明的性格很特别,她认定的事非干不可。她连夜找海军首长,把事先想好的理由说了好几遍,并写了书面申请。明智的海军首长终于批准了苏小明的申请。这恐怕在海军史上也是第一次。

苏小明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海军首长致以最后的军礼。她忘不了海军这块蓝色的园地,忘不了热爱她的那些水兵们……。她深情地望着海军大院说了声:“再见了,我还会回来的。”

六

母亲苏明住进了总政干休所。身边的人常常为苏明担心,孩子们都出国了,就剩下老太太独自一人在家,她不怕孤独吗?

苏明这一生值得欣慰的是,她把全部的情和爱都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她的孩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大女儿远远和三女儿愉愉在法国;二女儿蓉蓉在美国;四女儿小宁在香港。唯一在身边的小女儿也走了。每当她拿出女儿们的合影照片时,照片上的五个女儿都朝母亲甜甜地笑着,仿佛她们从心底都在呼唤着:“妈妈!”

苏明不孤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早已习惯了。

文革期间,5个女儿因受她的牵连,都没有上成学,现在孩子们能出国留学,她感到安慰。孩子们常写信和打电话给她,好象孩子们就在身边一样。

有一年,苏明颈部神经做了手术,住进了医院。她躺在床上,望着洁白的病房屋顶,思绪万千……

1938年4月,年仅16岁的苏明从黄土高坡奔向了向往的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她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聆听了毛泽东同志讲课。

东征中,苏明参加了文艺演出队,她们边走边为部队演出。战争的岁月,使苏明逐渐走向成熟,锻炼了她的思想,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然而,“十年动乱”苏明却成了“反革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只有孩子去送饭。苏明看到年少的孩子,心里十分难受。她睡不着吃不下,千方百计为孩子找出路。等孩子送饭时,苏明把写好的纸条藏在饭盒里,为孩子们出路写下了“路标”。

大女儿拿着母亲的亲笔信,找到了沈阳军区的一位副司令,被安排在一个海岛上当了兵。

二女儿也拿着信件,找到了山东省军区的一位首长,当了兵。

三女儿来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插了队。

留下的只有四女儿和五女儿,太小了,实在送不出去了。

苏明寄予孩子一片真情,她希望孩子们有出息。她常教导小明要好好学习,坚持弹钢琴。

苏明平反后,她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们召集在身边,让5个女儿都学钢琴、手风琴、吉它。

苏小明爱玩,轮到她练琴了,总是要花招,报告妈妈,我要上厕所。母亲很严格,要罚一小时。小明只得老老实实地坐到了钢琴旁。

到了周末,苏明家里5个宝贝女儿都回来了。周末家庭晚会,是她们的定点节目。观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她们的母亲。

苏小明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艺活跃的家庭。

苏明给孩子们写信,总要复印5份,把情和爱都倾注在信上。

七

从北京来到法国巴黎,这对苏小明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语言不通,走在街上仿佛置身在另一个世界。在巴黎没人知道苏小明,更没人知道《军港之夜》,她必须像小学生识字,一切从头开始。

法国有着悠久灿烂的民族文。苏小明到了巴黎,最迫切的就是要参

观她所向往的世界文化名胜。

苏小明带着笔记本和相机走访了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凡尔赛宫。

她又沿着马赛,终于看到了著名的雕塑《马赛曲》,看到了《塞纳河》。

苏小明的艺术视野开阔了。她感到了自己太渺小。但她更加意识到重新学习的紧迫感。

她下决心首先攻克语言关。于是,买了一大堆法语课本和学法语录音带,关在家里埋头苦学。姐姐告诉小明,要想学法语,就得到外面去接触群众,才能边实践边学习。这对苏小明太难了点,她不认识人,走在街上像个傻子,但还是硬着头皮走向社会。

苏小明的语言进步很快,她能与法国人简单对话了,可没有工作又怎样维持生活?她只好每天去打工挣钱,生活一度很艰苦。不久,苏小明结识了3个学音乐的留学生,便合谋商量,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开了一个小百货店。

百货店开起来了,苏小明脑子里装的依然是音符,不久小店倒闭了。

苏小明哭了,她面临的困难只有靠她自己去解决,不像在北京,朋友一大帮,办个事容易得多。在巴黎她进的是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这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学习机会,一般的人也很难进到这种音乐学院。为了维持学业,她又找到了一份小小的工作:教华侨子女学唱中国歌,教中国普通话。

一个偶然的机,苏小明参加了一个歌剧协会举办的轻歌剧《微笑的国家》的演出,歌剧的情节是描写法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故事。演出引起法国文艺界的轰动,法国《世界报》用较大版面详细报道了这个歌剧演员的情况,并刊登了演出剧照。

这样一来,在法国各地人们通过报纸,知道这个来自东方的微笑的苏小明。有一天,一位音像公司的老板看了苏小明的演出,非常赞赏,立即让苏小明录了一盘磁带,版权归老板所有,而苏小明得到的是一年半时间的生活费。有了这些钱,苏小明就全心投入了音乐学院的学习。

在5年的高等音乐学院里,苏小明希望能真正学点知识。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享有盛誉,早年中国

的冼星海曾在这里学习过,他的《天涯歌女》受到了欢迎。苏小明刚进这所学府时,她的指导老师茹莱思点《天涯歌女》让苏小明唱,茹莱思对这首歌曲特别感兴趣,因而对苏小明的教学格外关心。老师认为,苏小明的条件不错,但要系统学习美声唱法。

苏小明急了,想起在海政歌舞团学美声老偷懒,进了学府可逃脱不了。

上课是主要的。在这里一切都十分严格,学乐理,视听练耳这是基础。每年要进行两次考试。苏小明对考试看得很重,成绩对学院是很讲究的。有一次考试,校长在场,苏小明有些紧张,点了一首苏小明熟悉的歌,第一段竟然没有唱下来。校长却鼓励道:“别紧张,从头来。”歌唱完了,苏小明心想,这回考试算是砸锅了。没想到晚上公布成绩上竟有苏小明。看来这位校长是注重学生的实际水平。

苏小明喜欢上了美声,她用美声演唱的作品有一定的深度,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好评。

苏小明对世界通俗歌曲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崇拜美国、法国、意大利等歌星的演唱。通俗歌曲在中国还很年轻,与世界高层次的歌星相比还有差距。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在演唱风格上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好的作品,好的歌星是受观众欢迎的。

在苏小明学习期间,法国6家电视台有4家电视台先后邀请苏小明在节目中介绍中国民歌,有的电视台还开辟新的栏目重点播出。法国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密特朗总统的侄子弗特利·密特朗对苏小明进行了专访。苏小明的名字在法国很快被认识了。

法国文化官方要在巴黎著名的开万剧院为苏小明举办音乐会。苏小明没想到中国人也能在巴黎著名的剧院演唱,那天苏小明格外激动,身穿中国民族特有的服装旗袍,一登场,掌声四起。苏小明演唱了中国民歌《四季歌》、《牧歌》,受到观众长时间欢迎。法国音乐界的同行十分欣赏苏小明,并给予很高的赞誉。巴黎一家有名的歌剧院聘请苏小明为领位员,使苏小明月薪超过千法郎。

学习与实践,使苏小明音乐有了

艺术上的升华。苏小明用法语演唱的法国流传很久的歌曲《我不后悔》、《玫瑰的生活》，特别引起法国观众的喜爱，苏小明那朴实的风格中明显多了些美声的演唱技法。

法国的一些大城市，著名港口城市马赛和飞机制造城市吐鲁斯也纷纷邀请苏小明巡回演出。马赛一位著名声乐家评价苏小明，音质雄厚、演唱清新，表现力很强，善于沟通观众。

苏小明为此在法国演唱中国歌曲增加了信心。她把《军港之夜》等歌曲译成法文，在法国演唱，也让法国观众熟悉中国流行的歌曲《军港之夜》。苏小明的愿望是，在法国演唱中国歌曲，让法国人理解、喜欢中国音乐。

八

苏小明在法国6年，除了声乐上有了更深的造诣，在情感上也投入了新的内容。

苏小明与陈小伟解除婚姻后，曾一度痛苦过，小明非常怀念昔日的丈夫，他们有过共同美好的时光。

在法国几年里，苏小明一心扑在学习上，她想用埋头苦读来忘却过去的旧情。她实在不想急于找什么样的对象。在法国有不少的朋友给苏小明介绍对象，有富翁，有相当一级的官员等，苏小明一听压根不想见。对不起，我不是商品，我是人。

然而，知音就是知音。苏小明在法国电视台的演唱，亦吸引一批青年歌迷。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小伙子名叫艾瑞克，他特别喜欢苏小明演唱的歌曲。只要是苏小明唱的歌曲，艾瑞克都收集起来。苏小明巡回演出时，艾瑞克像是丢了魂似的，跟随她到各地。艾瑞克对音乐非常偏爱，而且也能弹唱、作曲。他被苏小明的歌声所陶醉，他成了苏小明最忠实的歌迷。

艾瑞克还处处收集苏小明的各种“情报”，甚至连苏小明喜欢吃什么都知道。当他发现苏小明对自己的印象不错时，立即采取了法国人特有的求婚方式，坦率地向苏小明表白。

真诚与真诚交流，苏小明发现艾瑞克有着文明的修养，直率热情，心地善良，而且事业心也很强。苏小明

的姐姐是理所当然的“审核人”，她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小伙子不错。

艾瑞克幸福地在苏小明的脸上吻了吻，流露出喜庆的神采。

消息传到了北京，母亲苏明看着照片，她相信女儿的眼睛。

1990年7月，苏小明与艾瑞克在巴黎举行了婚礼。母亲苏明专程赶到巴黎为女儿祝福。

婚礼既简单，又热闹。一家人全到齐了，把情感都投入到苏小明的身上。

艾瑞克对苏小明的母亲非常孝敬。母亲笑了，她从艾瑞克的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苏明与艾瑞克的父母相聚后，同样感受到的文明家庭，优良的品德。苏明把艾瑞克拉到身边：你和小明的婚姻我很满意，小明就交给你了。

苏小明有了新家。她这艘漂泊的船，终于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艾瑞克每天早晨起床，边做早餐边用口哨吹着《军港之夜》，在一旁的苏小明总是轻声地哼着那首属于她的歌曲。

艾瑞克爱好广泛，成了苏小明在法国的向导。

苏小明要用法语演唱中国歌曲，艾瑞克逐字逐字地教小明发音。每当小明演唱不准时，艾瑞克就指出，并做示范及时纠正。苏小明深知，中国人唱外国歌，很难超越外国人用母语的演唱，情感也难于表达和抒发。为此，艾瑞克在语言发音上，帮助苏小明过关。

有了艾瑞克，苏小明用法语演唱的中国歌曲很快被法国人所接受，有人称苏小明是天才。其实，这里面有艾瑞克的功劳。

1991年4月，艾瑞克随苏小明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艾瑞克对海政歌舞团非常崇拜，他对苏小明风趣地说：“去看看苏小明升起的地方。”

艾瑞克见到了原海政歌舞团的团长，用中文唱起了《军港之夜》。苏小明的战友们更是忘不了军港之夜的年代。那天，苏小明的家坐满了昔日的战友，有《军港之夜》的词曲作者马金星、刘诗召；有老团长、新团长。

苏小明演唱了《军港之夜》，眼睛里流淌着激动的泪，她永远忘不了，是海军培养了她，中国水兵拥有自豪的《军港之夜》。

“刘大叔，你再给我写首更好的新歌，我要献给90年代的中国水兵。”

刘诗召也激动了，“写、写，希望我们再次合作，唱出第二个军港之夜。”

九

苏小明在北京连续几个晚上的义演，回到母亲身边都很晚了，本想义演完了陪母亲好好聊聊，还是没有兑现。苏小明听说北京组成演出队深入灾区慰问，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义演的队伍，拿着面包和饮料直奔火车站。

在湖北、江浙，苏小明深入灾区巡回演出。当她看到受灾的群众，心里十分难过。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只有通过义演争取经费，为灾区人民献上一颗爱心。

苏小明请了一个星期假回来义演，就奔波了一个星期，跑了几千公里。常常是演完了一场，连饭顾不上吃，又乘车赶下一场。

苏小明瘦了，也黑了。心爱的观众看到了今日的苏小明，不是在电视里，而是在抗洪救灾的大堤上，病房里。苏小明走进受灾的群众中，哪怕几个人，都为他们演唱。点什么歌，苏小明就唱什么歌。人们感动了，这是昔日的苏小明，一点都没变。

苏小明深有感触，她说，只有到人民群众中走走，人的灵魂才是一次真正的洗礼。

返回巴黎的飞机票到手了，苏小明才从无锡回到母亲身边。那一夜，她怎么也难以入睡，她和母亲谈这谈那，总说不上。

多少天来，苏小明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她从音乐师范学院毕业了，她要回国录一盘磁带献给久别的听众，她的艺术之根在祖国，她要把学到的艺术奉献给祖国。她和艾瑞克商定，要回国来展示她的艺术风采。

[责任编辑：刘文]



1988年的秋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奇特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没有哀乐，没有悼词，只是由主持人念了死者的遗嘱。73岁的老作曲家张文纲教授说，在他一生为儿童作的歌曲中，自己最满意的是《我们的田野》，他希望在追悼会上由育英小学的黄牧小朋友唱《我们的田野》为他送别。

一位只有七、八岁的女孩，站在张文纲教授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她端庄、大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泪水。她沉默片刻，然后唱起了：“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歌声宏亮，悠扬，欢快，给人希望……

张文纲教授似乎听到了这美妙的歌声，他静静地躺在灵床上，满头白发，一脸慈祥，嘴角上挂着微笑，谁也不会相信他已经去了，永远地去了。他的灵魂已经离开身躯，仿佛随着歌声一道飞翔在广阔的田野上空。

张文纲老先生虽然走了，可是他留下了美好的歌曲，他将美好、幸福留给了人间。

小牧牧在唱完最后一段：“风吹着森林，像雷一样轰响……”时，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面对躺在灵床上的张文纲老爷爷，眼泪夺眶而出……

牧牧不会忘记，那是1987年，她

作为育英小学演唱队的领唱，参加海淀区的艺术节。

小星星们争奇斗艳，小牧牧虽然以她美好的音质一鸣惊人，然而到底因为声音掌握不好没有取得优胜。在台下众多的听众中，就有老作曲家张文纲教授，小牧牧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到育英小学的老师，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充当演唱队的，特别是黄牧的业务辅导老师。张文纲老先生似乎突然显得年轻了好多，他每个星期好几次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育英小学，倾一生的才华、精力，耐心辅导牧牧，像一个精心的园丁，浇灌希望的苗苗。牧牧虽然还年幼，然而在这位慈祥、耐心的老作曲家教导下，却开了窍，不仅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发声，而且还开始认识、熟习歌谱，一年后，在北京市青少年歌唱比赛中，由牧牧领唱的“我们的田野”获得一等奖。

老作曲家高兴极了。精心地培育，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小牧牧虽然年幼，然而却似乎比一般孩子更早熟，追悼会后，她变得更懂事了，更自觉地学习唱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段话：“张文纲老爷爷一辈子献身于音乐事业，为音乐事业呕心沥血，临终还念念不忘他的歌曲，把幸福、欢乐留给人间，他的精神真使我感动，我一定要唱好歌。”

小歌手

和她的

「园丁」

○李影 金剑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生命，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阳光，我要用歌声表达我的心情，表达我美好的愿望，继承老爷爷的遗志，我愿意一辈子唱歌。一句话，我想唱歌。”

育英小学是有名的北京市重点小学之一，这里人才辈出，功课也比一般学校抓得紧，牧牧在学校里是优秀学生，课余，她每星期仍旧去官园少年宫、景山少年宫练歌。在景山少年宫，音乐家、教育家常明老师一眼就发现了这颗明亮的小星星。牧牧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从公主坟到景山少年宫，有几十里地，一个年幼的小女孩，下课后，还要挤上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公共汽车，倒上两次车，赶到景山去，尤其是赶上下雨天，那可更艰苦了。可是牧牧从来不叫苦，也不无故旷课。有一次下大雨，妈妈看着孩子心疼，说今天算了吧，不去了，可是牧牧硬是闹着要上景山少年宫去。那天，教室里的人很少，牧牧虽然身上都被淋湿了，可是一进教室，就专心地听老师的辅导，常明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高兴地说：“任何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艺术家，都需要天才加勤劳，更需要从小就培养过人的毅力，没有毅力的人，绝对不可能达到希望的彼岸。”牧牧虽小，也许还不可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话，可是她



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老师这些话的领悟。

牧牧的努力开始有了收获。

她在海淀区中小学的演唱赛中屡屡获奖，她所唱的《门前有条小溪流》、《百灵鸟》等歌曲获得音乐家前辈们的赞赏。在北京市第一届中小学艺术节中，她的卡门选曲小合唱获一等奖。

1991年春节前夕，民政部、总政治部、中央电视台决定联合在中国剧院举行《心连心》1991年春节军民联欢文艺晚会。在举办晚会之前，有关方面对节目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祖国各地的少年宫、各文娛活动站、各艺术单位推荐了几千个节目候选人，在这中间选出了几十个出类拔萃的小星星，再从几十个小星星中选出一两个由少年儿童担任的节目。牧牧被选中了。

年仅十一岁的牧牧，面对中国剧院内数千观众，面对守在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她独唱《去远方》：“美丽的秋千，还在校园里摇荡，我要告别家乡，跟妈妈去远方，听说那里的课堂，都在帐篷里，听说那里的荒沙，寸草也不长，……去远方，我去远方，那是爸爸长年守卫的地方……”

这童声独唱吐字清楚，声音清脆嘹亮，像一串清泉，优美的音质欢畅、甜润……

大厅里掌声雷动。

当党与国家的领导人走上舞台时，江泽民一眼就瞧见了牧牧，摸着她的小脑袋，拍着她的肩膀鼓励她说，牧牧，你唱得很好，希望你好好努力，以后唱得更好。

领导人与全体演员合影了，小牧牧蹲在江泽民的脚步前。第二天，不少中央大报刊登了这帧照片，并冠以“群星荟萃”为标题。小牧牧站在最前面，在她的背后有著名歌唱家克里木、彭丽媛、毛阿敏、董文华……

中华大地，人杰地灵，一颗颗小星星正在升起。深邃的天空，满天星斗，璀璨辉煌。牧牧，她唱着歌儿起床，唱着歌儿上学，唱着歌儿就寝，北京公主坟一带的街道和公园都可以听到牧牧的歌声，她在自己的院子里一唱，路人就停在门前，她在树林里一唱，树林就静寂不响，鸟儿也不再叫，都在倾听她的歌声……。

军犬通人性，然而，不怕犬、爱犬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如果你跟随作家的笔去游览一下那个充满探险意味的猛犬世界，你会发现，那里还是个洋溢着爱和柔情的尚待开垦的世界。

燕山余脉斜斜地伸入到十三陵盆地，在古称军都县的一处所在，现今的昌平城东北方向，时时传来一阵阵猛犬的狂吠。吠声猛烈热情，有时又饱含着焦躁怒怩，不过更多的是沉稳平静，仿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声合唱队，在暮色苍茫里唱出原野的呼唤，在朝阳晨曦中唱出生命的律动，然而，对于胆怯的人来说，置身于这团犬吠的声浪中，绝对会产生某种人类原始的恐怖。

在北京夏天的一个超常闷热的日子里，我步入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训练大队，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上校军官张玉忠。他漫不经心地谈起昌平军犬大队，谈起了创建大队之初的种种艰苦。

张上校还告诉我，军区后勤管辖的仓库担负着国防物资的储备任务，不管军械弹药库，还是军需粮秣库，安全保卫是极其重要的。战士们站岗放哨，十分辛苦，加上洞库、地面库较多，人员又缩减，为确保国防物资的安全，便开始大胆地“以犬代哨”。经过犬队训练过的军犬，十分听话，甚至能够在闹钟的提醒下自动执行巡逻警戒任务，根本不需要人来带领。“闹钟上好，每一小时自动响一次，军犬一听见钟声，马上兴奋地跑出去，按规定的路线巡视，既迅速又安全。有的哨位一天一夜需要12名战士站岗，有了军犬这出色的助手、无言的战友，一昼夜三个人足矣！原来一个战士每晚要站两班岗，现在三天轮一哨。就凭这一点，你也要去犬队瞧瞧”。上校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战士的负担能够减轻，的确是一桩令人高兴的事。

军犬和它的主人们

——北京军区军犬训练大队散记

○高洪波

二

坐在军犬大队的办公楼会议室里，于斌上校与孟祥平少校热情地款待着我们一行。他们一位是队长，另一位是教导员，党、政一把手，全齐了。

于斌是位胖敦敦的中年汉子，黑龙江人；孟祥平要年轻得多，山东人，这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举目望一眼四壁，发现迟浩田、刘振华等部队首长的题辞赫然在目，迟总长的题辞笔走龙蛇，很有气势：“当人民卫士，充顽敌克星”，刘振华（原军区政委）题辞是“驯好军犬为国防服务”。题辞之外是一幅巨大的童话风格的壁毯，画面是一群相貌滑稽的犬在举行家庭宴会和打着桥牌。对着壁毯的一面墙上，贴着两帧世界百犬图，各国名犬的尊容一一排列组合，望上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一如世界选美大赛。

于队长一挥手指，爽快地指指“世界百犬图”，说道：“我们现在的犬种不多，只有德国牧羊犬、大丹犬、英国猎犬、泰国的罗德怀特犬、拉卜拉多犬，以及灰皮狗、狮子狗、吉娃娃、哈巴狗等观赏犬。我想经过一番努力，能建成一个风景优美的爱犬乐园。一部分犬用于国防建设，一部分犬用于社会观赏。有朝一日将世界百犬的品种搜集全了，这会成为一个游览区的。那时候……”于队长没再往下说，他们自信心和宏大的远景规划深深感染了我，再望一眼美不胜收的“世界百犬图”，感到于队长不仅仅是一名上校军官，他更具备一个名收藏家的气质，而且气魄更大，起码比收藏邮票、门票、钥匙链、火柴盒的人要更带劲儿！因为于斌的收藏品是活物，会吮牙咧嘴摇尾巴。

这支军犬大队组建于1985年10月，倡议者是张上校，具体工作是由

于斌带两名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来开展的。这两名战士曾作为内蒙古军区保卫处副处长于斌的助手，协助他侦破过好几起案子。比较典型的是1981年发生在呼和浩特市凶杀案，郊区一个罪犯杀人后潜逃，于斌他们军犬现场追踪，从发案到破案仅用了4个小时。

另一个案例是某部战士盗枪自杀案，因为依靠军犬的帮助，在现场找到了埋在田里的枪支，由此断定了死者盗枪后埋枪制造被冤屈的假情况，使该案变得简单明了。

于斌从1979年就投入军犬训练工作，当时正值“文革”结束，许多侦破手段已成为众人皆知的谈资，效果不佳。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于斌开始接触军犬，向战士学习、向专家求教，到全国各地治安系统的警犬基地去取经，外行于是渐渐成了内行，成了小有名气的破案专家。

刚到昌平时，3个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军人，20条良莠不齐的犬，几排干打垒平房。没有犬舍，人与犬同居一室，用同一口锅煮人食和犬食，犬病了，就在宿舍里治疗、输液，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幸亏于斌带来一辆自行车，采购物品全靠这辆自行车到昌平县城去驮。就这样咬着牙坚持创业，半年之后，情况才慢慢好转，建起了犬舍、办公楼、食堂，有了不大不小的家业。

三

军犬训练大队，实际包含着两类即有关联又大有区别的工作：养殖和训练。

刚到昌平创建大队时，于斌的家当满打满算不到20条犬，“立着耳朵就算”，犬种严重不纯。谁知第二年春天，遇上了“犬瘟热”，带来的军犬几乎一下子全部病死，好不伤心！于斌到昆明、沈阳、呼和浩特各地去买犬，



遇到熟悉的单位就多说好话不掏钱，白手起家嘛，不说好话怎么办？到了1987年，犬渐渐多了，建立了繁殖班，才开始择优淘汰边建设边训练，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犬的繁殖，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一旦进入事业的正轨，便具有了意趣盎然的故事。我见到产犬班年轻的班长、慢性子的陈三娃，他自称是“妇产科主任”，爱小犬如爱婴儿，他说自己可以三个晚上不睡觉，吃在犬房，睡在犬房，生怕自己一疏忽母犬翻身压死或咬死小犬，陈三娃悠然地说，“我们还要担负母犬难产时的打针、热敷、按摩，还要给小犬找奶妈——胎7只以上就超负荷了，母犬的奶肯定不够吃，只好为多余的小犬找奶妈。奶妈们的脾气有时不好，

不愿意喂别人的孩子，只好采取一些混淆气味的办法使她们放松警惕，承认既定事实”。小犬出生到45天，每天要吃六次奶，几百条小犬嗷嗷待哺，陈三娃委实不易。

育犬班则是犬的“幼儿园”。这个班的班长叫彭军波，圆脸、大眼、一脸精悍模样。他的工作是育犬，从3个月的小犬开始接手，直到训犬员正式接走为止。彭军波风趣地说，“我的任务是培养小家伙们的勇猛性、适应性、兴奋性，这是一条优秀军犬必不可少的素质。当然最基本的办法是强制性训练，从理论上讲，强制性就是——强迫加强化，或者说是‘条件反射’。表现好的小犬，奖食，有牛肉、饼干，还有‘行为奖励’，给小犬一块小木块叼着玩，它们跟小孩儿一样，贪吃也爱玩，一块小木块奖给小犬，它会自豪和兴奋好半天。”

再次见到彭军波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分发热气腾腾的犬食。犬食是牛肉、猪的内脏及蔬菜、面粉等制成的粥。犬们每天须吃一斤肉、一斤菜、一斤粮食。偶有小伙子向他挤挤眼、意思是多给一勺，他摇摇头，一脸庄重。

大块的牛肉放进碎肉机里，不一会吐出肉糜，把肉糜再搅入粥样的犬食里，十条犬起码要吃掉大半盆——

它们的伙食标准起初每月70元，月月超支，现已吃到百元。每月百元的伙食，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北京，也是很一般的标准。

“为了自己的犬，战士们会争吵甚至翻脸，谁都想为自己的犬多领些犬食。刘医生觉得我铁面无私，所以把这项很重要也很繁琐的任务交给了我。”彭军波不无自豪地告诉我道。

战士们都管女上校刘慧芬叫“刘医生”，她确实是人犬兼医的医生，又是于斌队长的贤内助，当然有时也充当对立面，比如在对伤病犬的处置上。我亲眼目睹了这对上校夫妇的争执：他们为的是一条名叫“友蕾”的伤犬。

“友蕾、男、成”，刘医生向于队长说道，“我带友蕾去医院瞧病，取药时让我填报销单，我就这样填的。”说完她就乐，一副悲天悯人的观音相，“谁叫咱们没医药费呢，只好让友蕾冒充人啦”。

于斌不屑地哼了一声，“妇人之仁”。他认为军犬大队自然以训犬为主，否则伤犬、病犬全攥在怀里舍不得处理，徒然损耗，于训练无补。“我这里不是收容所，占经费、占编制可不行！”

但刘医生有刘医生的道理：“我是犬道主义至上，绝不妥协！”友蕾的

前腿那条半尺长的伤口，是训练时因为训犬员不注意、互相打闹时忽略了犬的存在，结果两犬各为其主，互噬起来。“友蕾可乖呢，它懂事、听话，卧倒输液很温驯，如果不受伤，这次集训保险拿前三名。”刘医生说完这段话，不再发动关于友蕾退役的话题，到犬舍去巡视工作了。

于斌上校苦笑着摇摇头，说刘医生简直目中全是犬，一无人二无家。她患有严重的胃病，上级首长催她去外地治疗，可她总脱不开身。“她真的离不开犬，我理解她”，于队长轻声说，目光里满是对妻子的怜爱和无奈。

关于这位女上校，犬队里一致公认的模范人物，我曾在张玉忠上校的口中多少了解一点。后来见到孟教导员，从他客观的介绍中知道更为详细。女上校1986年从内蒙调来昌平犬队，她原来是一家大医院的主治医，来到大队之后，原来的兽医考上了研究生，飞走了。刘医生将就着由人医改行为兽医，这种改行有一大好处，管理严格，治疗仔细，因此犬的死亡率、发病率都比较低。“刘医生跟临时工一样，为犬们洗涮住处，打扫粪便，调剂伙食，她还管接生、饲养、后勤保障，犬队离不开她。”孟少校用浓重的山东话讲叙着他对于女上校的感受，从他口中我还知道了今年春天犬队发生的一次可怕的疫情。

“犬瘟热，又是犬瘟热。200多条犬同时患病，轻的流鼻涕、发烧，重的抽筋，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恶性传染病，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连疫苗都不大起作用的。唯一的办法是大面积消毒、隔离病犬，军区后勤部拨款10万元，提出‘保种犬、母犬、训练犬和泰国犬’的口号，很有几分背水一战的味道！刘医生忙了二个多月，拖着两条肿胀的腿每天工作16个小时。她忍着腥臭，冒着被病犬咬伤的危险，运用早发现、早治疗、控制激发期的战术，创造了奇迹。染犬瘟热的203条大小军犬中，仅死亡21条，成犬才一条，剩下的20条全是抵抗力弱的幼犬。一个数字是90%的死亡，另一个数字是10%的实亡，在这80%的数目差距中，有刘医生多少心血和付出啊！”



我被孟教导员的介绍深深感动了，走出办公室，迎面看见的是犬病房——一排低矮的犬舍。里面有八、九条伤残的军犬正在进食，看见我在窥视，一条黄黑色的大狼狗“呜呜”地扑过来，我吓得往后一退。背后却响起一声呵斥：“友谊，别闹！”那犬一听这声音，立刻平静下来，摇摇尾巴，不再理睬我，转身去做它自己的事。

回头一看，正是挽着袖子、卷着裤腿的女上校，她刚刚从犬舍打扫卫生归来。坐在高大的白杨树荫里，我问刘医生：“你怎么一点也不怕这些大狼狗？”

刘医生轻轻一笑，说道：“怎么不怕？刚来时怕得厉害。慢慢就喜欢上了。现在犬都认识我，可有感情呐。”

问她可曾被犬咬过？女上校爽快地告诉我被咬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6月，一窝泰国犬，6只个个凶猛，我叫这窝犬为‘小暴徒’。有一天出差回来，幼犬正在外面放风，我刚走近它们，突然被这群‘小暴徒’包围起来扑咬，人被犬扑倒在地上，背上的衣服挠破了，手臂也咬伤了，简直跟恶作剧似地，不过不太严重。”

女上校轻描淡写，我却听得毛骨耸然，我无法想象一个弱女子被6只半大的犬围咬的情景——而且她讲述这次遭遇时语气里充满母爱，仿佛6条幼犬仅只是和她开了一次玩笑。

犬牙交错的玩笑。

刘慧芬上校1948年出生在长春，1964年自通辽入伍，同年考入内蒙古军区卫校。1968年任护士，1970年入党，1979年任军医。本来她在内蒙古军区一家设备良好的大医院工作，1986年来到燕山脚下的军犬大队探亲，风尘仆仆刚进门，正看见自己的丈夫于斌守着病犬发呆，束手无策地落泪，刘医生当即认定：“这里需要我！”这种认定或者还有更复杂的一种妻子对丈夫的爱，反正她告别了大医院，住进了山坳坳。刚来时没宿舍，住的地点离犬队十几里路，她每天早上6时刚过，就离别小女儿到犬房上班，为犬们打针、量体温，跟母犬轻柔地聊天，跟幼犬打招呼，一听到她的噪音，小犬们会兴奋地奔出犬舍，挤到笼前迎接她，母犬会信任地由她做各种检查，直至接生。那条“友谊”（就是脾气火爆之极的大犬）因患骨髓

炎，做了后肢大腿骨清创手术，刘医生为它耐心地输液、冲洗伤口，为它冲奶粉、煮鸡蛋。陪它在病号房里休息，“友谊”睡地板，刘睡桌子，这种感情日积月累，在军犬们的眼里，这位瘦弱的女上校无疑成为最可信赖的人。

为了事业，刘医生学习养犬育犬和繁殖小犬的各种专业知识，人医变兽医，实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犬由怕到爱以至溺爱的转变。刘医生闲暇时间是到犬舍里踱步，她能喊出200多条犬的名字，绝对不会弄错一条。“真的吗？”我问。“犬跟人一样，有自己的面貌，怎么能认错呢？”刘医生对我的询问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解放军报》曾在头版报道过刘慧芬的事迹，题目是《事业，在她心里是重头》，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去冬一天秦基伟上将视察工作，得知刘慧芬的情况，说：‘这种为国防建设事业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女同志，要宣传、表扬，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刘医生1988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荣立了三等功。在我们闲谈时她没有诉说什么个人困难，只是一门心思谈她的母犬和小犬，她对犬充满由衷的爱心。

了不起的女上校。

既然命运选择了刘慧芬成为军犬大队的女管家，她似乎只能并且乐于这样奔波下去。

四

我这人有个喜好：爱读古龙、金庸、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来军犬大队之前专门购得一本《剑侠图传全集》，以作闲暇时翻阅。信手翻至《昆仑奴》一篇，发现唐代时的猛犬便异常有名。此篇讲述一个本领非凡的剑侠兼昆仑奴磨勒为人们的执着爱情玉成其事的故事。昆仑奴磨勒本领自是非凡，但我注意到他一段话：“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外，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惊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大意是说官居一品的那人家中有一条猛犬，守候在他的歌妓院门口，平常的人一靠近就会被这猛犬扑杀。犬的警觉性极其灵敏，性情勇猛如虎，这就是有名的曹州孟海犬。

从唐代昆仑奴口中，我无意知道了中国古代尚有如此凶猛矫捷的猛犬，短短八个字：“其惊如神，其猛如虎”，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上任何优秀的军犬。

只可惜此犬种早已失传，或是退化、灭绝，否则军犬大队的于斌队长一定会把它们请到犬队安家落户的。

于斌上校目前正致力于军犬方阵的队列训练。他站立在平整的操场上，面对着40名雄纠纠的士兵，士兵的左侧卧着40条猛犬。随着进行曲和威武的口令，战士们正步前进。军犬紧随主人，或停、或卧、或转身，我注意到第一排的军犬相貌温和、个头也较小，纯净的黑色，这是刚从泰国引进的名犬拉卜拉多，特长是嗅觉超常灵敏，兴奋得快，主要用于搜毒搜爆；第二排是品种优良的罗德怀特，这种犬耳朵垂下，头颅巨大，尾巴却短如山兔，叫“无尾犬”，如果说尾巴的动作是犬们的一种语言形式的话，罗德怀特犬从小就丧失了尾巴的功能——因此它们凶猛异常；三排和四排并列着20条德国牧羊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狼狗”，这一犬种又叫“德国黑背”，关于它的特点，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反应迅速，服从，智力特强。”

40个人与犬组成的方阵，把操场踏得震天价响。于斌队长告诉我，这是为了迎接10天之后的一次外事活动——一位泰国中将、特种兵司令将来这里参观访问。“我们的犬队条件比泰国差一些，我两次出访泰国，知道泰军有一个面积巨大的军犬训练中心，中心里学校、医院一应俱全，毕业学员全是士官。在中心参观要乘汽车才行，泰国犬很好，我们引进了30条，引进时泰军两位大校反复告诉我饲养、管理方法，他们一直以为中国没有军犬！”于斌苦笑一下，为外军的误解，也为自己对军犬大队的一番苦心经营。

于斌上校是典型的军人，爽快、干脆，富有东北汉子的个性特征。但我却知道他至少痛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妻子刘慧芬披露的，本文前面已有提及；另一次是他的创业时的伙伴王久安告诉我的，王久安是于队长的高徒，他捋起袖子，手臂上全是大大

小小的伤疤，这是当助训员（即假设敌）时因为犬太凶猛，护具失效后造成的。王说：“于队长养过一条犬，起名‘傻帽’，真是条好犬，训练好了，却得了犬瘟热。‘傻帽’死时，于队长痛哭失声。”

见到于斌，我问及“傻帽”，于的目光里充满怜惜和痛楚，一个劲儿地摇头。我看触及到了他的痛处，赶紧转移话题，请他谈谈训犬和犬队建设，于斌略一沉吟，才缓缓讲了起来：

鉴别一条犬，主要有四点：体型、外貌、毛色、神经类型。

体型要前高后低；外貌、主要是眼睛要有神，头颅要大、耳朵要竖；毛色要光润油滑，黑黄相间，——我指的是德国牧羊犬。神经类型是内在的素质，前面几条是外因。神经类型——为兴奋型，特点是喜欢吠叫，袭击性强，这种犬最适宜于警戒巡逻；第二类为活泼型，机敏灵活，兴趣转换快，这种犬适用于侦察跟踪、破获各种案件；第三类型是安静型，平和沉稳，心中有数，一旦冲击，勇不可挡，这一类犬也适合侦破追踪。最后一种神经类型是弱型，干什么都不成，既不凶猛也不活泼，只好淘汰掉。

训犬，其实要先训人；人是犬的主人，抓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训练一条军犬，是很艰苦的，必须全天候的训练。人要能吃苦，犬才能成才，“望犬成才”是每一个训犬员的心愿。就拿“追踪”来说，为了使犬养成在地面上寻找与嗅源气味相同的迹线，并沿迹线进行追踪和获得与嗅源气味相同的物品或人的能力，训练中教师要布设各种诱惑线，他们要经常在各种恶劣的天气和环境走线，烈日，晒得头昏脑涨；涉山水，别怕水冷洞深。训一条犬要走数不清的路——路在脚下，犬在手中，没点精气神还真干不成这一行！

顶不易的是助训员，训练中，学员一发出“袭”的口令，犬便不顾一切地扑向假设敌，咬住他的右臂。虽有皮革棉垫当护具，也很危险。王久安的手臂你去看看，惨不忍睹，每道伤疤都是一个故事——犬牙很厉害，有毒，咬上一口必留伤痕。但危险归危险，犬还得训，否则叫什么“军犬训练大队”？！

训犬是大学问，用文绉绉的话来

说，训犬是情感和理智的结合。第一关是训犬员和犬建立亲和关系，即培养感情，除了规定的按时散放、喂食之外，一条好犬的成才主要靠训犬员的智力、体力训练。再拿“追踪”来说，犬的嗅觉使它长于此道，据国外一些科研机构研究：人脚穿鞋走路，排汗不足千分之一的气息留在地面，而犬鼻触地每次不过一秒钟，却有本事将人的脚印中留下的气味三千万分之一辨析出来。而且在12—24小时之内的余量，已足以被犬嗅出，所以国外一些专家惊叹：“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不如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得心应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就像各自的指纹一样互不相同，目前唯有警犬才能区别人们的不同气息。知道吗？国外有些贩毒大王出上百万美金的高价买一条缉毒犬的命，因为这犬的存在成为毒品大王发财的致命威胁，由此可见一条好犬的价值。

好犬的确价值千金。

在于斌队长的犬舍，我看到第一排种犬中的猛犬“全平”，这是3万人民币买自于沈阳，不过于队长告诉我这钱他可出不起，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李经理自费购得后寄养在犬队的。“我和犬界同行很融洽，不限于公安系统和军队，老百姓手中有好犬，我也争取‘借种’，犬队犬队，主要在有好犬。我的好犬不外流，发展犬的事业在我这里是“军警民一体化”，大容纳大垄断为的是大发展。”

于队长一指“全平”，说道：“这是纯种的德国黑背，为什么叫‘全平’，把东北的犬‘全平’了，北京话叫全部‘盖帽’了。这犬一到犬队，北京地区养犬的单位和个人都知道了，纷纷来参观，都知道我把沈阳最好的一条犬整了过来。”看神色于上校浑似打了一场胜仗，目光中满是自豪。这一瞬间我又体会到“收藏家”的特殊气质。

犬舍边上三间是三条凶猛如花豹的大犬，乍一看象荷兰奶牛，白色的犬身上满是黑色花斑，耳朵下垂，眼睛血红，个头像毛驴般大小，吠声低沉有力。

“这种犬叫‘大丹犬’，目前中国极少，北京地区我这是独一份！”于队长指点着说。“这条‘大丹’才两个月

时我从广东乘飞机抱回，那时就花了我一万二千元。现在长到六个月了，你相信吗？”我摇摇头，因为这犬实在太高大，巨大的形体自然给人一种无形的威慑。

“大丹犬其实性情忠实温良，将来我把这类犬配到首长驻地、用于重大的礼宾场合，绝对出类拔萃！”于队长畅想完毕，牵羊一般牵出巨大的猛犬，让我也试上一试。

壮起胆子走上前，我牵起了价值万金的大丹犬，它的模样极像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典型的“巴斯克威尔的猎犬”，只不过少了绿色的磷光而已。牵着大丹犬照了一张相，感到自己在犬队能同这位“犬王子”合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大丹犬果然好脾气，它仿佛乐于走出犬舍来放放风，张着血盆大口，分明在开心地哈哈大笑——如果犬也会笑的话。

五

王久安是一个很内向的小伙子。他很质朴，质朴中又有几份幽默，作为军犬大队创建的元老，他如今的工作似乎不太沉重，因为他是志愿兵，很可能要晋升为军官——对于王久安来说，军官不军官并不重要，他主要是爱犬。

我与王久安竟是地道的老乡，他是内蒙古开鲁县人，我也是。不过他出生时我已随父亲远调贵州，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一见如故。

王久安是助训员。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顶危险的一种职业——假设敌。他手臂上的累累伤痕显示着他的阅历，王久安领我参观、一次又一次参观犬舍，其实他想会的是三排犬舍中一条名叫“海豹”的军犬，他曾经是这犬的主人。

“海豹”发出吠声。远远地迎接着王久安。王走到笼前，“海豹”立起来，欢乐地摇着尾巴，然后定定地望着久安，久安发出口令：“坐”；“海豹”立马坐下，一动不动；王又喝道：“立”！“海豹”马上起立，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王久安打开笼门，进入犬舍，人和犬相拥，许久才离去。“海豹”低吠，声音中似有万千哀怨——它不愿意闷在笼中。

王久安扭头离开，脚步陡然加

快。出得犬舍，他说道：“犬通人性。主人的喜怒哀乐它都能掌握，神极了。另外犬的叫声，在一般人听来就是一种‘汪汪汪’，其实可复杂呐，犬的叫声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我和‘海豹’远远地，我人还没到它就知道了；用叫声欢迎我，你们谁也听不出来，只有我懂。还有，见到陌生人时犬的叫声急促，含有威胁意味；病了、伤了的时候它会哀嚎；不高兴时还会——信不信由你——还会长吁短叹，跟人一样叹气！”

王久安不光是训犬专家，他曾破获过好几起盗窃案，有的是盗枪，有的是盗物，还有一次是盗钱。借助于他训的军犬，一破一个准。王久安告诉我：“破案时带一条犬，比什么都放心。不是有句老话吗：忠实走狗。狗就是忠实于主人，赶都赶不走。问久安训犬程序，他想了想，说道：“小犬一般从八九个月训练，三个阶段：一是训练依恋性，培养和主人的感情；二是训练犬学会随行，坐下、卧倒、站立、吠叫、拒食、越障碍和扑咬等，培养犬的服从；三是科目训练，包括搜毒、搜爆、鉴别、追踪等。我们训的犬大多为‘大狼狗’，这种犬身高半公尺，肌肉发达、凶猛过人，但很恋主人。”

说到“凶猛过人”，王久安讲起犬队曾养过一条名叫“大黄虎”的头号凶犬，这犬眼珠子血红、满脸皱纹，样子可怕之极。一出来就咬人，闹到最后只要听说“大黄虎出来了”，犬队的战士关门的关门，上房的上房，真是“谈虎色变”。王久安微笑着讲述“大黄虎”，并说自己也怕它，可是身为教员却不能后退，只好想法子把它引进犬舍——正好“大黄虎”想谈恋爱，就用一条漂亮的母犬引它入笼。“我手持一根木棒，小心翼翼地驱赶‘大黄虎’，好家伙，一身冷汗！”

不过犬与人类社会一样，像“大黄虎”这样古怪暴烈的犬毕竟是极少数，就像希特勒只有一个一样。可是“大黄虎”留下的威风依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真是犬中豪杰。能把个军犬大队搅得四邻不安，让许多训犬高手望风而逃，不容易。

“你别和它对视，避开它的目光，它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不会袭击你。”王久安谈完“大黄虎”的故事，很

郑重地传授我训犬的经验。

我和王久安谈起刘医生护理的“友蕾”，王久安搔搔脑袋，不安地说：“‘友蕾’受伤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主持训练，休息时犬与犬隔开一百多米，两个训犬员是年轻人，凑到一块儿开玩笑打闹，结果百米之外的‘友蕾’以为主人受到欺负，冲过来帮忙；另一条犬一看‘友蕾’来凑热闹，也不客气地加入战斗——结果训犬员拼命拉也拉不开，‘友蕾’的腿是因为主人没经验，拉回时别断的。那战士心瘁死了，天天住在犬舍里陪着‘友蕾’，后悔、伤心、难过，都换不来‘友蕾’的腿。看起来严格执行训练规定是太重要了，我真的有责任。”

王久安一点不像他的名字，变得很不安。

只有和军犬血肉相联的感情，才能产生如此深切的自责，我更深的了解了王久安。

六

在军犬大队的最后一天我见到了“全平”的主人李经理，这是位爱犬如命的中年人，见面就建议我为军犬写部电视连续剧，他甚至说由他自己帮助挑选5条一模一样的犬，表演全能技术，拍成片子准叫座！“我这人没啥喜好，就是爱狗。我爱人也同样，她大哥叫大狗，二哥叫二狗，三哥叫三狗，妻子不顺着叫，可偏偏又属狗。为了狗，让我干嘛都成”。

这位李经理家中养了四条大狼狗，为此邻居们有意见，反映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倒也通情理，让这位爱犬的李经理每晚上11时过后再遛犬，以免造成邻居们的心理恐惧——由李经理养犬，我想到犬在北京人生活中的位置日渐重要了。关键不是禁止，而应是疏导，有关部门搞好犬的防疫、控制犬的喂养数量，人们由“仇犬”、“怕犬”转向“爱犬”是十分必然的。据了解德国盛行养犬事业，仅犬协会就有二百多个分会，10多万名会员，十分之一的会员专门从事养犬，仅1985年在德国登记出生的犬就有1666000多条。

此外犬有血统证明书，每州有人专门进行血统监督，三代以内不准近亲交配，公、母犬须两周岁开始考副、选副，因此德国牧羊犬的犬种90年

来未见退化，而且遍及世界各地，这养犬业本身就给德国带来了无尽的经济效益。我国的军犬警犬界就曾不远万里赴德国购犬，同时兼有考察养犬业的任务——相比之下，中国的犬，尤其是优良的犬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仅就军犬大队而言，1989年底是养犬的最高潮，部队组建特警团，需要大量的军犬，边防、公安、后勤等均需猛犬，军区后勤部于是投资几十万修建成如今看到的比较正规的犬舍。训练基地也扩充编制，9人变成70人，80条犬变为280条，干部也尽可能配齐——一切都在稳健地、正常地进行着。军犬事业关系着国防、公安事业，尽管尚有艰难曲折，重重困难，但我相信军犬大队勇士们的创业精神，犬在他们手中一定能够如鱼得水，走完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操场上，正步走着人与犬的方阵，人精神，犬抖擞，口令喊得山响。战士的眼里是威严，军犬的眼里是忠诚，人和犬如铁流般走过，踏过夕阳洒下的金黄，踏过偶或掠过的云影，大队的气势、军旅的威武，便在这方阵中很自然地腾起，古老的军都城、沉寂的十三陵，显出了一种欣喜和兴奋。

当年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却悲怆地唱出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刘邦猜忌功臣，杀了一批昔日的“猛士”，故他的感叹是一种自怨自艾。尽管如此，刘邦的《大风歌》毕竟气势雄健，所以我借用刘邦的诗句来作为本文的标题——安得猛犬守四方！

安得猛犬守四方？猛犬“其惊如神，其猛如虎”，多么难得的良种！猛犬猛士常在，猛犬势不可挡；猛犬在军犬训练大队的犬舍中诞生、成长、训练，以粗壮的爪子、强健的胸脯和硕大的头颅傲视凡犬，它们从这里走出、走向中国广袤的原野，在边陲、在海关、在要塞，低声地吠着，把犬的声音传导给正直的人们，让他们警觉、警惕、警悟。有犬，便有安全与和平。

安得猛犬守四方？

已得猛犬守四方。不信，请到位于北京昌平的军犬训练队走走，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结论。

军犬事业，方兴未艾。

（责任编辑：古力）



首航

太

平

洋

○ 杨肇林

公元1980年5月，一支代号为“580编队”的海军特混舰队驶向南太平洋，保障中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实验。

自15世纪郑和宝船下“西洋”以来，中国舰队跨出岛链，越过赤道，重新出现在大洋上，中途不停靠任何国家港口，全凭自己实行海上油、水补给，又是执行如此敏感的任务，引起了全世界关注。“580”特混舰队集结在舟山群岛的园山海面。

明天，5月1日，将要起航。刘道生将军站在指挥舰“向阳红”号的舰桥上，整个舰队尽收眼底。他的目光从一艘导弹驱逐舰转向另一艘导弹驱逐舰，再转向一艘补给船、测量船、拖船。18艘舰船，5316名战士头一次作远离祖国的万里航行。像许多年前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那样，他兴奋中夹着沉重。

放眼望去，东海海面船只如蚊，帆樯如林，这里是近陆浅海，人民海军初建的时候，这近在咫尺的海面，也曾经是遥远的，难以到达的地方。那时的海军“军舰”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木壳，25吨，为数不多的江防炮艇。穿着陆军军装的新中国第一批水兵，驾着这样木瓢样的小炮艇，第一次冲出长江口，到了海上；又是用这样的炮艇，第一次“远航”到达舟山；第一次在海上作战，小艇打大舰，取得了胜利。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样一条“414英雄舰”。眼下这里集结的已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是几千吨的军舰，上万吨的船舶，要去远航。这都是从那个“25吨”，从那个“第一次”开始的！对于革命者说来，“第一次”意味着开创的兴奋，胜利的希望。可第一次也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困难，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舰船设备，能不能远航太平洋？能不能经得起太平洋风暴的考验？

不久前，刘道生亲自组织、指挥了在青岛外海进行的高强度的模拟远航合练。

模拟远航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连续航行，不着陆，不靠岸。巨浪把舰身挤压得轧轧作响，军舰好像要散架子了，前翘后颠，左右摇摆。新水兵吓哭了，老水兵晕船了。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穿波越浪，磨练自己的意志，熟悉军舰适航性能。

刘道生每天总要到水兵住舱去看望那些熟悉的和新结识的战士。

在一艘导弹驱逐舰上，刘道生问水兵说：“到太平洋去，怕不怕？”

水兵们齐声回答说：“不怕”。

刘道生笑着说：“很好。只有经过大洋风浪的洗礼，才算真正的海军。”

水兵们振奋了。

刘道生问一个新水兵：“你是第几次出海？”

“第一次。”新水兵回答说，“头回生，二回熟，干啥子不是从头一回开始的呢？”

刘道生笑了：“我也是头一回。等我们从太平洋上回来就算老水兵了。”



刘道生更关心的是干部的训练。他问108舰舰长刘子庚：“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外国军舰的干扰，贴近航行怎么办？”

刘子庚说：“我们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一条是坚决防止和制止任何人的直接攻击；一条是机动灵活，友好地对待同我们相遇的外国舰船。”

刘道生满意了，他看着这些英气勃勃的舰长们，深情地说：“我送你们两句话，是一个船老大告诉我的：‘船公不努力，耽误一船人’。我把这句话翻了一下，叫做‘船公须努力，紧催一船人’。你们看如何？”

5月1日10时和14时，“580编队”第二拨儿、第三拨儿舰船相继启航。第一拨已于4月28日先期启航了。5月2日，航经琉球群岛，过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这时，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才发现中国舰队，慌忙飞临舰队上空。刘道生皱起了眉头。太平洋不太平，为了和平的航行，需要战斗的航线。他发布命令：舰队成战斗队形前进！

军旗在头顶“啪啪”作响，战斗信号升上了桅顶，各舰相继转向，进入战斗航向。忽然，传来声纳战位的报告：“××方位发现水下噪音，可能是核潜艇一艘，距离××链。”

“不速之客”迟早是要出现的。刘道生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笑意，说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

舰船之间，灯光闪烁，手旗飞舞，电讯往还。面对“热心”的“客人”，舰队护卫着测量船只，循着自己的航线庄重前进，凛然不可侵犯。

5月8日，骄阳当顶，海天一色，水波不兴。整个编队斜跨赤道进入南太平洋。霎时，整个舰队，汽笛齐鸣，在海洋上空回旋激荡。水兵们以自己粗犷的声音，宣告我们来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有几个水兵奔到舰尾，脱下自己的鞋子，投向大洋。把自己的足迹留在赤道上，“航海日记”上郑重记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一片汪洋，森森茫茫。刘道生沉浸在一历史感里，浮想联翩。

中国海洋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船只已经驶往朝鲜、日本、印度。东汉时，中国船只开辟了通往伊朗、古波斯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水师的“飞虎战船，日行千里”，临敌先从内里放神炮、神箭、神火，彼不触见，颇有一点今天导弹驱逐舰的味道。蔚为壮举的是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次率领宝船舰队南至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的里默加，最西远到非洲大陆东岸。扬威结好于大海大洋。明末郑成功的舰队一举击沉荷兰殖民军主力舰“海克托”号，再击溃他们的增援舰队，迫使殖民军投降，收复了台湾岛。清朝鼎盛时期，水师先后两次会同陆军在库河克和雅隆克战役中大败沙

俄侵略军。在那个时代，它标志着中国人走在世界前列。然而，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海洋上逐渐消失了中国舰队的航迹。但是，即使在国势衰微的清朝末年，1908年和1909年，广东水师也曾驱逐日本人，收复东沙岛，派“伏波”、“琛航”军舰巡阅西沙群岛，有力地遏制了法国殖民者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觊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当时任中国海军“前进”舰队司令的林尊，曾经率领舰队收复南沙、西沙群岛，保卫海疆主权。31年来，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来到了大洋。我们将无愧于古人！

来自井冈山下的刘道生，和许多中国将军一样，以前从不曾知道西点军校、皇家海军学校，他们自有传统，是经“山地大学”深造出来的，对山有一种特别深厚的眷恋。中国的山啊，是红军、八路军驰骋的天地。当革命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高山走向海洋的时候，毛泽东会见了肖劲光和刘道生。那时，他们一个是兵团的司令员，一个是兵团的副政委。党中央命令他们组建新中国的海军。他便以熟悉高山的智慧和热情，走向大海，熟悉那陌生的、无穷无尽的波峰浪谷。5月12日，“580”编队全部顺利驶抵试验海区，立即投入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每日晨昏，总有几个国家的侦察

船在附近海区游弋,飞机定时飞临上空,作“例行观察”。

5月17日,苍烟锁海,云涛翻滚,夏日的阵雨,不时倾盆直泻。而明天就是预定发射火箭的日子,多么需要一个晴朗的天气啊!

气象分队年青的分队长判断南大洋的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试验海区云带可能减弱,转向西南方向移去,明天将是一个晴天。然而,现在,头顶上副热带高压还没有加强,空中的旋涡云带移动缓慢,明天真能放晴吗?如果预报不准确,天气很坏,火箭飞来时,观测不清楚,溅落的火箭数据舱不能及时打捞回来,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推迟火箭发射的时间,错过良好的时机,又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箭在弦上,令人心焦;刘道生和副指挥们审度了所有分析,他相信气象分队长提出的详尽数据、周密的分析、辩证的判断,他更相信这年青干部的忠诚、坚毅。他签发了“气象良好,可以发射”的预报。于是,一切工作在加紧进行。人们从最坏处着手去夺取胜利。

5月18日,终于迎来了充满希望的黎明。天上流云散尽,晨曦中,变幻不定的云彩镀上了金红,带着耀眼夺目的光华膨胀升腾,让人不敢逼视。水线清晰了,天海分明。青色的海面向下沉降,红焰腾起,太阳从波摇水颤中弹射蹦跳而出。

刘道生发布命令:各舰加强巡逻警戒,确保火箭落区海宴澄清。

充满好奇的舰船、飞机加速向这里靠拢,澳大利亚驱逐舰“吸血鬼”号、教练舰“贾维斯湾”号,新西兰测量船“莫洛维亚”号,几天来一直迫近我火箭落区活动。显然,根据美、澳、新有关协定,它们负有特殊使命。“莫洛维亚”号一直傍着我108导弹驱逐舰航行,现在,正试图驶进试验海区。108舰舰长刘子庚命令发出信号:“请不要驶入我舰作业区。”

“我有权在公海自由航行。”回答颇不友好。

接着,“莫洛维亚”号突然转向,插到108舰左前方,并升起“我船机械故障,失去机动能力”的信号。

按照国际航行避碰规定,必须躲让左舷船只。“莫洛维亚”号想利用这一规定,趁108舰规避的空隙,插入试验区。

刘子庚果断下达舵令,从“莫洛维亚”号右舷掠过,保持在原定航线上,阻挡了它的去路。

刘子庚在字斟句酌地口授信号,发往“莫洛维亚”号:“中、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你船安全,请不要驶入我舰作业区。”

善意被理解了,“莫洛维亚”号放下橡皮艇,送来了他们的船徽、舰船资料和一顶红白相间的船员帽,表示友好,并提出要求:“可否允许我舰船长访问贵舰?”

火箭即将发射,整个编队实行无线电静默,无法向编队指挥部请示,只能由108舰自行决定。

随着火箭即将飞临,“莫洛维亚”号变得焦躁起来,再次强行向试验区里航行。108舰如果强行拦截,稍一不慎,容易引起碰撞,影响完成警戒任务。

为了完成警戒,绝对保证安全、顺利收回火箭数据舱,108舰决定:邀请“莫洛维亚”号船长登舰作客。一旦发生意外,也好当面谈,妥善处理。

“莫洛维亚”号客人来到108舰,宾主举杯,互致敬意,共祝和平。

与此同时,106号弹驱逐舰也与澳大利亚“贾维斯湾”号教练舰进行了友好交往。

运载火箭从东方疾飞而来,挟九天风雷,舰载直升飞机立即升起空中。火箭准确落在预定海区,激起水柱冲天而起,有如银河挂落,阳光下迸散出五彩缤纷的礼花。记录火箭飞行重要参数的数据舱弹落水中,释放出染色剂,把深色的海水染得翠生、绿莹莹一片。

海军航空兵战士驾驶直升飞机穿过阵雨低云,及时发现波涛中起伏颠簸的数据舱,悬停在它的上空。潜水员从直升飞机上纵身入海,顾不得使用防鲨剂,奋力击水,扑向数据舱。这数据舱蕴藏着试验结果,凝聚着科研战士心血,更载负着亿万人民的希望,它比生命更宝贵!潜水员一

把抓住数据舱的吊环,把它同自己身体一起挂上吊钩,更用双脚双臂紧紧搂抱这宝贝疙瘩。直升飞机上的战士迅速把他们收回机舱,飞回军舰。这整个过程仅仅用了5分20秒。

一架美国直升飞机赶来,洋面上仍然浪花欢跳,晶莹、翠绿。飞机低擦洋面,舀起一桶染绿了的海水,腾身起去。带回去看看吧,这是中国人染绿了的海水。

各艘舰船的甲板上,一片欢腾:“胜利了!”“成功了!”

刘道生擦着湿润的眼睛,看着欣喜若狂的水兵。他们一个个黑了,瘦了。刘道生真想脱帽鞠躬,大声向水兵致敬,向人民道谢。

一个水兵兴奋的说:“都象这样干,咱们国家四化有希望!”

刘道生响应说:“大有希望!”

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在关系人民命运的紧要关口,总能一致奋起,爆发出一股移山倒海的力量和智慧,克服艰难险阻,达到自己的目的。

5月22日下午,在中国火箭落区,在南太平洋上,为于笑虹同志举行海葬。他对建造中国舰船曾做过卓越贡献。

在凝重、低徊的哀乐中,刘道生似乎看见于笑虹走来。1959年,特别选派了他和刘华清组建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后来又扩建为舰艇研究院。正是他们和许许多多有志之士,包括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专门技术人才,为新中国设计、建造了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科学考察船,……才有这支今天远航太平洋、能在地球磁场所有海洋航行的舰队。

于笑虹的骨灰,缓缓地、庄重地撒下大洋。

刘道生似乎又听到了于笑虹的话:“我一定要看到中国制造的军舰满海跑,驶向大洋!”

“580编队”分两拨儿起身返航。一直陪伴、观察我们的外国舰船发来了友好的信号:“祝中国舰队一路顺风!”

[责任编辑:卢弘]

五星级饭店的女经理

○ 韩秀琪



1

飞机缓缓滑向地面。伦敦被阴霾的雾笼罩着，走出机舱，迎面扑来一股凄凉的寒气，尽管已坐了22个小时的飞机，可是当双腿走到地面时，杨清仍没有一丝轻松的感觉。要在异国他乡生活两年，未来在她心中将是捉摸不定的。

杨清和4名北京昆仑饭店的同事来到英国，进了英国伊岭学院饭店管理系。伊岭学院是英国一所很著名的培训旅游人才的学校。特别是饭店管理系更出名，英国和欧洲许多大饭店经理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在欧洲从事饭店管理专业基本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以瑞典洛桑旅游学院为代表，注重理论上教学，另一派是以伊岭学院为代表，注重实践，要从服务员做起，一步步实践各个部门。

1983年刚刚筹建的昆仑饭店，为培训自己的旅游业专门人材，决定向英国伊岭学院选派5名留学生，学习饭店管理专业。

1000多名昆仑饭店员工展开了激烈竞争，经过考试选出十几名在国

内学习一年英语，再以考试选出了7人，最后请伊岭学院饭店管理系主任专程来中国，亲自主持考试录取了5人。

年过33岁，已是孩子妈妈的杨清接到英国伊岭学院的录取通知。她异常兴奋，一年多来她带着孩子克服种种困难，和年轻人们一起竞争所付出的代价没有白费。

杨清她们5个人被分在5个班。杨清所在班中有18名同学，只有她一个是东方人。杨清在这里遇到第一关就是语言关。虽然在国内有一定英语基础，可是在课堂上教师从第一分钟一直讲到下课，面对教师一堂课接一堂课全部用英语授课，跟着听还反映不过来，要想记笔记根本就不可能。再加上对英国地理、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不甚了解，有时听到从教师嘴里发出的英语，真好似听“天书”一般。同班的同学年龄都只有十八、九岁，只有她一个是一名大龄的东方学生。英国学生大都不爱和东方人接触，平时非但不帮助，还经常讽刺你。“杨，别用功念了，我们都烦死了”，其

实英国学生本身也不轻松。英国的教育虽然是从小学上到中学，全部免费保送，但是上大学的淘汰率极高。第一年淘汰40%，第二年淘汰20%，真正能毕业的只有40%。连英国学生都不堪如此重负，对于隔着一道语言障碍的中国学生，要想能坚持下来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几个月下来，杨清真有些吃不消了，仿佛面前横着万重大山，看不到一丝希望。

——不能退缩，咬牙也要坚持，万难之中总会有一线出路的，要找“穿绳的”——交一位朋友，弄到一本笔记，自己就可以把课堂上教师讲的内容慢慢嚼咀，也可以应付考试了。杨清从18名同学中反复搜索，选中从马来西亚来的英籍小姑娘奇尔。于是杨清千方百计地接近她，上课时坐在她旁边，下课与她一起吃饭，周末还请她吃自助餐（英国人一般是很少花钱请人吃饭）。用东方人的温情打动她，没过多久，奇尔就十分高兴与杨清交往了。奇尔把笔记本借给杨清，还常常帮助杨清提高英语日常生活对话，杨清学习开始有些转机了。

第一个学期考试来临了，一星期考两门课，14门课7个星期考完，一边听新课一边考试。旧课滚新课，每天从上午时到下午时，50分钟一节课，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中午只休息50分钟。杨清拼了命，每晚只睡几小时，可是当考试成绩公布后，杨清看到公布的成绩布告上她的西餐烹饪课竟是不及格，泪水险些涌了出来。这才是刚刚开始，就有一门不及格，以后日子怎么过？一旦出现两门不及格，她就会被淘汰出学院。杨清突然感到：支撑着自己的信心一下垮了。这时爱人从国内打来电报告诉她孩

子得了重病。当杨清从长途电话中听到亲人的声音时，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杨清想起一位朋友的告诫：当你感到困难时，有泪要自己流，要咬牙顶下来，美好的前途就展现在你面前了。

杨清默默地流泪，默默地把泪水擦干，咬牙挺了下来。拿出更大的决心去攻克一门门功课。她对20多门功课中“饭店应用数学”、“饭店理化食品卫生”、“饭店应用会计”、“金融课”、“计算机课”、“第三外语课”、“人事管理课”、“室内装修、环境管理

课”、“人际关系课”、“市场学”、“销售学”、“经营管理课”等自己擅长的功课发起进攻，发挥东方人脑瓜敏捷、头脑快的特点，集中精力听课，多用时间复习。

很快，杨清就在会计课、金融课、应用数学课的考试上取得全班的高分，其中应用数学竟得98分，是全校第一名，其他多种成绩也全部及格了。成绩一公布，许多英国同学都跑来向她求教，问她是怎么学得这么好。只要数学学得好，英国教师就认为你很好（因为数学课一般都认为很难学），于是上课时，英国的同学们也都争着坐在她的身边了……

为了争取更好的学习条件，杨清就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加强与英国教师们之间的联谊。英国教师内心愿意与中国学生交往，因为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可是英国人的高傲又使他们不愿采取主动。于是，她们5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做了一顿地道的中国北京饭菜，请了十几位英国教师来聚会。教师们品尝着中国饭菜，很是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他们与中国学生的感情融洽贴近了。

苏珊摩尔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她曾在英国皇家五星级神沃伊大饭店（女皇财产）当过前厅部的经理，负责接待工作。这个大饭店曾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苏珊摩尔教师毫无保留地把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教授给中国留学生。她每星期多给中国留学生讲一个小时课，她给她们讲解如何处理各种情况的投诉，告诉她们：要把每个客人的挑剔投诉，看成是对工作的一个挑战。我不觉得每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完善，但是团体力量就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饭店不允许“一个坏苹果弄坏整筐苹果”。

苏珊教师这段话给杨清留下极深的印象，对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

在学习的第二年，学院开始安排上实践课程。在烹饪实践课上，杨清可出了“风头”。学习这门课，杨清十分认真，每道程序一丝不苟，她配料严格按照比例，不象有些同学马马虎虎



虎，菜料都要按要求称过。她做出的菜口味纯正，火候适当，很受教师的赞赏。每次实践同学们都围在她的旁边观摩。

杨清做菜一下出了名，同学们的生日宴会，都要请她去做菜。特别是她做的中国菜炸春卷，更是令人称绝。每次一端上来都一抢而光，有时不得不再重做一锅。

不久，杨清就被分到皇家蓝特斯特酒店（四星级酒店）的酒吧当服务员。学院培训每一名毕业生，不论他日后是当公关部、前厅部经理，还是一位大饭店的总经理，都要从下面的项项做起：洗碗、开票、服务员、厨师、推销员等等每一种工作都要实际操作实习。

杨清来到皇家蓝特斯特酒店，这是一家装饰异常的华丽的酒吧。

这里的服务员每个人分管 10 张桌子。杨清没有经验，第一天就遇上“竞争对手”。酒吧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女招待常常是把已经坐在杨清分管的桌子边的顾客拉走，起初杨清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过了半天，她才发现她的英国“同行”是为了小费。这位女招待很会看人，抢走的客人，都是肯多付小费的有钱人。有的人一给就是 15 磅、20 磅，甚至更多。

杨清还发现顾客们对服务员的化妆很注意。一位英国年轻小伙子刚一落座就开玩笑说：“嘿，你是不是太懒了！”

“你是什么意思？”杨清生气地回。

“噢，”那小伙子朝那位女招待嗷嗷嘴，“你瞧她打扮多媚人，可你却不描眉，也不擦口红，人们会认为你很懒的。”

杨清脸一红，解释说她不喜欢擦口红、描眉这类化妆。那小伙子告诉她：“这不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你不化妆，别人就认为你懒，不愿意让你招待，这是一种习惯心理。”

杨清看出这位小伙子大概是很同情她，尽管她服务得殷勤周到，却竞争不过那位擦着口红描着眉，满脸总是挂着笑的英国女招待。

第二天，杨清也擦上口红，描了眉，加上热情主动与客人打招呼，殷勤周到的服务，很快使她分管的 10 个桌子客人也坐得满满的。



后来，杨清到公关部实习还知道，你就是只有三身衣服也要天天换，要给人新鲜爱干净的感受，不然，别人就会认为“你不洗澡”。

在实习中杨清学到许多书本学不到的各方面经验。如学会了品酒，什么牌子、品种的酒，同一品种不同产地的酒，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啜一口酒便知道酒的纯度和酿酒、存酒的年份。饭前不要推荐烈酒，要推荐开胃酒，饭中要饮什么酒等等很有讲究。外国客人喝牛奶要加什么糖，是要增加热量的，还是要减肥不增加热量的诸多细微的服务，都会带来明显的服务效果。

在酒吧里，杨清也了解英国社会，看到那些不堪工作压力的精神空虚的服务员、厨师吸毒成瘾；也接触下层社会一些好人。一位黑人厨师对她特别关心照顾。杨清每天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下午五点，中间很难有时间休息。她的体力有些支持不住，开始时，累得什么东西也不想吃，那位黑人厨师就想法给她做些可口的饭菜，非要她吃，告诉她只有吃了东西才能挺下去，不然身体就会弄坏的，下班后，还经常开车送她回到她的住处。

杨清实践了酒吧服务员工作后，就又到饭店公关部当了一名推销员。她的主要任务是到各大公司去联系争取用户预定客房。

这项工作首先要求要了解哪些大公司常有外来的客人，然后到公司去找有关负责人谈，带他们来参观饭店，在饭店宴请他们，向他们介绍客房餐饮、房价以及优惠权限。

要想当好一名推销员确实不容易，首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要对你信任，这不仅要从仪表仪容给人好感，而且内在的气质、谈话的风度都要具有魅力。仅仅凭借这些还不够，有时，你面对的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你也要能找出攻克困难的途径。有一次，杨清接受去一家英国大纺织企业推销客房的任务。这家纺织企业生产的毛料销往世界各地，是英国最大一家纺织企业，因此这家企业的总经理很难接近，凡是来联系推销的事务都要被秘书挡驾的，要想见总经理一面十分困难。怎么办？杨清简直是有些束手无策了。经验丰富的公关部经理得知杨清的难题后，带着杨清来到这家企业，刚一见到总经理的秘书，就坦然相告了自己的姓名，说是已与你们老板约好了，有重要事谈。

秘书无法挡驾只得转告总经理。总经理记不清是否有这样一个约会，出于好奇心，见了他们。

一见总经理，杨清就施展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以流利的英语吸引了这位总经理，使他破例答应亲自去饭店看看。杨清攻下了这个“堡垒”以后，这家纺织厂就成了饭店

的“主顾”。

杨清在异国土地上学习工作越来越顺利，生活愈来愈适应，老师同学们越来越喜欢杨清，“杨是一个能干的东方女性”，然而杨清也越来越思念祖国的亲人。

在这里她看到东西方的差距，不但是物质生活上的差异，在英国，一个服务员可以有二三百磅（相当人民币5千元）的月收入，生活很舒服了。但因为你是东方人，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服务员、厨师，或者勤杂工。

有一次，一位从中东来的阿联酋首长来饭店吃饭。他看上了杨清，饭后给杨清“小费”，竟开了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杨清告诉他，她有自己祖国和亲人，她拒绝了那1000元的小费。

正如她自己说的：“在国外，尽管你干得再好，总有被人支配之感。我有自己的人格，在外国人面前，我要的是中国人也能支配外国人，而不仅仅是被人支配。因此我的事业在中国。”

3

1985年，杨清以优异成绩回到祖国。年底被任命为昆仑饭店餐饮部副经理。她开始在自己的事业上耕耘。为了搞好饭店的餐饮质量，她没有满足已有的西餐知识，又开始实践中餐。半年多的时间，她利用业余时间，走遍北京各大饭店，自己花钱品尝各家饭菜，熟记中国各地各系菜肴，各饭店独特风味风格。做到知己知彼。此外，每当一家饭店开业，她都要去品菜，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昆仑饭店不断更新变化，花样翻新，推出许多新菜肴，不断地给客人新鲜感，不断得到顾客称誉。刚刚起步的餐饮部显出活力，也许是命运故意出给她的难题，新委任的餐饮部经理竟是一位美国女士——凯希。凯希曾是美国某大饭店的业务经理，有着丰富的饭店管理经验，特被聘请从美国来到昆仑饭店任职。

杨清成了这位美国女士的副手，无疑这对杨清是一个考验。在自己国家的饭店，面对外国管理者，她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种关系，把工作搞好、搞出色？一开始工作，杨清就发现这位美国女士

十分傲慢，要成为餐饮部十足的支配者。她工作得十分认真，十分主观武断。她们之间的合作一开始就面临着—场矛盾。

餐饮部的另一位副经理老张是一位老同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多年从事饭店工作。凯希认为老张没有什么文化，又不懂外语，很是看不起。在安排经理办公室时，她宁肯让自己的秘书和经理们在一个房间里办公，硬是把老张安排到下面，在食堂里放了一张办公桌，给老张办公。

杨清看不惯凯希的作法，认为如此对待一位老同志不合适，多次向凯希提出让老张搬上来。凯希对此根本不予理睬。杨清要求自己搬下与老张调换一下，凯希仍是不同意。她觉得和杨清在一起工作方便，因为杨清会英语，凯希不懂中文，她工作一步也离不开杨清。

杨清见凯希如此固执武断，又难以说服，就把自己办公桌搬到食堂与老张一起办公。凯希没想到杨清这么做，没有杨清她就跟哑巴一样。无奈，只好同意了杨清的意见，让老张搬了上来。

不久，又发生矛盾冲突。一天，凯希找到杨清，要她签字同意从另外一家饭店调两名厨师。杨清询问厨师的情况，从凯希简单的介绍中，杨清感到凯希对这两位厨师并不了解。就建议先到那家饭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凯希见杨清不同意，发火了，说这是她的朋友——那家饭店的美国厨师介绍来的。杨清要调查一下，坚持不签字。这下可把凯希气坏了。杨清怕冲突起来把关系搞僵了，一连几天躲着凯希，同时派人调查了解到这两名厨师，果然在那家饭店表现不佳，经常迟到，纪律散漫，怎么办？

杨清想起前不久，因为从顾客左边还是右边上菜，俩人就曾在电话中争吵起来，饭店原先是按照欧洲风格从左边上菜，凯希非要按美国习惯改从右边上菜。因为不是大的原则问题，杨清做了让步。可是这次非要坚持，但又不能把关系搞僵。

杨清签字了。但是，有一条件要有试工期，先试工两个月，根据表现再决定是否聘用，凯希只得同意。这两名新厨师果然表现不好，经常迟到，工作也不认真，只能将他们辞退

了，凯希没话说了，只得去埋怨她的那位美国朋友。

凯希尽管心里对杨清有些佩服，可是态度依旧，磕磕绊绊的事时有发生。

过不久，凯希突然病倒了。这位身体强壮的中年妇女，一个人孤单地躺在公寓里。寂寞的思乡之情和病痛使她感到多么需要亲人和朋友来看看她，跟她聊聊，慰藉一下她的孤独和寂寞啊。

门铃响了，推门进来的竟是杨清。她提着新鲜的水果和糕点，脸上带着关切的神情和温和的笑。凯希象是一个在沙漠跋涉的孤独者，突然看到一片绿洲，泪水一下涌了出来。美国人从不爱掩饰自己的情感，喜怒哀乐总是一下坦露在脸上。

两位女强人，一下将饭店里的矛盾争吵都抛到九霄云外。她们肩并肩靠在一起，谈起她们的家庭孩子和心事，谈得那么亲热投机。此刻，她们仿佛象是久别的老朋友，忘记相互的国籍。凯希感受了这位中国妇女温存的体贴，杨清看到这位美国女人坦直的个性。

一下她们彼此了解了许多，她们相互接近了。仿佛友谊必须经历种种考验。当两位异国的女强人重又在工作中展示各自的风格时仍有波浪激荡。

凯希又发火了，她要那些上夜班的服务员和厨师们必须每天洗澡和吹发，可是，夜班既没有澡水可洗，又无理发师吹发。她对服务员和厨师大发雷霆，杨清向她解释饭店不具备条件，硬是让服务员这么做不现实。凯希仍坚持不允，杨清说这不是美国饭店，首先要为职工创造条件。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凯希又提出要將二班制换成三班制，杨清告诉她饭店没有那么多班车接送职工，让职工半夜坐公共汽车又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凯希坚持己见，根本听不进杨清的意见，杨清气坏了。不干了！她向总经理递上辞职报告，要求调离餐饮部。

凯希得知杨清递上辞职报告震动很大，她知道她不能离开杨清。尽管在工作中有些矛盾，但是杨清是她最好的副手，无论是从实际经验，还

谁最早写诗赞颂

毛泽东

○吴泰昌

在我国的本现代文学史中,谁也没有说出,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诗歌中最早是谁的作品与何时出现的。我在阅读柳亚子先生诗作时,却找到了答案。亚子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杰出诗人,与毛泽东同志早有交往。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福建红四军工作,当时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亚子先生怀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那时,诗人在上海,误听毛泽东同志遭到不幸,饮痛写下了这首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作者曾自注:两列宁是指孙中山先生、毛润之同志。他认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两个伟人,但他们又是性质不同的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所以他又用“先生”与“同志”加以鲜明的区分。1932年,他写了《怀人三载》,第一首又是写毛泽东同志的:“本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毛郎”,诗人自注即“润之”。亚子先生以后还有不少颂扬毛主席的诗。1950年他填的那阙《浣溪沙》,更是传诵一时。但是,我以为,上面引述的那两首,更是难得又难得,因为它们诞生于毛泽东同志成为我们党的领袖之前,而诗中又对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作了高度的评价与热烈的赞称,这在文人的诗作中,大概是硕果仅存的。

诗人对我党早期牺牲的几位领导人的悼念也是动人的。1931年他写了《哭恽代英五首》。1930年作《题张应春女士遗像》一首。张应春是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读着这些感情真挚的作品,使人感到,在白色恐怖极其残酷、片纸只字都足以致人死命的日子里,诗人道重如此,实在令人感奋。

1931年,“左联”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写了《新文坛杂咏》十首,用诗的形式对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蒋光赤、叶绍钧、田汉、华汉(阳翰笙)等作家的创作及其对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作了评价。例如咏鲁迅的一首:“逐臭趋炎苦未休,能标旗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咏郭老的一首:“大原公子自无双,戎马经年气未降。甲骨青铜余事耳,惊看造诣敌罗王。”他在《读文艺新闻追悼号感赋》中,对与“左联”五烈士同时牺牲于武汉的作家张采真也表示了悼念之情,足见他的心与革命贴得是多么近。

是从各方面知识杨清都是出类拔萃的。少了杨清,她就断了与职工联系的桥梁,甚至连基本交流都不可能。

凯希清楚她不能没有这位副手。她终于放下架子,恳求杨清留下来,她从总经理那里替杨清取回辞职报告,她让杨清毫不客气地给她提意见,虚心地倾听,一定要与杨清好好配合工作。

真是不打不相识。这次辞职仿佛是一股催化剂,一下催化了她们心中残存的异国之垒。从此,凯希与杨清亲近地象一对姐妹,凯希几乎一时也离不开杨清,甚至在饭店开大会时,也不愿坐在台上,而是站在人群中,大声招呼着到处找杨清,她要与杨清坐在一起。

凯希的亲热一旦热起来,就让人不能走脱,这就是这位美国女士的性情。

1986年5月,昆仑饭店迎来一艘周游世界的豪华“皇家之星”旅游轮船的游客。这是一艘载有八百多名来自欧洲、美国的上层社会名流和富翁们的豪华大型游轮,他们乘着这条游轮周游全世界各国。

“皇家之星”上的贵宾们来到中

国观光旅游,他们下榻在昆仑饭店。接待这样一个高消费的旅游团,服务质量优劣,是一件影响极大的事。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对世界各国旅游饭店的比较,这将是一次对中国饭店服务质量十分苛刻的检测。

“皇家之星”号的客人们带给杨清她们餐饮部的则是更严峻的考验,昆仑饭店的大型宴会厅尚未装饰完毕,八百多名客人每天要在昆仑饭店吃早餐,这可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难题,凯希和杨清俩人商量,决定把早餐开到每位客人的房间去。为了做好这种方式的早餐服务,凯希和杨清齐心协力动员起餐饮部的全体职工。从早餐安排的花样品种到食品用料,都经过精心选择。每天从夜里3点多钟,凯希、杨清就与20多名厨师一起开始准备早餐;清晨,她们又带领40多名服务员将早餐挨个送到房间。她们带着精美可口的早餐,细心周到的服务和温暖的微笑,赢得了“皇家之星”号欧美客人的好感和称赞。客人们给昆仑饭店留下最好的评价,他们从早餐这小而周到的服务中感受到中国刚刚起步的旅游业的勃勃生机。

信任与友谊在工作中不断加深。

随后不久,她们又迎来“国际马拉松邀请赛”的大型宴会,第一次使用刚刚装修完毕的“多功能大厅”,凯希和杨清的配合也获得圆满的成功。

从此,凯希和杨清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只要杨清说的事凯希就百分之百的支持。

一年后,当凯希离开昆仑饭店回国时,这位48岁的美国女强人竟抑制不住泪水,拉着杨清的手哭了。她们相互之间已经有了信任和友谊,临别时难分难舍。她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每逢圣诞节,凯希都要给杨清寄来礼物,杨清也时常给凯希寄上一些中国特产,她们在信中互相交流彼此工作情况和个人的心事。

杨清没有满足已有的成绩,她仍在不断奋进,1988年,杨清出任了饭店旅游部经理。

而今她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代表团和知名人士,从沙特王子到世界各国旅游部长、劳工部长,她们与他们对话交往,同时,也与众多各国平民百姓们对话交往,架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桥梁……

[责任编辑:晓渡]

中国古籍《贞观政要》

○周君铨

《贞观政要》一书为我国唐朝史官吴兢所撰，是一部叙述唐太宗李世民与辅弼重臣之间的政治谈话录。这一文化遗产在国内现在了解的人很少，却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日本《经济新闻》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帝王学》，便是《贞观政要》的介绍和阐述。除引述原文外，常用日本及欧洲历年几代兴亡史实相对照，使读者从中获得启示。全书内容对工商企业团体经营管理和企业经营者研读管理哲学、检讨事业成败很有帮助。日本工商人士不断对《贞观政要》发表心得。松下PHP研究所出版一套三卷供企业高层管理使用的录相带，其中第一卷叫作“领导者的条件”，它的内容就是用《贞观政要》来讲授。

现摘发一些片段，以飨读者。

(一) 创业与守成熟难？

“草创与守成熟难？”这个问题，在《贞观政要》的原文记载中，是群臣在太宗面前论政的争执点，多数人认为守成比草创艰难；创业诚然是一件大事，它是属于阳刚的，必得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得到。但只要全力以赴，必然可以达到预期的成果。守成是属于阴柔的。守成的人经常处在“忧患慎重”之中，要小心翼翼很有耐性地持续下去。一时不会得到显著的成果，又不可粗心大意、稍有松懈。

如何来维护持续的发展呢？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怎样保持创业时期的心态？如果守成的心态与开创的心态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何在？应该怎样的程度呢？要明白，草创与守成，根本应不一样。

一个组织或机构要充分发挥功能，上下级关系极重要，如何运用上下相处之道，《贞观政要》里有许多实例。看了这些实例，职员会想：“如果我们董事长或总经理也像唐太宗那么聪明，该有多好！”老板也会想：“要是公司部门主管，个个都像魏征或房玄龄那么忠贞不贰就好了！”上下之间相处之道，确是一门饶富哲理的学问。

高层主管拥有种种权力，有时可以左右部属的命运。身为首长或单位主管，便握有一定的权限，而权力本身具有正负两种作用，运用过度，容易产生滥权的弊害；过分授权也会造成推卸责任的现象。如何运用得当，让全体员工心服口服，端视首长及主管是否具备卓越的领导哲学和素养而定。

(二)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假如企业领导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决断，结果必然身心交瘁，精

神不济。因此要有适当的授权。但是适度的授权，有时也很容易造成自己只是盖章了事的无作为状态。“松弛、浮华”的安逸风气对事业不利。在企业经营上就是“无竞争的独占事业终会遭致失败”，一个组织机构里如果无竞争状态，部下对上级大都不愿有所建言或报告，以免被责多事，大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平平安安过日子。同事之间也尽量避免争论，内部没有牵制意见，一切呈现太平无事，表面上万事顺利，实际上也许已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这种事情现在在社会也常发生。

(三) 十思

魏征将元首统御国事的基本理念，分为“十思”和“九德”。

“十思”的相反就是“十不思”。身为机构组织领导人如果处事违反正当的思想观念，必然失去领导人应有的人格，甚至连做人的资格都有问题。应该做到：

一、不思知足：就是贪而无厌。

二、不思知止：就是不知适可而止。骄傲成性，想到什么计划就轻率地付诸执行，会把公司搞垮掉。

三、不思谦冲：就是目中无人，高傲而忘记自己的地位之安危。

四、不思江海下百川：就是有满溢之虞。过多就会泛滥成灾，盲目无计划地扩充便会遭致失败。

五、不思三驱以为度：就是沉溺于盘游的意思。

六、不思慎始敬终：就是草率懈怠行事，未考虑后果，做事虎头蛇尾。

七、不思虚心纳下：不听部下的诤言，壅蔽自己的耳目而不知。

八、不思正身黜恶：受人中伤，谗言纷至，导致判断错误。

九、不思因喜谬赏：对自己喜欢的人，格外厚奖，会招致员工不满，影响士气。

十、不思因怒滥刑：随便惩处一个人，过于严苛，以致引起大家的怨尤。

上述十不思的弊害很大，担任主管的人，如果犯了十不思的毛病，他的部下当然不会认真做事。所以在不断的“十思”，才能防止这种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惠安女

福建省惠安县东南与台湾省隔海相望的崇武半岛，就是惠安女生息的地方。惠安女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世所罕见的，所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活几乎为她们所独揽。惠安女爱美，无论是居家或外出劳作，衣服头饰总是绚丽多采，别具一格。

(1)惠安女的头饰艳丽和谐。

(2)这根石条，少说也有四、五百斤。惠安女干的就是这种苦力活。

(3)在崇武半岛，房子全是石头砌的，所有的石头房全是惠安女用一块块石头砌上的。男的干的是拉线之类的技术活。

(4)“封建的头，开放的肚皮”这是人们对惠安女服饰的形容。随着社会发展，她们的服装也在悄悄变化。这三个惠安女穿的紧身裤已取代了老一代惠安女的灯笼裤。

(5)和内地农村妇女一样，洗衣做饭带孩子仍然是惠安女的“专利”

王明诚 乔天富摄





还是冯玉祥将军的性格



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 杨昌济



中华才女凌惠惠



首航太平洋